

目 录

国民党湖南甲乙派的斗争·····	刘岳厚(1)
程潜、赵恒惕驱逐谭延闿和李仲麟等之死·····	姚大慈(40)
湖南两次驱赵亲历记·····	唐希哲(52)
北伐军在常德解决袁祖铭的经过·····	罗子雯胡 达(59)
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围剿”·····	谢慕韩(63)
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围剿”中的龙 岗战役·····	戴 岳(70)
抗日时期国民党的“湘鄂赣边区”·····	刘公武(75)
国民党苏浙皖边区挺进军总部见闻·····	刘漱石(87)
蒋帮勾结日伪反共的一幕丑剧·····	杨思义(93)
记上海黄金风潮案·····	何汉文(98)
我所知道的汤恩伯·····	宋 涛(117)
复兴社的军事处及护卫队·····	蔡杞村(132)
蒋军第八十五军在淮海战役中被解决经过·····	吴绍周(146)
淮海战役中蒋军第八十五军二十三师的投诚·····	黄子坐(157)
李弥兵团被歼记·····	黄 健(168)
回忆陈作新·····	匡幼甫(188)
记汤芑铭屠杀杨德邻等·····	萧仲祁(203)
辛亥组织海军陆战队会攻南京和北伐经过·····	王时泽(206)
短稿三篇	
郭人漳欺诈骗取财·····	余焕东(212)

辛亥湖南光复时的《大汉民报》……………刘 葵(212)

思贤讲舍、长沙府学宫之设局刻书……………彭 霁(213)

补充和订正

禹之谟事迹补遗……………文 斌(216)

关于萧昌炽和廖家栋……………姚大慈(217)

国民党湖南甲乙派的斗争

刘 岳 厚

甲、乙派是湖南国民党内部矛盾产生出来的两个反动派系；它是由“小组”与“反小组”发展起来，存在于何键统治湖南时期——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間，随着抗日战争的兴起与何键的下台而结束的。两派之间的斗争相当激烈。年纪较大的人都知道有甲、乙派的斗争，但明了其内幕的人可能不多。笔者当时曾参与这一斗争，并且是乙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现就回忆所及，将甲、乙派的形成过程和斗争经过写述出来，以保存有关这一事件的史实。

一、大革命失败后湖南党务派系斗争的萌芽

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间，湖南的军政和党务大权，都掌握在唐生智手里。“马日事变”以后，彭国钧、仇鳌等一度组织救党委员会，拥蒋反共；旋为唐生智所解散，成立省党部改组委员会；前省党部内的革命派委员退出，唐生智的部下“佛化”分子冯天柱、尹松乔等充当了改组委员。国民党的省领导人“佛化”了，党的群众和青年学生不能不随之表示皈依佛法，一时“佛化”运动风靡全省。唐生智为什么要搞“佛化”呢？据他的部下邓寿荃告诉我：“佛化是孟夫子（唐生智别号孟潇）治理军队维系军心的一种策略。孟夫子常常说，他是以‘大慈大悲，救人救世’为己任。

因此，当时佛化运动不但风行湖南，而且随着唐所部北伐军已经扩大到了武汉。”我还记得当时有所谓“佛化党化二位一体”，

“唯心唯物两极相通”等奇怪的说法。这种现象，在马日事变后颇为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大多数青年学生所不满。周百八、黄庭荫、米世珍等人暗中组织反“佛化”运动，已隐然树立起两个精神壁垒；不过一时不敢公开，斗争尚不显著而已。不久，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和湘军程潜组织西征军由南京西上进攻武汉，唐生智军败退，两湖政权落于桂系手中，湖南主席由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程潜兼任。于是湖南省党部改组委员会被撤销，

“佛化”与“反佛化”斗争也归于消逝。这次“佛化”与“反佛化”的斗争，虽然为时甚短，却为湖南党务的派系斗争开创了先河。

一九二八年四月，湖南省党部成立指导委员会，委员为彭国钧、张炯、李毓尧、王凤喈、刘岳峙、刘召圃、陈嘉任、罗介夫、张定等九人（后来张定退出，由袁同喈补充）。上述诸人中彭（国钧）、张（炯）、李（毓尧）、王（凤喈）多系湖南学阀出身，彼此臭味相投，无形中成了一个宗派集团，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小组”。彭国钧等在政治上原来与蒋介石和桂系均无多大关系；刘岳峙、刘召圃二人则属于桂系，接近西山会议派；刘岳峙长财政，刘召圃长建设，既有党权，又握政权，他们在马日事变前即已与陈嘉任等联合，组织了一个“左社”，与彭、张、李、王时常发生摩擦；惟当时双方均无群众基础，也缺乏骨干，因此，斗争壁垒尚未显著形成。

1928年5月，程潜被李宗仁软禁于武汉，鲁涤平继任湖南省主席。鲁对湖南党务持不介入态度，一任彭国钧等为所欲为。彭、张、李、王利用这个机会，更凭借过去多年办学的关系，大肆罗

致学生，广植干部，最显著的如一九二八年八月招收各县党部指导委员，张炯利用组织部长的权力，排除异己，网罗了过去一些反“佛化”的分子和青年学生为骨干，派充各县县党部委员。这样彭张“小组”就为他们在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把持湖南党务奠定了基础。此外，彭张“小组”还具有一个独特的优越条件，这就是彭国钧与当时湖南的大封建势力集团有着特殊的关系。原来湖南自辛亥革命以后，出现有两大封建势力：一为谭延闿的“官僚政治势力”，一为胡元倓的“明德学阀势力”。这两大封建势力的首脑谭延闿、胡元倓二人又是莫逆之交，因此，这两派势力经常结合在一起，在湖南政治舞台上起操纵的作用。谁和这两派发生关系，得到他们的支持，谁就在政治上占便宜。彭国钧是明德学生，又是胡元倓的智囊，同时也是谭延闿的亲信；另一方面，鲁涤平是谭延闿的实力干部，彭与鲁又特别接近；在这种情况下，彭国钧很自然地成了他们集团中的中心人物。在历次的地方派系斗争中，彭等总是得到这两大封建势力的支持而占居上风，很少有人可以与之抗衡。

当一九二八年鲁涤平任湖南省主席时代，以彭、张为首的集团已经在党务上取得显著的优势。但却因此引起了省党部其他的人的不满，加以彭等胸襟窄狭，在人事上过于排除异己，不免激起很多人的反感。这就为他们日后的失败埋下了根子。一九二八年湖南“铲共”已达到高潮，而彭国钧等犹以为未足，企图继续推进，于是声浪越搞越大，范围也越搞越宽，由铲除共产党员而排斥改组派，而怀疑到一切不属他们集团的国民党员。属于改组派的周圣工、米世珍等竟由省指导委员会拖出交由铲共法院审判，执行枪决（周圣工系组织部秘书，米世珍系湖南省党校教官兼省党部干事）。因此，彭张集团以外的国民党员人人自危，加上二刘

(岳峙、召圃)嗾使，大家对彭张集团的仇视也与日俱增，不约而同地在大街小巷贴出打倒彭、张、李、王的标语。一九二八年底，省党部委员刘岳峙、刘召圃、陈嘉任、罗介夫、袁同畴等提出派粟日初等七人为党务视察员，分赴各县活动，以图造成力量与彭、张集团对抗。恰在此时，湖南政局发生动荡，一九二九年二月，桂系挟武汉政治分会撤免鲁涤平，何键为湖南省主席；不久，蒋介石下令讨桂，进军武汉，何键附蒋倒桂，桂系败回广西老巢。彭国钧等见桂系失败，刘岳峙、刘召圃等的冰山已倒，即指粟日初等七人为桂系分子，并以非法窃取视察员为口实，撤销他们的职务。不料竟因此构成党内派系斗争的导火线，掀起湖南空前未有的党潮——“反小组”运动。

先是有新化人李先教，因屡欲参加省党部的活动而屡被拒绝，对彭张等极为不满，至此见有机可乘，遂向其同乡湖南军界前辈当时任省自治筹备处处长的曾继梧大肆挑拨，争取支持；一面纠合党内不满意彭、张的人如文任武、易君左、伍薏农、邹谦、吴剑真、龚心印等一大群人向彭、张等人开火、指责他们在党内搞小组织，制造派系，把持党务。一九二九年春夏间，李先教、文任武等设“反小组”运动办事处于长沙市吉祥巷大吉祥旅馆，以发快邮代电等各种方式广事宣传，揭数彭、张等人的罪恶；粟日初等则于一九二九年三月赴南京中央党部请愿。这一“反小组”运动，在长沙方面，得到曾继梧、何键以及长沙警备司令李觉等的支持和鼓励。据文任武告诉我，反小组办事处的费用就是由自治筹备处供给的(文当时任该处科长)。而在南京方面则对彭、张集团有利。因为当时彭、张集团正在整个投向CC怀抱，得到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保护；同时蒋介石也一贯采用以地方党部牵制地方政府的政策，对彭等自以青睐加之。因此，任凭李先教、

粟日初等如何反对，彭张集团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湖南党务的控制权。陈果夫、立夫兄弟也完全信赖彭、张等人对湖南党务的控制能力。当“反小组”和“小组”爆发斗争之初，他们曾向蒋介石保证：湖南党务有彭国钧、张炯他们领导，是不会发生问题的。不意为时不久，李先教等便啸聚党员群众一再捣毁长沙市党部和省党部的机关报——中山日报，并殴伤党委和党员20余人。蒋介石在河南见报，大为震怒，电责陈果夫。于是有国民党中央加派何键、王祺、鄧悌、曾杰等四人参加省指导委员会、整理湖南党务之举（这次国民党中央还加派了黄士衡参加指委会，但是黄士衡始终没有就职）。这是“反小组”与彭张“小组”斗争的第一个回合。这次斗争历时两月，“反小组”并没有取得胜利。彭张“小组”在党内的统治地位固然没有改变，曾杰进省党部时还宣布开除“反小组”分子李先教、文任武、易君左、伍慧农等四人的党籍（曾杰骨子里是同情反小组的，这样作是一种姿态）。反之，彭、张方面在这次斗争中却锻炼和识别了自己的干部，明确了哪些是可靠分子，哪些是动摇分子；并且进一步取得了二陈的谅解，与CC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但CC和彭张集团在反对派的逼迫下，毕竟也作了一些让步，何键、曾杰的参加省指导委员会，就是这种让步的具体表现。

曾杰到湖南来，是胡汉民提出的。曾系同盟会会员，老气横秋，不可一世，常以“国叔”自居（曾说：他的资格仅次于孙中山，孙称“国父”，他应该称“国叔”）。这次他被派来湘，继张炯为组织部长，大权在握，由于他的基本态度是敌视“小组”，而同情“反小组”的，因此，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打倒“张家店”（指张炯的组织部集团）。每次省党部会议散会之前，曾杰照例由口袋内取出一纸任免名单，凡属被认为是张炯的骨干的各县指委，都用“调

省”名义免职，每次任免名单几乎都是没有经过讨论就得到通过。不到三个月时间，“张家店”被打得落花流水。张派人物怒气冲天，麇集省城，纷纷向南京提出控诉。二陈便藉口缓和湖南党派斗争，于一九二九年冬对湖南省党部的人事进行调整，将曾杰免职，改派了一个年轻的农林部科长谭常恺为省党部委员；并将权力最大、纠纷最多的组织部长一职畀予黄埔十三太保之一的鄧悌，谭常恺继鄧为宣传部长，王祺为训练部长，彭国钧、张炯等仍为常委不动。这次省党部局部改组对彭张集团是有利的：曾杰调走了，去掉了一个大障碍；彭、张虽未攫得组织部长一职，但鄧悌经常不在湖南，组织部长职务实际是由该部秘书沈遵晦（浙江人）代理；沈非本省人，年事很轻，经历不足，并且生活浪漫，大部分时间与女同事闹恋爱去了，对部里的事管得很少；这样，就给彭、张集团以随意操纵和从容布置的机会。所以这第二个回合的斗争又以彭张小组的胜利而告结束。

在这次斗争之后，“反小组”掩旗息鼓，彭张“小组”继续控制湖南党务，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一派专党”的局面；但斗争并未就此结束。以后，彭张“小组”被称为甲派，“反小组”发展成为乙派，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展开了新的斗争。

二、甲、乙派的形成和乙派的发展

在叙述甲、乙派的形成和斗争之前，有必要说明一下甲、乙派名称的由来。甲、乙派的名称，不是双方当事人自己制定的，乃是人们加给而为双方所默认的。一九三三年秋湖南选举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彭国钧、张炯等为首的一方同以刘岳厚、毛飞、黄家声、刘宝书等为首的一方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湖南的小报和一些政治流氓除了在竞选中加油加酱，密锣

紧鼓，将竞选运动推上高潮，把长沙搞得乌烟瘴气以外，事后还为斗争双方送上两个新的名称——甲派和乙派。其中推波助澜最力的一人便是周翊襄。大概在选举过后不久，周就为斗争双方制造了两个简单的名称：称彭、张“小组”为甲派，称以刘岳厚、毛飞、黄家声等为首的集团为乙派（这是解放初期周翊襄在和作者聊天中自己谈出来的。以前作者不知道这两个名词的出处，还以为是《晚晚报》杜撰的。至于周是如何制造和传播这名词的，当时倒没有详细追问他）。周翊襄制造这两个名词之后，长沙《晚晚报》从而加以宣扬；并以“甲”字象形钻子，“乙”字象形皮刀，又给甲、乙派分别加上一个“钻子”和“皮刀”的外号。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九日《晚晚报》上有这样几句话：“湖南党务之有甲、乙派也，本报曾象其形而锡以皮刀、钻子之名，一时皮刀、钻子喧腾于一般人口中，两派人物亦皆直认皮刀、钻子而不讳也。……”为着迎合当时社会上的有闲阶级的消闲心理，争取报纸的销路，他们还不时报道（实际是鼓动）甲、乙派的斗争。于是，甲、乙派和“皮刀”、“钻子”一类名词，就经常在报纸上出现，逐渐为一般人所熟悉了。

乙派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呢？

如众所周知，何键是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而取得湖南政权的。蒋介石为了羁縻何键，防止他倾向桂系，在1929年4月正式任命何为湖南省主席之后，又派他为省党部常委。但何在省党部内处境孤立，彭国钧、张炯等经常利用素有“王牛”之称的王祺在会议上对何大肆攻击，甚至拍案大骂，杯盘俱震。何虽深感不安，但不好如何发作，惟一的办法，就是在省党部内寻找友军。这时谭常恺年轻活跃，利用宣传部长头衔四出讲演，大肆活动，颇露头角；当时省党部其他委员都与何键格格不入，独谭对何表

示好感，因此谭便成了何键寻找友军的理想对象。谭热中名利，虽然他之能够出任湖南省党部委员，系由于二陈的提拔，但在回湘以后，眼见靠拢何键，有官可做，有钱可抓，权衡轻重，宁舍陈而投何，一心倒向何键怀抱。后来谭果然得何键保荐为湖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何之拉谭，无非是想在党务上增强实力。不过省指委九人中仅仅拉拢谭常恺一人，力量还是远远不够。谭常恺自投效何键以后，彭张等对他态度突变，他们原来对谭相当重视，现在则攻击不遗余力，连王祺对谭也由器重而趋反对；加上谭自身生活腐化，贪污公款，授人口实，社会地位日趋低落，在湖南党务上已失去作用，远不能与彭张等人对抗，这与何键原来寻找友军的目的又不符合了。

一九三一年秋，湖南省党部召开第三次省代表大会，选举成立第三届省执监委员会。这次选举，按照国民党中央的指示，采用乙种选举法，即加倍选举执监委员候圈人，由国民党中央（实际是CC根据彭、张集团的意见）圈定。结果，张炯、何键、王祺、朱浩怀、谭常恺、黄家声、谢祖尧等被圈定为执行委员；彭国钧、彭运斌、刘宝书、孟庆暄、萧逢蔚等为监察委员；刘岳厚也被圈为候补监察委员。就中执委方面与何键接近的仅黄家声与谭常恺二人，而且他们二人只是个光杆委员，并无群众基础；刘岳厚虽因与何键有同乡关系得以列名候补监委，同样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何键在省党部内的处境，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

在第三届省执监委员会成立后，彭、张集团既保持了湖南党务的控制权，便念念不忘何键勾结桂系赶走鲁涤平的宿怨，随时抓住机会打击何键。党与政经常发生摩擦，形成对立局面。这个集团的主要人物如彭国钧、张炯、王凤喈、谢祖尧、曾省斋等均系当时教育界“知名之士”，省党部与教育界的关系至为密切，湖

南政治上发生问题，教育界总是和党部一致行动。这些人除了在省内对何键进行斗争以外，还联合南京方面的湖南人士如叶开鑫、贺贵严、唐生智等，网罗一些对何键不满的分子，进行反何活动。南京、武汉曾出现过许多反何团体和反何刊物如《洞庭波》、《大风报》之类（《大风报》的董事长是张炯，《洞庭波》的主办人是贺贵严的妹丈罗渭韬），攻击何键，不遗余力，说他政治割据，“非醴勿用”（何键是醴陵人，喜欢引用醴陵同乡。所谓“非醴勿用”，就是《四书》上“非礼勿动”这句话的谐声）。请愿控诉，不一而足。某次贺贵严曾策动湖南旅京同乡多人举旗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撤办何键，大有非达到推翻何键政权的目的不休之势。凡此种种，在何键看来，蛛丝马迹，都与省党部策动有关。何键对这些来自省内外的明枪暗箭，防不胜防，终日如芒刺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安。要达到这个目的，则只有从党务方面积极培植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有组织、有计划地打垮彭张集团，把党务领导权夺过来，从而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何键迫切需要一个有组织的力量来与对方作斗争，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时有这样一些具有政治野心、与何键有某种关系、而又对彭张集团不满的人，迎合何的意图，想搞组织活动，两方面一凑合，于是便产生了乙派。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早在一九二九年，谭常恺任湖南省党部委员兼宣传部长时，曾引用他的一个同学毛飞为宣传部秘书。毛飞为人也和谭常恺一样，热中名利。他见谭投靠何键以后，一帆风顺，由党而政，当上了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也想循谭的老路，先爬上省党部委员，再转身政界。于是运用他的同学CC骨干分子余井塘、许绍棣等的关系钻得省党部委员一席。彭、张集团因对谭常恺不满，迁怒到毛身上，认为毛是谭的谋士，倒谭必先去其党羽，借口毛

的妻子唐竹邨（湖南稻田女子师范毕业的交际花）涂脂抹粉，奇装异服，说毛行为不检，不配充当省党部委员，要求国民党中央党部予以撤换，以致演出在同一天之内毛飞上午宣誓就职，下午就接南京电令免职的滑稽戏。毛飞气极，然心不死。一九三一年国民党湖南省第三届执监委员选举，毛飞又活动国民党中央监委会圈定他为湖南省监察委员，但最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四中常会决议颁发的湖南省党部执监委员名单到省时，毛的监委又不翼而飞（《晚晚报》记载其事甚详），代替他的却是中监会原来圈定之另一候补监委彭张集团分子萧逢蔚。这么一来，毛更加恼火，决心死守湖南，寻隙报复。于是天天窥伺省党部的行动，向何健方面的殷德洋和我告密，并进行煽风点火，加剧党政摩擦，打击彭、张集团，这时我对如何帮助何健抗击彭张集团，攫取湖南党权，暗中已在考虑。我当时已任候补监察委员，虽然起不了大的作用，但站在省党部内面，对于党内斗争究有相当便利；同时毛飞虽已脱离省党部，而精神方面仍与省党部及各县党员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都是我们进行派系斗争的有利条件。因此我同意毛飞的建议，大家合作对付彭、张集团，以进行党内斗争，来转移他们对何健政权的攻势。

一九三二年春，我和毛飞、黄家声、殷德洋、刘宝书等经过多次商谈，确定了进行组织活动的大体计划：

总的策略：首先和过去的“反小组”分子进行合作，对抗彭张集团；然后积极争取友军，积蓄扩大力量，为在下届选举中争取多数代表，夺取党权创造条件。

在方法与步骤上，我们打算利用一个有全省性的合法社团在各县建立分支机构。这个机构表面上是按照社团性质进行社会活动，实际上是干派系斗争的勾当，即利用它来发展我们集团的基层

力量，与各县县党部对立，进而夺取党务领导权。恰好当时有个全国道路协会（以下简称“道协”）湖南分会，我以省公路局长的身分担任着该会会长。我们认为这个合法的社会团体正合利用条件，决定利用它。首先在有条件的（主要是有与我们有关系的人能够挂上钩的）各县成立“道协”支部，发展组织。

计划商定后，由我告诉何键，取得了他的同意。所需活动经费，也由我负责请何键批交四路军总指挥部经理处作特别费拨付。起初是每月一千元左右，以后增加到二、三千元不等，不足时临时批发。这笔款子的用途，以视察、联络旅费开支最多。此外，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办过两次全省性的选举，每次用了万余元。统计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六年间所花的钱，共达二十万元左右。

方针、计划定了，活动经费也有了，我们就开始进行活动。省会方面，以“道协”分会为公开机构；我以会长资格主持一切。毛飞、黄家声、殷德洋、刘宝书等虽然没有加入“道协”，但他们都是乙派首脑人物，遇有重要问题，我们总是共同商量。分会设总干事一人，由我委派公路局科员萧敬一充任（萧系中共叛徒，对于群众团体的工作有些经验，曾托人向我表示愿意搞“道协”的工作，故派他担任此职）；举凡“路政的研究、宣传、促进”以及各县“道协”支部的接洽事项，均由总干事负责办理。另外设一个对外不公开名义的干事，专门负责计划和指挥各县“道协”支部的秘密工作，萧敬一介绍时任省党部干事的蒋固担任了这个角色。

“道协”分会的公开会址最先设在长沙市万福街省商钱局隔壁；那里只是挂着一块空招牌，萧敬一有时在那里办一办公，实际上一切重要问题的商量差不多都是在我家里进行的。为了便于

密室策划，我们还在长沙市区设了一个秘密办公地点，最初在高井街十六号，蒋固每天晚上一个人在那里工作，我们几个主要负责人也间常到那里去研究问题和听取汇报，一般“道协”会员则不知道有这个地方。一九三四年选举以前搬到府后街九号，选举之后又搬到浏城桥某号，最后搬到通泰街二十一号，乙派的派系活动就是在那里终局的。其中府后街和通泰街两处地方，到后来已经成为半公开的机关了。

各县筹设“道协”支部，多系通过我们的私人关系，物色在当地有代表性和能力较强的国民党员一二人负责进行筹备，通常是把物色好的人约到长沙“面授机宜”，也有用通讯或派人去联系的。“道协”支部成立后，除了搞一点应有的表面工作之外，主要工作就是发展会员，与县党部唱对台戏，争领导权。

我们发展“道协”会员，是以过去的“反小组”为基础；凡属与“反小组”接近、具有一定活动能力的国民党员和非党员，都是我们发展的对象；对于“小组”和与“小组”接近的分子，则一概不予接收。我们当时有句口号：凡在“反小组”的旗帜下，只要在当地社会上大体能起作用的，任何人皆可合作。这句话可以说明我们发展会员的原则和标准。这一点对于壮大乙派的力量，击败彭张集团，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如上所述，彭张集团平日排除异己过甚，树敌太多，故只要打出反对彭、张的旗帜，追随者便大有人在。其次，何键掌握着湖南的政权，可以吸引一些“攀龙附凤”的人，并促使一些摇摆于甲乙两派之间的人倒向乙派，这对乙派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条件。

我们在发展组织中，除了广泛利用私人关系进行串连以外，还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方式，也可说是无孔不入，主要的如：（一）对各具有矛盾的派系中的人物，双方争取，兼收并蓄，例如长沙

一师系的缪崐山和长师系的盛先茂，邵阳党务方面的杨粹和教育界的黄甲，郴县新旧两派中新派的曹潮和旧派的范德材、张昱，城步两大家族萧姓的萧浩然和戴姓的戴佐文等，都被我们一起拉过来了；（二）利用地方封建势力代表人物的影响拉人，例如汝城的胡宗霖原来与我们并无关系，就是由于胡凤璋（湘南著名大恶霸，解放后被镇压）的一封信而加入乙派的；（三）取得当地有社会地位的党外人士的帮助进行发展，例如临湘的高大球曾帮助我们发展了临湘、岳阳、湘阴三县的组织，大大增强了乙派的力量。此外，我们在发展中对于骨干的选择，一般都比较慎重，力求以较强的干部去对付较强的敌手，如在湘潭我们以王洪波、王蔚佐对付甲派的陈大榕，在衡阳以刘慕唐对付甲派的万励，结果都作出了较好的成绩。同时我们对于小县份的工作也很注意，象临武这样的小县，一旦有机会发展，我们也不放过。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甲派树敌过多，乙派采取了“力争友军、孤立敌人”的策略，何键政权的支持，以及乙派在发展工作中的无孔不入，“道协”在各县的发展，相当顺利。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选举以前，全省已有四十多县成立了“道协”支部，其中有不少的支部，力量超过了甲派控制的县党部的力量，使得双方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便成了后来甲派丧失湖南党务领导权的决定性因素。但也有一些县份，乙派的工作始终没有做进去。如常德县，因为是张炯的家乡，甲派的工作基础比较坚实，县党部的干部宋华国、熊刚毅等能力亦强，乙派派去的“道协”负责人（名字已忘）与宋、熊比较，能力声望均逊一筹，工作经年，毫无成绩；衡山、益阳等县，也因物色的干部不得力，工作未能开展。

“道协”究竟发展了多少会员，当时没有确切统计，估计不

下一二千人，其中公路局系统的职员就有一百多人。这些“道协”会员，当然都是乙派的喽啰。这样一来，乙派就不再是几个上层人物的小圈子，而是一个相当庞大的集团了。乙派本来没有一个成形的组织，现在虽然利用了“道协”这个组织形式，组织仍然是不严密的。乙派的成员相当复杂，除了国民党CC和甲派分子以外，几乎无所不包，其中多数是国民党员，也有非国民党员；国民党员中的乙派分子固然多数加入了“道协”，但也有未加入“道协”的。由于湖南教育界是CC和甲派固有的地盘，乙派很难插足，因此乙派（“道协”）发展的对象，只能以社会人士为主。从其来源看，有些是原来就与乙派的领导人和干部有私人关系或政治关系，自然地跟过来的（毛飞在省党部任职期间有他的一批干部，大都跟过来了；还有一些人是跟着我跑的）；有些是原来隶属甲派，后来因内部发生矛盾而投效过来的（桃源的王德清便是一例）；而更多是中间分子被我们争取过来的。这些人参加乙派的动机又各有不同：有些人是由于对甲派的作风不满，而对乙派存有“希望”，有些人是因为与彭、张等人有个人仇怨，完全出于泄愤；有些是干名逐利之徒，因见何键在台上，故而趋权附势；有些人则是碍于私人情面，有朋招之，不得不过来。乙派以这样复杂的分子集合而成，虽然在同甲派作斗争时能够基本上保持一致，但一旦涉及个人利害问题，便不免同床异梦，发生矛盾。这在后面还要加以叙述。

乙派是一个以何键为后台，为何政权在党务方面植党营私的势力；但并非所有何键政权中的高级军政人员都是乙派成员，如曹伯闻、张开琰等，都是何键方面的人，却没有加入乙派。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同情支持乙派的；有的是两面讨好，都不得罪；有的甚至在感情上更接近甲派一些。乙派的首脑人物，实际上只

有刘岳厚、毛飞、黄家声、殷德洋、刘宝书等几个人；其中刘、毛、黄三人又是主要负责人。对于他们的出身以及各人在乙派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应该在这里作一简单的介绍。

刘岳厚 湖南醴陵人，一八九二年生，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湖大前身）土木科毕业；从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九年在湖南各公路任工程师；何键任湖南省主席后，刘以同乡关系当了公路局长。一九三一年国民党中央圈定湖南省执监委员时考虑到何键方面的人也要适当照顾，根据彭国钧、张炯等的意见，圈定刘为候补监察委员。这是刘与湖南党务发生关系的开始。由于刘具有较大的政治野心，与何键又有较深的私人关系，于是在毛飞、殷德洋的怂恿下便搞起乙派活动来了，并且成了乙派中运筹决策的主要人物。随着乙派对甲派取得的胜利，刘于一九三三年当选湖南出席国民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34年又被选为国民党湖南省执行委员。1937年C C派赖琬任省党部特派员接管湖南党务后仍保留空头委员名义，至1939年李毓尧任省党部主任委员时去职，从此脱离了湖南党务关系。

毛 飞 湖南沅江人，大概生于一八九四年，上海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曾在广西省政府充任主任秘书有年，一九三〇年回湘任省党部秘书。一九三一年一度钻得省党部执行委员，由于彭张集团的暗中破坏，刚刚发表，又被免职。毛受此打击后，渐与刘岳厚、殷德洋等接近，复利用他的妻子唐竹邨跑何公馆，与何键的内眷接近，从而与何拉上了关系。毛、殷二人对于乙派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毛在乙派的活动中，通常处于出谋献策的地位。由于他具有很大的政治野心和投机性，与C C又有相当的历史关系，他搞乙派完全是出于对彭、张等人的报复，在一九三四年乙派竞选胜利当了省党部执行委员之后，又逐渐与乙

派疏远，终于在一九三六年投入了C C，后来当上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跟着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

黄家声 湖南衡阳人，一九〇二年生；一九二四年在北京大学肄业时由郭春涛介绍加入国民党；一九二六年由北大哲学系毕业后回湘，在衡阳成章、船山两中学当教员，后来任成章中学校长和衡阳县党部常委。一九三一年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第三次省代表大会选举第三届省执监委员，根据照顾地区的原则，将他选为执行委员。这个时候的黄，同彭张集团既无多大关系，与何键方面也无什么渊源。可是何键却早已看中了他，原因是这样的：大约在一九三〇年何键到衡阳去了一趟，有关单位举行欢迎会，黄以县党部常委身分在会上致词，话讲得很好，引起了何的重视。在他到省党部的第二年，何就保他为省政府委员。他对何的“知遇”十分感激，时图报答；加以他与我认识之后，两人意气相投，交情至深，他之所以与我们一道搞乙派，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原因。黄长于言词，乙派的对外宣传和群众活动，多由他任之。黄于一九三七年何键下台时离开省政府和省党部，以后还在何键的内政部任过参事。解放后被镇压。

殷德洋 湖南醴陵人，现年约六十六岁；日本西京帝大政治经济系毕业；曾任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政治部主任；何键统治湖南时期任湖南电政监督和粤汉铁路局局长。他因同乡关系与何键早就很接近；对彭、张集团搞何的乱，愤愤不平，故极力怂恿我出来搞组织活动，对付彭、张集团。乙派形成后，他成了当然的负责人之一。不过他忙于作官，乙派的具体活动，实际上参加不多。

刘宝书 湖南邵阳人，现年约七十二岁，清末留学日本，在国立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农学科及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主要

学习农业；回国后先后在浙大、北京农大、湖南的农业学校任教，并作过校长。宁汉分裂时在国民党中央训练部任干事；旋回湖南任省党部训练部秘书；一九三一年当选为省党部监察委员；在搞党务的同时，还兼任了好几个农业行政职务。他因对彭张等人的作风不满而与刘岳厚等接近，和我们一道搞乙派活动。

乙派除了上述几个首脑以外，还有一批骨干。他们各以与某个首脑的关系——主要是与我和毛飞二人的关系而在乙派中占居相当重要的地位，对甲乙派的斗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属于我的关系的如萧敬一、蒋固（甲派称之为乙派的萧蒋二将）、易蒲生、彭南先（合萧、蒋二人，甲派称之为乙派的四大金刚）、缪崐山（原来与谭常恺关系至深，后来和我接近）、王洪波（主要负责湘潭地区的活动）等，属于毛飞的关系的如罗璋、秦镜、杨粹、徐斐烈等，都是乙派中比较重要的人物。随着乙派在斗争中的胜利，这些人的政治地位也逐步提高，有的当了省执监委员，有的作了省党部各工作部门的负责人，有的成了一个地区党务的主要负责人。

三、甲乙派的斗争

如前所述，一九三一年以前，湖南党务方面是彭张集团“一派专党”的局面，没有对立的派系和它作有组织的斗争。虽也有过反小组的活动，但为时不久，并未影响大局。自一九三二年乙派势力逐渐成长以后，情况就迥然不同了。甲派固强，乙派也不弱。两派势均力敌，彼此呼风唤雨，推波助澜，斗争持续达数年之久，范围遍及全省大部地区。这一斗争，实质上反映了国民党CC同何键的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而以何键的下台终其局。兹将当年甲乙派斗争中几次重大事件分述如下：

围绕宁乡萧学泰事件的斗争

一九三二年，宁乡县团防主任朱鼎三突将宁乡县党部和县教育局负责人萧学泰、萧梅雨等十余人拘捕。据称均系“共党分子”，证据确凿，电呈湖南清乡司令部（何键兼任清乡司令）准予将萧学泰就地正法，其余分别法办。与此同时，宁乡县党部则指控朱鼎三摧残党务，诬陷善良，电呈湖南省党部作紧急呼吁。省党部除据情向清乡司令部交涉外，并向中央党部控告清乡司令何键摧残党务（当时何键兼任省党部常务委员，朱浩怀代他保管私章。省党部上中央的呈文，例由常委签署，朱未经何同意，在呈文上擅自盖章，以省党部常委何键控告清乡司令何键），请求派员彻查。南京中央党部据报，即派中委方觉慧、洪陆东来湘查办。当方、洪两人尚未来湘以前，清乡司令部已派执法处长李琼赴宁乡实地研讯。李也主张将萧学泰就地正法，情势十分严重。省党部就萧学泰事件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何键以常委身份亲自参加，会场空气是相当紧张的。我认为朱鼎三提出的证据和理由都不够充分，深恐草菅人命，何键负责不了。因此，在会上据理力争，指出朱鼎三所提证据不足，主张将萧学泰等解省讯办，以昭慎重；并自告奋勇，愿赴宁乡将萧学泰等提解来省。甲派委员存着极端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未始不赞同我的主张，另方面又想扩大纠纷，借此攻击何键。当我表示意见之后，萧逢蔚当场捶桌打椅，叫嚣“硬要流血”，我也沉不住气，在桌上一拳，怒责萧逢蔚故意捣乱，并警告说：“流血要流自己的血，休想流他人之血，快自己之意！”何键这次也算不错，他没有表现如一般军阀统治者的褊狭胸襟，对我在会上公开反对朱鼎三、影响清乡司令部的威信而恼羞成怒，反而接受了我的意见，派我于第二天赶赴宁乡守提萧学泰等来省。

萧学泰等解来长沙不久，方觉慧、洪陆东到省，将萧学泰等全部人卷解到南京讯办去了，一场风波，始告平息（萧学泰被解往南京后，不久即获释，为CC所收罗）。这次甲派借萧学泰案件煽动反何的阴谋未能得逞，他们的骨干分子某很惊奇地说：“刘子奇真怪，为什么他对萧案抱这样的态度？”这就不难说明甲派对宁案的真实意图了。甲派用意何在呢？我个人推测他们的打算是：萧学泰是不是共产党员，那是另一问题；但是，在事态发展中，乙派必然站在何键的立场，附和政府所采的措施，把萧学泰说成是共产党；更欢迎的是，乙派进一步主张将萧学泰就地正法，造成何键摧残党务、草菅人命的事实；而他们则坚持萧学泰不是共产党，借此掀起反何高潮，配合省外的倒何运动，达到推翻何键政权的目的，他们打的是这样的如意算盘。至于我自己当时的活动，既不是如甲派骨干分子所说的“怪人”，也不是象省政府秘书朱德龙所说的“庇共投机”，我不是帮共产党的忙，而是一心一意为何键帮凶，替他洗清摧残党务的罪名，以巩固其反动统治基础。因为乙派势力正是在何键的反动统治基础上成长、壮大起来的。萧学泰事件处理的结果，平息了一次暂时的纠纷，有利于何键对湖南的统治。

一九三三年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代表的争夺

一九三三年秋，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事前由各省按照分配代表名额选举出席代表。在这次选举战中，国民党湖南甲乙派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争夺，结果，乙派占了绝对优势，从此改变了湖南党务的局面。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长沙市教育会坪中山堂（今省人委礼堂）召开选举会，选举湖南省出席国民党

五全大会的代表。按照国民党中央规定：湖南省应产生代表十人，由各县选出的出席省选举会的代表进行复选。并规定被选人每人至少须获得选票九票始能当选；不足九票时，即令是次多数也不能当选。

当时，乙派在湖南各县成立“道协”支部已有一年时间，摸索了一些派系斗争经验，其已成立“道协”支部的各县初选代表，大多数是“道协”会员。在全省各县产生的初选代表一百另九人中，乙派成员及与乙派有密切关系的估计有五十六人，可得基本票五十六票（实际上有五十八票，我埋伏了水口山代表唐仲庸及另与李先教有共同关系的一票，放给李先教做基本票，没有向乙派内部公开），另外，还可以争取大部分中间票。从整个形势看，乙派占了上风。针对这一情况，乙派决定以何健、刘岳厚、黄家声、毛飞、殷德洋、张慕先、龚德柏等七人参加竞选（甲派提出彭国钧、张炯、王祺三人竞选。李先教在那时候既不属甲派，也不属乙派，他是以中间姿态单独竞选的）。

作为办理整个乙派竞选事宜的当家人，我当时是这样考虑的：毛飞比较重视个人利益，只顾自己当选，对甲派抱着出气雪愤的想法，对乙派的成败并不十分关心；加以他与各县代表关系比较密切，可能自由行动，从而影响全局。龚德柏虽籍湖南，久在省外，人事关系不熟，可能发生意外。李先教与彭国钧很接近，和甲派有渊源，同时和我的私人感情也很深，算得上一个准乙派；因此，我极力鼓励他扯甲派的基本票，同时答应帮助他拉中间票。其用意是想借此挤垮甲派竞选力量最弱的王祺，使李先教当选。因为李先教迟早是会参加乙派的，他如获胜，无异乙派增加了一人当选。从整个乙派的利益出发，初步确定支配选票的原则是：乙派参加竞选的七人中，除我以外，其余六人各配足基本票九票，

计五十四票，这样，余剩给我的基本票只有两张，不足之七票，尽可能多地争取中间票补充。因为我与中间代表接触的机会较多，和一部分人建立了感情，只有这样从全局出发支配选票，才有可能争取整个乙派的胜利。此外，还有从甲派方面拉过来的原与甲派关系较深的代表三人，一律支配给投何键的票，作为意外收获（这三票不宜支配给何键以外的任何人，怕控制不了）。

我将这一计划告诉了蒋固，他表示同意。当即照此原则进行配票：何键、黄家声、毛飞、殷德洋、张慕先、龚德柏各分配基本票九张（毛飞的九票是由他自己选择的），刘岳厚基本票两张（平江代表钟陶皋，城步代表萧浩然。后来在临选举时，因耽心龚德柏落选，又将萧浩然的一票拨给了他，仅剩一票）。此外，何键另加从甲派拉过来的三票，刘岳厚加中间票九票。六月十一日开会选举结果，何键、张炯、毛飞、刘岳厚、黄家声、殷德洋、张慕先、彭国钧、王祺、龚德柏等十人当选为湖南省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代表。其得票情况如下表：

何 键	十二票
张 炯	十一票
毛 飞	十一票
刘岳厚	十 票
黄家声	九 票
殷德洋	九 票
张慕先	九 票
彭国钧	九 票
王 祺	九 票

龚德柏 第一次得八票落选，第二次再选，当选。

这里需要说明：乙派既然对内部竞选人都是事先硬性规定支

配基本票九票，为什么龚德柏在第一次投票时少了两票（原支配九票，加上刘岳厚临时拨出的一票），而毛飞却多了两票呢？因为龚德柏与代表接触的机会少，代表们对他了解不深，毛飞系乙派首脑之一，与乙派多数代表关系较深，代表们不知整个乙派配票的真实内容，而以信仰乙派的心理信任毛飞。结果，毛飞在选举中挖了别人的墙脚，扯走一两票，而龚德柏则失落了基本的两票，这就是龚少毛多的原因所在。当时一般乙派成员是难以明了底蕴的。另一方面，乙派原先分配给我的中间票九票（内有一票是由溆浦代表马骏间接控制的），都是陌路相逢、关系不深，没有绝对把握的，结果却一票不差，全部落实。在当年的选举斗争中，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

李先教这次以七票落选，也还有一段插曲：选举的先一天晚上，李托文任武来和我商量，要求把某一票（仿佛是新宁代表郑祖燧，现在记不清了）让给他，但没有郑重说明他和某代表的关系程度及其关键性所在。我考虑到这一票原是从甲派拉过来，并已经支配投何健的，如果临时改投李先教，可能控制不住，有转回老巢的危险。因此，没有表示同意。选举结果，李先教落选了，他对我悻悻然露不满之色，说这一票关系他的竞选成败，非同小可。据李先教解释，这个代表和他是大同乡（李系新化人。新化与新宁，旧时都属宝庆府），感情很融洽；如果乙派肯把这一票让给他，另有甲派一票会随之转移；这样，他就增加了两票，以九票当选。我听到这一情况，非常惋惜，并责备了李一番，说他做事不老练，为什么事先不郑重说明要求让票的原因，让我通盘考虑，权衡轻重（如果李确有把握当选，则甲派必有一人落选，这对乙派来说，非常有利）。经解释后，李先教转而埋怨文任武没有把问题谈清楚，有负朋友之托；对我则化不满为感激，后来他一

直忠于乙派，卖了不少气力。

在这次选举中，一贯声势煊赫地把持湖南党务的彭张集团，第一次遭到了惨败。乙派对于这次竞选，原先并没有作争取十分之七的代表额的打算。因为如欲争取十分之七的代表额，关键在于大力争取中间代表。论历史，甲派与中间代表的关系比乙派要深，更何况他们当时正执湖南党务之牛耳。但是，选举结果，绝大多数中间代表却倒向乙派这一边，十个代表乙派占了七个，而甲派仅得三个。这一变化，社会上固感到突然，也非甲派始料所及。风云突变，大势已去，甲派自然十分沮丧。听说彭国钧在他们的干部会上说话时竟至嚎啕大哭。在检查失败原因时，甲派骨干分子陈大榕归咎于何键的政治压迫，彭国钧摇头说：“不尽然，不尽然！”看来彭国钧是心中有数，他不完全同意陈大榕的说法。上面谈到，湖南的党权自彭张集团掌握之后，在处理党内问题方面，如杀周圣工、米世珍等，手段未免过于毒辣；加以他们在人事安排方面极力排除异己，树敌太多，凡非他们派系的分子大都在党务上无立足之地，因之反对他们的人也随之越来越多。这个情况，彭国钧在煊赫之时，固未曾注意到；但一到失败之日，就不免后悔莫及，而有慨乎其言“不尽然”之叹了。彭国钧嗟叹选举失败至于痛哭流涕，和我们当时的因获胜而兴高彩烈，充分说明旧社会反动统治阶级争权夺利的尖锐。回忆当年选举期间，长沙市竟闹得满城风雨，你拉我扯，酒食征逐无虚日，浪费人民财产何止万计。反动统治者的内部倾轧，对人民群众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

这次选举以后的形势是：乙派虽获胜利，但是省党部尚未改组，党权实际上还握在甲派手中。其原因是湖南省党部本届执监委员任期虽久已届满，陈立夫顾虑甲派在下届选举没有制胜把握，迟迟不予改选。为了争夺选举阵地，陈立夫曾于一九三三年七月

初亲来湖南视察，策划一切。陈立夫这次来长沙，与我发生了正面冲突。经过情形是这样的：七月上旬某天，曹典球（时任湖南省政府委员，他是我在高工读书时的老师，大概是受陈立夫之托出面斡旋的）忽然约我到 he 家里去和陈立夫谈话。我如约去了，在曹家和陈立夫见了面。稍事寒暄之后，话题就转到湖南党务的正题上来了。陈立夫盛气凌人地讲我搞“道路协会”破坏党务为非法，要我取消各县“道协”支部。我不甘示弱，以手在桌上拍拍，对陈说：“立夫先生要我取消“道路协会”是可以的，但是，你要依法改选省党部。”陈见我态度如此强硬，有伤他的尊严，勃然作色地说：“你简直是侮辱我！”这时，曹典球在旁带点为难的神情，息事宁人地对我说：“你这种态度不对！”一场争论没有结果，弄得不欢而散。后来，陈立夫回到南京，便用中央党部名义正式来文，（新字第2962号训令），严词责备我，要我用书面向中央认错。我于同年九月，遵令写了一份长篇呈文向中央认错，但不承认取消“道路协会”。其中说：

道路协会系属民众团体，依法应受当地党部之指导。故上年成立之始，曾呈准湖南省党部及省政府备案。嗣后筹设各县支部时，复经道路协会呈请省党部令飭各县市党部就近予以指导；同时又由道路协会通飭各县支部，请求各县县党部派员出席参加；各在卷。惟省党部始终将此案搁置未理，迄不明其用意所在。……窃念国民缺乏组织，方为举世诟病，在本党领导之下的合法民众团体，如能指导有方，纳之轨物，其必增加党的力量，毫无疑义。拟恳钧会令飭省党部今后对于道路协会，务须与其他民众团体同等待遇，依法指导。使道路协会之组织，因此而益臻健全，则不惟道路协会前途之幸，亦湘省党务前途之幸也。……岳厚自参加党务工作以来，

瞬将两年，只以赋性愚慧，罔识进退，因此获罪，分固宜然。况同级各委与岳厚初无历史关系，前此各同志之与同级各委有历史渊源，而因立场不同，意见齟齬之故，尚有不安于其位之事。如岳厚者，宁能幸免？！惟身为党员，列席监委，每念党务之重，时深复讎之忧。故居恒秉总理亲爱精诚、天下为公之训，身体力行，冀谋同志之团结，促党务之推进。终以个人能力有限，诚信未孚，不能得同志之谅解，弭党内之争端，竟使湘省整个完好党务，被少数同志借口要挟，陷于停顿状态，而无术补救，此实岳厚个人之错误也。惟错误固应纠正，是非终须大白。钧会高瞻远瞩，必能洞察一切，尤无庸岳厚之喋喋费词也。

这篇认错文章送上去以后，又使陈立夫发生很大的反感，说我的认错呈文是又硬又臭。但是，他也无可如何，最后只好以不了了之。“道路协会”继续存在，乙派势力更加发展，到了一九三四年春，湖南省党部也不得不进行改选了。

一九三四年第四届省党部执监委员的争夺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省党部（即现在民主东街省总工会会址）礼堂举行党员代表大会，选举湖南省第四届执监委员。事先，陈立夫想出一个“记名限制联记、一票投三名”的“甲种选举法”，企图以此压制乙派。这个办法当时对甲派是有利的，但就乙派说，不利之中也有有利的一面。因为一票投三名，有伸缩性，拉扯对方代表在一票三名中投一两个名字，比拉他们完全反过来投整票三人要容易得多。这一点，陈立夫没有考虑到，他当时的想法是：估计甲派力量占三分之一有多，乙派力量占三分之二不足。甲派可能在七个执委中产生三人；监

委五人中甲派可能产生二人；还可望有意外收获。乙派至多只能产生执委四人，监委三人；也可能遭受意外损失。据此，甲派纵然不能与乙派在选举中平分春色，也不至于相差太远。

乙派估计自己的实力，根据中央的选举法，在七个执委中本可争取到五人。但是，朱浩怀是中央党部派来的书记长，又是外省人，他以中间姿态出现竞选执委，乙派自不能不虚与周旋，争取友军。这样，乙派除帮助朱浩怀的半数票外，剩下的全部选票，只够产生执委四人及候补若干人。（对于朱浩怀，我们首先告诉他，我们支配有若干票——约相当于当选票的半数——投他。但为保密起见，最初并不讲明投票者是谁，到投票而尚未开票时，才将具体情况告诉他。）

针对这一情况，乙派决定在竞选中采取争取执委相对多数、候补绝对优势的战略。所谓绝对优势，就是最低限度争取候补第一名。因此，使用的战术是：将乙派所有剩下的全部选票，以仅够当选的最低票数，配给竞选的四个执委；相反地，对竞选候补执委的，则配给以尽可能多的票数，以争候补第一名或一、二名。因为乙派预定获选的执委只有四人，万一将来因故出缺，候补第一是甲派的，则甲派执委将增至三人，与乙派相等；而朱浩怀属于CC，实际上也应算作甲派。这样一来，乙派便将处于劣势地位。有此原因，乙派对于候补第一名，势在必争，才能维持永久优势，立于不败之地。至于选举监委，则集中优势力量，从五名监委中争取到四名，不着重争候补。

我将上述计划向毛飞征询意见，他说：“我过去受他们（指甲派）的打击太多，不敢冒险。”我马上答复他：“好吧，你的票配足，其他照原计划进行。”不料计划刚刚决定，乙派内部又发生了问题：蒋固暗中布置自己当选，排斥黄家声。我得到密报后，极为震惊，

认为蒋固这样做，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简直是一种倒戈行为。当时蒋固如此背信弃义，我感到非常痛心，连话也不愿意和他谈了；并准备不顾一切，亲自动手配票。正在这个紧要关头，湖南公路局段长吴嘉锡因公来长，他是蒋固的姑丈，两人感情至好，和我的关系也很深。当他来见我时，我把蒋固的事告诉他，他不等我讲完，拿起雨伞就走。吴嘉锡到了蒋固家里，蒋固笑逐颜开地说：“姑爷来得好，我现在准备竞选，请你帮忙。”吴嘉锡正颜厉色地大声呵斥说：“你还说‘来得好’，赶快收场。”继而又说：“刘局长这样厚待你，你还要叛他，将来在社会上何以做人？”吴嘉锡的一席话，果然解决了问题。第二天上午，蒋固到府后街“道协”办事处找我谈话，表示忏悔。他具诉种种苦衷，无非是要求谅解。最后竭诚表示，决不再谈竞选问题，一切听我指示。我当时答复他：“团体决定你竞选执委候补第一，现在还是如此，你可照常进行。”一场风波，得告平息，吴嘉锡出力不少。

不料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萧敬一从汉口回来，他要竞选监委。不过他与蒋固所采的方式不同，是向我正面提出，而不是自由行动。有天晚上，我约蒋固、萧敬一一起在“道协”办事处楼上平台上谈话，婉言劝萧打消竞选企图。但是，萧敬一一时还不愿放弃，并说他为“道协”工作卖了不少气力。我见他唠唠叨叨不休，才直截了当地说：“你为道协努力工作，固属有功，但还有求其如你这样的努力机会而不可得的。”（萧因“道协”关系任粤汉铁路局荐任秘书，月薪三百余元，还要竞选省党部监委，以一身而兼两处要职，何以服其他同志，故我期期以为不可。）我说完这番话，蒋固频频点头称是，萧敬一的态度仍然没有转过来。

选举之期，日益临近，内部纠纷迭起，外界压力更大。陈立夫派CC骨干分子于锡来来湘监选，暗地维护甲派，挖乙派的墙

脚。于锡来到长沙后，听说首先由伍家宥介绍萧敬一到紫荆街大中华旅馆和于见面，萧再约蒋固一起和于谈话。后来，于锡来又约萧敬一、蒋固、易蒲生、彭南先四人到旅馆会谈。于对他们极尽利诱之能事，希望他们投效CC，另找出路。并表示在他们投效CC以后最低限度要保障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接着，又想进一步派人串连乙派代表到大中华旅馆开会，搞颠复活动，拆乙派的台。但是，这个阴谋计划被我们破获了（我记得是易蒲生揭发出来的），没有得逞。选举揭晓，乙派还是大获全胜。

经过改选后，新产生的第四届省执监委员会，与上届执监委员会的阵容恰成对照，乙派完全取甲派地位而代之。当选执监委员名单如下：

执行委员（依得票多寡为序。下同）：毛飞、何键、黄家声、刘岳厚、彭国钧、朱浩怀、陈大榕（在选举之前，张炯已调南京教育部工作，王祺已调任立法委员）。

候补执委：萧隽、曾省斋、蒋固、萧逢蔚、张绵周。

监察委员：李先教、刘建绪、缪昆山、刘宝书、伍家宥。

候补监委：孟庆暄、彭运斌。

从上列名单看，七个执委中，乙派占了四个（毛飞、何键、黄家声、刘岳厚），甲派占三个（彭国钧、陈大榕。朱浩怀名义上是第三者，实际上属甲派），五个候补执委中，乙派占了两个（蒋固、张绵周）。五个监察委员中，乙派占了四个（李先教、刘建绪、缪昆山、刘宝书），甲派仅有伍家宥一人；候补监委两人，全属甲派。这次选举有两个特点：第一、从当选执委得票情况看，乙派遥遥领先。我在乙派四执委中得票最少，而甲派居首的彭国钧得票比我还少。第二、从乙派内部来说，毛飞获选执委比何键多得一票，李先教获选监委比刘建绪多得一票，这固然是毛飞、李先

教等个人主义的突出表现，同时也说明了我对乙派的控制能力不强。蒋固、张绵周落到候补执委第三、五名，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他们两人原来都是乙派内定竞选候补执委第一、二名的，因此，配票较多。萧敬一因为自己没有安排竞选，遂于选举先一日向甲派的曾省斋告密，以图报复；甲派得到这一秘密情报后，漏夜改变配票计划，重新调整选票，因而夺得候补第一、二名。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于锡来之敢于公开搞颠覆乙派活动，并不是偶然的。

通过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的两次选举，乙派夺取党权之后，湖南地方党派斗争形势起了重大变化，造成了何键统一湖南党政军的封建割据局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重大的变化呢？主要由于乙派有何键的政治、军事力量作后盾。其次，甲派树敌太多，乙派则自一九三二年各县“道协”支部相继成立后，组织和干部力量日趋壮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乙派夺得湖南党权以后的主要措施

一九三四年四月，国民党湖南省第四届执监委员会选出后，彭国钧因选举失败，怏怏不乐，出走苏浙，徜徉西子湖边。同年六月七日，新任执监委员宣誓就职，国民党中央党部派何成濬来湘监誓。随后，执委会正式开会，推定何键、黄家声、彭国钧三人为常务委员，驻会办公（何键因公忙不能常川驻会，故由我代理）。监委会则推定刘建绪为驻会常委，由刘宝书代。执监委员会内部人事也作了如下的调整：

执委会秘书 罗璋（乙派）

（原有各部取消，分别设科）

组织科长 易蒲生（乙派）

民运科长 黎养曦(甲派)

宣传科长 秦镜(乙派)

监委会秘书 杨粹(乙派)

这次省执监委会机构改组有一特点，即会计(陈颂平,甲派)、庶务(刘枚初,甲派)都没有更动,仍供原职,这是不同于当时一般机关作风的。各科干事虽有一些变动,大多是原来的甲派成员自愿退出后,由乙派成员补充,很少有主动免去甲派成员职务而补进乙派成员的。记得当时新当选的甲派监委伍家有就对我说过:“你们这种作风,我是很佩服的!”我们之所以这样作,是吸取了甲派过去的教训,借以笼络人心,巩固乙派的地位。

省党部内部机构调整后,彭国钧也由西子湖边倦游归来了。两派三常委,都到会办公。常委不分工,发布文件时由三人共同盖章负责,一般文件有两个常委盖章亦可。改组以后,书记长仍由朱浩怀担任。他是受陈立夫之命来掌握湖南省党部的工作的,精神上当然是与甲派一致,表面上和我们也还过得去,不似道地甲派的死硬作风。当时,书记长是在常委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一切按程序办事,没有发生过大的矛盾。至于各县县党部,通过改选,人事方面也有一些变动。乙派夺得党权以后,党政同属一个大老板,彼此之间的摩擦就很少发生了。

陈立夫对刘岳厚的多次打击

湖南省党部四届执监委会成立后,党权转移到乙派手中,因此,乙派大遭陈立夫之忌;加以甲派在湖南的下层基础被乙派摧毁大半,更使陈立夫恨之刺骨。而追根到底,种种变化均系刘岳厚一手造成,因之,又把仇恨集中到我身上。陈对我搞“道路协会”,制造党派纠纷,早已心怀不满,积怨难销;一九三三年来长

视察时在曹典球家的一场口角，认为这是我对他的一次难以容忍的侮辱，仇恨之心，有加无已。于是，对我进行了一系列的排斥和打击，步骤一步紧一步，手段越来越毒辣。在此以前，当一九三二年冬我第一次到南京，和陈果夫、立夫兄弟在常府街四十八号见面谈话后，陈立夫即挑拨我与何键的关系。他故意对外扬言：“刘岳厚这个怪人，到我这里把何芸樵（何键别号）一顿骂起。”（这是指我和二陈见面时，曾说过：“彭国钧他们说芸樵先生摧残党务，我看他没有摧残党务的本领。拿宁乡萧学泰案件来说，朱浩怀书记长代芸樵先生保管私章，他敢于不经芸樵先生允许，擅自签盖公文，以省党部常委何键大骂清乡司令何键，骂得芸樵先生哑口无言。你看，他够得上摧残党务吗？”）不料何键听到以后，反而幽默地说：“骂餐把有什么关系啊！”陈立夫的挑拨离间，竟枉费心机，毫无成效。在何键面前破坏落了空，一九三三年来长视察，又受了一顿“侮辱”。自此以后，陈立夫对我更加恼羞成怒，大有一不做二不休之势，于是，处心积虑地从蒋介石那里下手破坏我。陈在蒋面前说了些什么话，玩了些什么手段，事非亲见，不得而知。但在一九三五年庐山集训时，蒋介石很生气地问当时参加集训的湖南财政厅长何浩若：“刘岳厚是个什么人？”何答：“他是湖南的公路局长。”蒋说：“公路局长我知道的。”何浩若见风转舵地说：“他是跟何键一路的。”蒋介石没有再问下去了，眉宇之间充满着不快情绪，因为他当时正在牢笼何键，不便有所表露。一九四二年刘建绪主闽时，陈立夫眼见我将出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怕我和刘建绪搞在一起，有朝一日将会比在湖南更伤脑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陈立夫借口湖南省党部呈请封闭我在衡阳主办的《开明日报》，开除我的国民党籍，和湖南省主席薛岳向重庆电控我办报“诽谤党国，诬蔑领袖”（与此同时，薛将我的省政府顾

问职务解聘），怂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福建人），作出停止我的党权的决议，使我去福建不成。这是陈立夫对我的最后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打击。我和这个CC头子从无个人恩怨，徒以党内派系摩擦，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蒋家天下陈家党，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陈立夫对待异己分子一贯如此，我又何能例外？据说一九三一年我之被圈定为湖南省党部候补监委，出自张炯向陈立夫的推荐，认为何键方面的人以我比较适宜。待到甲乙派斗争激烈、甲派基础动摇时，他又自叹失策，追悔莫及，并且批评过张炯等人处事孟浪，铸成大错。

四、乙派内部的同床异梦

在对待彭张集团的战略战术运用上，乙派的步骤是基本上一致的。但是，乙派的内部矛盾也很多，具体表现在：我与何键对乙派的看法有着根本分歧；几个首脑之间貌合神离，各有打算；首脑与骨干分子（例如我与萧敬一、蒋固）的关系也发生过恶化，并不是始终如一的。

我自一九三一年经国民党中央圈定为湖南省第三届执监委员会候补监察委员起，到一九三二年开始搞乙派活动这一段时间，与何键很少谈过党务方面的问题。何键没有授意我搞乙派，最初他并不知道我参加党务工作怀有野心。我之参加竞选，出于当时公路局同事刘励清、张英等人的怂恿，而圈定则是张炯暗中向陈立夫建议的。从我自己来说，既已参加了党务活动，便很自然地想利用派系发展势力，借以实现个人向上爬的政治野心。我为了政治上的长远打算，决心利用何键的力量，从发展何键的反革命事业中实现自己的阴谋和野心；而何键为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进一步巩固其反动统治，也乐得我纠集党羽，为他效犬马之劳；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我和何键既系同乡，又是部属，平日接近较多，有着不可分离的政治关系。特别是乙派搞起来以后，我的政治生命完全寄托在何键的政治生命线之下。何键一旦垮台，我也不能幸免。因此，我关心何键的政治成败，比关心自己的政治前途还严重。

当时，湖南的政治情况是怎样的呢？各级文武官吏大多数贪污腐化无能，又不实心做事。正如黄家声在何键为检查省政得失特别召集的一次座谈会上所指出的：民政厅的县政政策是“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的方针；财政厅“不遵守会计制度，一塌糊涂”；建设厅“尽是贪污，堪称贪污建设”；教育厅“因循敷衍，很少生气”。当黄家声提出无情批判时，除曹典球一人因护短失态外（黄家声在会上揭发建设厅某附属机关负责人的贪污事实，此人系曹典球的亲信，气得他怒发冲冠地挪开椅子，不与黄家声并坐一起），其他省府委员兼厅长如张开珪、余籍传、朱经农等都满不在乎，若无其事。政治如此，军事亦然。何键虽养兵几师，缺乏训练，作战力弱，并且贪污成风，每每发饷不出。他的经理处长异想天开地设计出一种克扣军饷的办法：每月推迟三天发饷，每届发十一月份饷时，已顺延到了年终，本年就此结束，下年从新开始。这样，何键的部队在某一时期，借口为官兵储蓄一个月饷，每年仅发十一个月饷。这一个月存饷后来虽已发还，但因官兵死亡、人事异动种种关系，能否如数发到士兵手中，是很有疑问的。因此，下级官兵忍饥挨饿，异常愤懑；而何键竟熟视无睹。至于经济问题，何键更不考虑，他根本不理解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何键统治湖南几年，政治资本如此薄弱，可以说已经临近失败边缘。作为他的主要帮凶之一，我当时是分外着急的。我想到何键原有班底既不能改弦更张，有所作为，乃别开生面，妄图乞

灵于党（即乙派居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实行以党统政。一九三四年秋，我代理何键省执委会常委已有三个多月，进一步彻底摸了一下何键的底子，认为在政治、军事、经济三方面都有整顿之必要，因此，与他作了一次恳切的谈话。我首先向他提出原则性的建议，请他实行部分以党统政的精神，运用党的力量，进行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改革和建设。具体办法是：党在幕后负实际推动责任，针对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实际情况，随时提出意见和方案，请何键无顾虑地通令执行。我满以为何键会欣然接受的。过去何键对我提供的意见，尽管是批评逆耳之言，也能部分接受；这次却出乎意料之外，他对我提出的至关重要的原则性的建议，竟然消极拒绝，态度十分冷淡。他的答复很简单：“这要先商量”。我看到何键执迷不悟，无意接受我的意见，只好付之一叹，莫可奈何。从此以后，打破了以党统政和希望何键改革政治的幻想；我个人满脑子的野心和阴谋，也遭到当头一棒，只好徘徊观望，听其自然。

一九三六年元旦晚上，我向何键提出口头辞职，约以赴日本考察回国后再图报效，并推荐总工程师周凤九继任公路局局长，何键当面表示同意。当时，还相约对外暂不发表，俟我以三个月时间整理局务、调整人事完毕，再行公开提出辞职。同年四月七日，我提出了辞呈，经省政府六四八次常会通过，以周凤九继任公路局长。同年冬，我由日本考察回国，正值西安事变发生，政局动荡不安。翌年抗战军兴，何键调任内政部长，结束了在湖南为时九年的反动统治，我也从此与何键脱离了政治关系。

回溯一九三二年前后，乙派集团刚刚形成，我的确是在政治上不甘寂寞，跃跃欲试，很想随何键大捞一把，因此，针对当时湖南危机四伏、风雨飘摇的政局，一再向何键进言；但是，始终

未曾引起他的注意。一九三四年冬提出上述原则性的重要建议，何键还是故态依然，毫无警觉。至此，我感到何键的政治已经病入膏肓，成了不治之症。他的事业濒于绝望的境地，我又还有什么政治前途呢？从这以后，意兴阑珊，我再没有和以往一样经常进省党部办公了。由于我的情绪消极，整个乙派集团也开始涣散。原来，何键与我对于乙派的看法是有根本分歧的，几年来，同床异梦，各行其是。何键把乙派作为单纯对付甲派的工具；我则以乙派作为在湖南谋政治上的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力量。如果形象点说，何键把乙派作为一座防御性的堡垒，我则把它看成是一个“攻击司令部”。彼此观点不同，作法各异，矛盾就不断发生并且日益激化了。

在乙派几个首脑之间，也是貌合神离，各有打算的。毛飞参加乙派集团，完全是对甲派采取报复主义，本属一时利害结合。当他在一九三一年以前两次遭到彭、张集团打击后，他扬言决不离开长沙，一定要找机会报复。因此，他投入乙派以后，出谋划策，确也卖了不少气力。待到乙派势力壮大，他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两次竞选获胜后，对甲派打击报复的目的已经如愿以偿，再无保持乙派关系之必要，于是就表现出无所谓了。他的政治基础在南京而不在湖南，陈立夫手下的健将余井塘、许绍棣、赖琰等人，都是他的复旦老同学，随时可为援引，不患无出路；同时，又认为我处事不明，纵容蒋固、萧敬一把持一切，对同志间的待遇欠公平，心中不无芥蒂，终于日渐疏远，到了貌合神离的地步。一九三六年我卸职离湘以后，他就公开投入CC了。这也是我所意料中的事。黄家声和我的关系则不同，我们和国民党中央都无渊源，政治前途完全寄托在何键的反动政权中，一心想借乙派力量做创业资本，在政治上进一步有所作为，加以彼此感情

很好，他由坚信乙派有前途而十分信任我，遇事推心置腹，乐于奔走。他与毛飞，则由于各人政治背景不同，气味不大相投，关系也不很融洽。

以上所述，是当年乙派领导者之间同床异梦的真实情况。

至于我与萧敬一、蒋固等核心干部的关系，前面已经谈到，他们对我并不是始终降心相从的。突出表现在一九三四年选举时，萧敬一因为乙派没有支持他竞选监委，竟敢泄密给甲派以图报复，个人利益第一，不顾团体成败；蒋固之企图倒戈，据他后来说，他在一九三三年乙派选举胜利之后，曾这样问过我：“下次选举，我们下级同志也可以出来吗？”我因下届选举的期限还很渺茫，又系朝夕相处、不拘形迹的“同志”，便随便答复说：“且看吧！”谁知蒋固却认为我是变相拒绝他，前途无希望，由言语之间的误会而致发生越轨行动。这些事例说明，乙派内部情况复杂，组织纪律不严，到了何等地步。

五、甲乙派的结束及其影响

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我离湘赴日考察，乙派集团失去维系的重心，毛飞又早已别有谋算，因之，整个乙派势力已经一蹶不振。到了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国内形势突变，湖南有识之士，同声呼吁团结御侮，共赴国难。陈立夫乘机挟国民党中央权力，下令湖南省党部停止活动，并派赖琰为湖南省党部特派员，重新进行改组。在全国一致救亡图存的新形势下，何键又已调职离湘，乙派失去依附，无形瓦解。持续六七年的甲乙派斗争，就此结束。

赖琰就任省党部特派员，还有一段曲折过程。“七七”事变，抗战军兴，国民党中央电令湖南省执监委员会停止活动。原电大

意是：湖南省执监委员会名义撤销，改为湖南省党部，派赖琰为特派员；原有执监委员一律改称省党部委员，受特派员指挥。赖琰到任后，对省党部及县党部组织有所变更，人事亦有所调整。调整后省党部的组织和人选大致如下：特派员赖琰，委员即原四届执监委员及候补执监委员（名单略），书记长袁野秋，组织科长罗琳，宣传科长秦镜，民运科长黎养曦，文书科和会计科均系新设立的，科长姓名已记不起了。

省党部改制以后，特派员有绝对权力，对内对外公文，均以特派员名义行之，既不需要开会研究，也不必征得委员同意，特派员可以独断专行，决定一切；原有委员，不论执监，无分甲乙，都不过是形式上的界员而已。我固然仅挂委员名义，连CC派来湖南工作六年之久的朱浩怀，也因投闲置散而离职回广东去了。毛飞的情况则不同。原有执监委员十二人中，惟他能参与赖琰的机密。关于省党部及各县党部的人事异动，听说毛飞暗中策划居多。这是有原因的。毛飞与赖琰原系上海复旦大学同学，私交甚厚，这时毛已正式投入CC，和赖同属一个小圈子。他能与闻机要，是通过组织关系和私人交情双重作用取得的。赖琰与湖南党务素乏渊源，非有内部联系，他决不敢贸然尝试，挑此重担。因此，当时有人推测，赖琰出任湖南省党部特派员，可能是毛飞的献策，至少是事先得到他的默契。这种推测，甚有理由。

在上述情况下，赖琰来湖南担任特派员，仅仅有利于毛飞一人，其他方面都不满意。因此，当南京发表赖琰新职时，湖南曾经一度出现甲乙派（毛飞除外）联合拒赖运动。甲派以民运科长黎养曦为首，乙派以组织科长易蒲生为首（易出面活动，我在幕后策划），纠集多人联合开会，散发传单（这些反赖传单是在内政部印刷所印制的。何键时任内政部长），攻击赖琰，一时形势相当

严重。后来，甲派内部矛盾，CC有人从中缓和了，只有部分乙派继续反对。这虽是接近湖南党派斗争的尾声，却不能不引起CC的注意。记得那时候我和黄家声到了南京，谭常恺力任调人，曾找我们多次谈话。洽谈结果，我们和赖琏一起通过陈立夫决定两点：一、我们欢迎赖琏就特派员职；二、赖琏合理调整各县党部人事，使乙派同志工作得到保障。后来，赖琏到湘，临就职前，乙派要求他履行诺言，提出调整人事保证，又一次发生波折，经过协商解决了。这是甲乙派斗争的最后结束。

有人说，湖南乙派结束后整个加入了复兴社。这是不符事实的。乙派成员中，个别加入复兴社诚有之，整个转入则未也。人们以为甲派属CC，则乙派必与复兴社合流；加之后来乙派重要干部如蒋固、陈迪光、易藩生、王洪波、黄甲等人确已加入了复兴社（他们有的可能在乙派未结束前就秘密加入了复兴社），无怪外间有此推测。其实，乙派散伙后，它的成员的政治信仰和行动完全自由，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约束。大体言之，有三方面的分野：一、投入CC，如毛飞、杨粹等（毛飞后来并在陈立夫的中央组织部任重要职位——设计处长）；二、参加复兴社，如前述的蒋固等人；三、既未加入CC，也没有参加复兴社，如我与黄家声、殷德洋、刘宝书等人。抗战前，大约是一九三五年，复兴社重要干部衡阳罗毅曾来长沙，试图通过黄家声拉我和黄本人参加复兴社。我答复说：以一个派系的负责人去参加另一个派系集团，未免太不成话。黄深以为然。罗毅在长沙等候了四天，尝到黄家声的闭门羹而去。从这以后，他们再没有来拉我们了。

有人问：湖南的甲乙派在何键统治时期究竟作了些什么反动工作？肯定答复：湖南甲乙派都是一丘之貉。甲派是CC在湖南的一部分，它在湖南干的罪恶勾当，也是就CC在全中国的罪恶活动

的一部分。乙派呢？除了在党内和甲派进行选举斗争危害人民之外，还做了不少危害人民的事：一、乙派在湖南不少县份建立了“道协”支部，种下了地方派系斗争的恶因；二、乙派当时只顾打击甲派，在利用矛盾和以毒攻毒的方针之下发展“道协”组织，不择手段地招收会员，因而流品复杂，良莠不齐；迄至一九三四年乙派夺得湖南党权以后，各县“道协”支部的恶化腐化分子，假借名义，争权夺利，甚至包揽词讼，武断乡曲。至于具体事实，现因事隔多年，回忆不及，无从胪举了。

我是参加湖南甲乙派斗争之一人，也是何键的重要帮凶之一。甲乙派在湖南的罪恶，无论甲派是帮CC的凶，乙派是帮何键的凶，其危害人民则是一样。这些罪恶活动，随着旧社会的复灭都已成历史的陈迹。今幸国运更新，欣逢盛世，目击全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团结奋发，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愈益感到旧社会的黑暗和新社会的光明。特将国民党湖南甲乙派斗争据实写出，聊表忏悔之意。惟事隔多年，秉笔全凭记忆，遗漏在所不免，尚望各方友好指正。

程潜、赵恒惕驱逐谭延闿和李仲麟等之死

姚大慈

程赵合作倒谭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冬，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策动驱逐盘踞广东之桂系（陆荣廷派莫荣新盘踞广东，阻挠革命事业）已相当成熟。时程颂老（程潜）亦在上海，为中山先生所倚重，中山先生欲取得湖南为将来北伐出师之便利，乃以湖南事属之颂老。其时，湖南为谭延闿所统治，中山先生对谭亦另有所策动，但以谭非革命党出身，终不可靠（谭本以陆荣廷所委派之湖南督军兼省长名义于一九二〇年驱逐张敬尧，继张统治湖南，表面拥护中山先生，暗中仍听陆荣廷之命），故仍以湖南事属之颂老。颂老以离湘已久，于湖南当时情形，不甚明了，乃命先兄大愿回湘察看（予兄弟皆系颂老在湘南护法军总司令任内的秘书，其时予在长沙，先兄则在上海，仍担任颂老私人秘书工作，于湘中将领，俱所熟识），语之曰：“若赵恒惕能与我合作倒谭，事成之后，湖南事由他主持，我不与闻；但广东局面解决之后，革命政府成立，湖南须听中山先生之命，参加北伐；又浴凡（林修梅字）现在湘西组织部队，系中山先生所委派，请赵恒惕力与维持。”（当时湖南部队，有赵恒惕第一师及十二个区司令，其中与颂老有关系的为第六区司令李仲麟所部六营，驻醴陵；张振武、郭步高各一团，驻岳阳，故颂老有与赵恒惕合作之语。）并致书赵恒惕言：“派大愿兄

回湘面商一切。”另致书李仲麟、张振武言：“派大愿兄回湘有所策划，一切请多与大愿兄商量。”先兄大约系十月半到长沙，与予言其来意，问有试图之意否？常见到季隽（李仲麟字）诸人否？予曰：“张、郭远在岳阳，殆少来省，自郴州别后，未尝见过。季隽时常来省，曾经见过，近曾约我去谈过一次话，想请我代表他到上海去见颂公一次，却亦未见实行，亦不审其何故；他对赵恒惕态度颇为亲近，然于颂公当亦未尝忘记。季隽之为人也，富有飞扬之情，亦具勇敢之性，尚在革命同志之列，颂公以革命大义号召之，当无格格不入之虑。柏森（张振武字）笃实可资，虹飏（郭步高字）朴诚无二，俱无问题。谭延闿倚赵恒惕为龙头，其他将领资格都在赵下，如赵能与颂公合作，则谭失去灵魂，能不踣乎？其他将领赵自有办法。且赵亦岂是专为人作嫁者，合作之说，当为赵所乐闻。事之利钝，则不可知，但平地兴波，未为不可。革命之事，如打草鞋，边打边象，未尝不可试试，且先与赵恒惕见面一次，再行计议。惟浴凡之事，则当别论。赵于浴凡，怨恨极深，兄所知也^①，赵之为人也，阴深而褊狭，方欲置浴凡于死地，尚肯容其活动乎？即使与我们合作，亦必不能维持浴凡也。”谈论甚久，先兄亦以为然，曰：“且同往看看松鳌、督凡^②，和他们谈谈。”遂同至松鳌处，适督凡已在座，先兄告以来意，谈论多时，二人都认为不无希望，可以试图。

① 1917年湖南护法之役，定议时，赵恒惕本经参与，其后义帜将树，浴凡邀赵恒惕速赴衡阳，赵徘徊观望；义帜既树，浴凡又专函促之，赵仍逗留不前，其后北军情势不利，广西又答应出兵援湘，赵始闯关至衡，浴凡恶之，颇不假以辞色，赵恨之刻骨。

② 叶隆科，字松鳌，醴陵人，护法起义时，为四团营长，其后升第一师参谋长。宁坤，字督凡，衡阳人，曾任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军法科长。

翌日，先兄持程颂老手书往晤赵恒惕，告以来意。赵虽意态雍容，情无抗拒，然亦不表示意见。先兄陆续说了许多话，赵终无一言。是时，林修梅在湘西被攻甚急，先兄再三请其维持，赵亦终不作答。先兄归来为予述其与赵会谈情形，曰：“炎午系在郴州时常见面的人，今忽作此种态度，不独使人不欢，以后将如何交涉？”又云：“炎午口虽不言，然面色时红时白，其内心实多激动。”予曰：“赵恒惕乃是极端阴分的人，今对极熟的人一言不发，诚为太奇，然既无拒绝之词，亦无不悦之意，其心中自有打算，且任其自去详细考虑，须越日再往一次，看其态度有无改变，或别有摆布。”先兄曰：“可能另派亲信人来示意。”予曰：“正谓如此，所以须再往一次以促之。”越两日，先兄复往，赵态度如前，仍是一言不发。越数日，赵恒惕师部副官长唐岳武及师部职员赵铭鼎来谈，东挪西扯，就中微露可以与与合作之意。先兄询以应如何办法，唐云：“你们应先发动部队。”先兄曰：“李季隼部近在醴陵，可将张柏森、郭虹飏两团调来，宜调到何处？”唐曰：“可调至水渡河。”先兄曰：“你们预备发动何部？”二人曰：“暂尚未定”。至是先兄始与李仲麟相见（原约其悄悄来省，至是始到），交与程颂老手书，并略告以与赵恒惕交涉情形及最近所约。李笑曰：“赵炎公兴致不浅，但不肯当面吐实耳。既如此，便可照办。”先兄曰：“兄部如何？”李曰：“我近在咫尺，动作甚易，可俟张、郭两部到后，再行计议。”先兄乃派人赴岳阳晤张振武，交与程颂老手书，告以最近状况及李仲麟意见，请其约同郭团，迅速开至水渡河，再商进止。张振武完全接受，允即准备开拔。其时，林修梅已被赵恒惕击败，自湘西出走矣；外间颇有程赵合作倒谭的风声。先兄乃移住山本洋行（自是我们乃于山本洋行聚议）。未几程颂老又加派李仲庄回湘^①，相助处理。赵恒惕亲信来问我们的部队何以尚未发动？先

兄曰：“部队业已发动，指日可到。你们的部队已发动否？”他们仍持前议，且俟张、郭两部开到再说。我们颇怀疑赵恒惕欲专假我们一方的力量，向谭延闿虚张声势，迫其去位，而自己部队竟不发动，可以阳避合作倒谭之名，阴收合作倒谭之实，然亦无如之何。已而张、郭两团全部开到水渡河矣。先兄以告赵恒惕亲信（因赵恒惕不愿与先兄坦白交谈，先兄自后但与赵恒惕左右亲信交涉），请他们迅速发动部队，他们仍支吾其词。至是，我们知前所怀疑，固自不误。他们亦未要求张、郭作何声明。不知赵恒惕在谭延闿前，究竟如何卖弄。谭延闿闻张、郭忽然开到水渡河，而赵不予制止，知程赵合作倒谭之说已成事实，大恐，即召开紧急会议。李仲麟托病未到。谭延闿宣布张、郭异动，继云：“本人才力棉薄，湖南事主持不了，请各位另举贤能继任。”到会者皆知赵有异志，未便主张，但相与慰留而已。谭目视赵，欲其说话。赵只是哭泣，涕泪纵横，终不开口。谭知不可强，会议竟无结果而散。此时，谭尚未作去职准备，只是向李仲麟打电话，请其帮忙，消弭衅端。李仅以本人资格不够，向赵身上推诿。赵见谭并无离职准备，其意仍欲恋栈，亦颇惊慌。自己既欲避倒谭之名，不肯发动自己部队，又恐事久变生，遂令其左右来言，要张、郭两部再进一步，开到小吴门外。先兄允之，亦不再提要他们发动部队之事。翌晨，张、郭两部即抵小吴门外。谭延闿知赵恒惕之心，已昭然若揭，始不复作恋栈之想，然仍时向李仲麟打电话。是时，我们已推李仲庄赴醴陵，驻李仲麟司令部，见谭仍频来电话，乃迫李将电话线剪断。谭见李部电话又已不通，知李亦无意相助，即重行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本人即日离职，去沪养病，请另举

① 李隆建，字仲庄，醴陵人，曾任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秘书长。

贤能继任。省城秩序重要，请赵师长负责维持。”赵闻言，痛哭几至失声。谭犹冀得其一言，表示最后之意。赵只是痛哭，终不开口。谭遂起身入内，诸人亦相率散去，无有相与计议者。谭延闿随即离署，悄然去沪。诸将领遂举赵恒惕为总司令，省议会公举林支宇为省长（不久，赵恒惕复即取而代之）。一幕程赵合作倒谭剧至此告终。另一幕以怨报德的屠杀剧即继此开始酝酿矣。

赵恒惕屠杀合作倒谭人

赵恒惕之计既售，一跃而掌握湖南军政大权。其登台后第一个措施即是命张、郭两团迅回原防。我们知赵恒惕对于程部但有利用之心，终怀疑忌之意，盖以张、郭两部久留长沙近郊，与李仲麟相去太近，恐生事变也（当初把张、郭两部摆在岳阳，令与李仲麟远隔，即有用意）。谭延闿既走，各地方区司令（不包括李仲麟）中，其依附谭延闿者，因此致恨于程，亦致恨于赵，咸欲阴谋报复，以泄其愤；其中以张辉瓒为最，宋鹤庚次之，其他戴谭戴赵，都无不可，于程亦无恶感；而依附谭延闿之长褂子尤为愤慨。然报赵则感无从下手，报程则可借刀杀人，乃散布谣言，说我们的步骤是先联赵倒谭，然后拥程倒赵，以怂恿赵恒惕。张辉瓒言之尤力，劝赵消灭李、张、郭三部，并杀此次奔走倒谭分子，以除隐患。我们亦知谭系诸人麇集省垣，且必造作谣言以煽惑赵恒惕；然逆料赵如欲动作，必当先从李仲麟下手，盖李部战斗力颇强，李又勇敢多方，不先除李，无能为也。我们乃力劝李仲麟毋来长沙，不离部队，整军经武。李虽善其言，终逗留不去。时张辉瓒发起湘中湘南几区联防，其意在于李仲麟。我们力促李迅速回防，而李轻视张辉瓒，虽允回防，终不即去。

是时李烈钧率部自遵义入湘，欲假道湘南赴粤（大约是奉中

山先生之命，其部队来源，今已不能记忆）。谭系诸人既尽力造谣，说我们阴谋倒赵，赵恒惕疑李部之来，与我们或有何关系，坚持不许。于是唐岳武、赵铭鼎又来闲谈，言及李部假道事，询先兄意见如何。先兄知其意之所在，乃云：“自以不许假道为好。”翌日，赵恒惕派程子楷来，请先兄到总司令部代拟复李烈钧电稿，盖欲借以覘察先兄措辞有无闪烁支吾之意。先兄知其用心，乃如赵意拟稿，斩钉切铁告以不能假道。然天下不幸之事，往往有适逢其会，忽然突起者，当时出现“四团闹饷”之事。忽一日，街上突然出现枪兵，枪头系有红带，历历落落，势若岗哨，亦不知其究有多少，散布何处，我们亦不敢询之。已而街上喧传军队闹饷，又闻赵恒惕已躲入美国领事馆，总司令部诸人多躲入山本洋行。先兄打电话给李仲麟，欲问是何乱子，没有打通。先兄与予略加研究，认为我们既无所闻，外间亦无风声，则其中无有头脑可知，必是乱兵胡闹。先兄曰：“汝且去山本洋行一趟，探听赵恒惕是否已躲入美国领事馆，如赵方果有人在彼，可与他们谈谈。我须在家守候，恐赵方或有人来也。”余即疾驰至山本洋行，甫入室，则室内不少赵方人物，见予至，皆避入隔壁室内。程子楷即自几上跃起曰：“大慈，你们到底搞些什么？”予曰：“我们搞什么还瞞你吗？我们也茫然不知是谁搞的什么。街谈巷议，说是军队闹饷，亦无能知其是何部队，是否闹饷亦不审知。我们的看法似乎是没有头脑，必是乱兵胡闹，不迅速弹压，恐扰乱秩序。”予见赵方诸人多已躲在那里，知赵恒惕躲入美国领事馆必系属实，因曰：“赵老总何在？何不派兵前往弹压，查明造乱原因，从严惩办？”程子楷闻予言，更不答话，忙取马褂，且穿且走而出。予知其必是往美国领事馆，亦不问之，因亦退出。适遇山本洋行经理，乃略与闲谈，始从容出门，因恐赵方诸人疑予蹑程子楷之后，说何私话也。回

家后，以告先兄，谈论颇久，认为此种不祥之事必将被人加油添酱，以为诬陷我们之口实，相与叹息。是日亦再未出门，恐遇赵方诸人，以为有何奔走；诸友亦无来者。至晚八九时，赵方另有亲信二人来。予等即询以乱兵事。来人云已派人前往弹压，据说是第一师四团士兵，似是闹饷，又不似闹饷。词涉含糊，又甚简略。我们恐其妄生猜疑，未便追其究竟，但云派兵弹压便了事也。如是相与糊乱漫谈，二人皆不多说话，相对默默，至夜深尚无去意。我们始知其特来伺察，看有何人到来，有何处电话。吃了点心，彼此都无话可说，他们竟倒在几上睡觉。我们也就陪他们坐到天明，全未起身。好在一夜既无人来，亦无电话。天已大明，二人始从容回去。我们谈论颇久，认为既是来察看动静，则终夕既无人来，又无电话，应了解我们与乱兵毫无关系，亦不无益处；然如此怀疑，终不是好事（事后，始知谭系人造谣，谓闹饷士兵为我们所发动，我们皆亲在指挥布置，故赵恒惕特派二人来守看动静）。予兄弟因通宵未曾合眼，客去即睡，醒来日已晌午。适宁督凡来，询以乱兵事，宁云：“季隼曾亲往弹压，系一师四团士兵，或云索饷，或言他事，亦有一人声言要请程（潜）总司令回来，又有一人言要请李（仲麟）司令当总司令，漫无主者，亦无宗旨。询以何人召集，皆云不知，但后者跟随前者行动耳，后者之后更有后者，遂至益多。经季隼加以申斥，并演说军人以守纪律为天职，军无纪律，便是土匪，责令各该班长查明所属士兵，率领回营，听候报告赵总司令处办。亦经历多时，至夜深始告结束。”（其后乃称此事为四团闹饷，其实乃乱兵胡闹，并无宗旨。）先兄告以赵方二人昨夜在予家坐了一夜，宁督凡深异之，曰：“夜夜来坐都好，看看我们究竟有何动静。”予笑曰：“夜夜来坐，我们兄弟将不睡乎？”宁一笑而去。

赵恒惕以刚刚登台，即遭四团闹饷，将其吓往美国领事馆，心中甚为愤愤。谭系诸人则将四团闹饷加油添酱，作为诬陷我们阴谋倒赵之绝好资料，又遇事造谣，无所不至，以媒孽于赵及其左右之前，甚至第一师团长瞿维斌请醴陵人吃了一餐腊菜、我们请耿毅（字荷生、天津人，与程、赵诸人俱日本士官同学友好，自李烈钧处来长沙）吃了两餐便饭、谭系诸人竟指为我们连开了三次秘密会议，计划倒赵之事（此节系我们到了广东之后，有自湖南来者举以相告，我们始知之，当时乃在梦中也）。赵恒惕乃决计消灭李、张、郭三部，并屠杀我们。于是张辉瓒又在湘潭召集五区联防会议，提出一个屠杀名单，请会上通过；经诸人删去一部分，尚存四十余人（此系我们到广东后，有衡山谢某者，曾经代表某区司令参加会议，对我们所谈），送交赵恒惕。或云赵恒惕删存二十五人（此亦我们到广东后，自湖南来者所说，其人并非亲见，亦系得之传闻）。是时李仲麟来省，尚未回防，张、郭亦留省未去。赵恒惕决定趁此时下手，可以一网打尽。我们自以绝无倒赵之心，但亦知赵对于我们终怀疑忌之意，惟日促李仲麟迅速回防，整饬部队，加意防范，不要来省，有事可派代表。而李口中虽云即去，仍是淡然置之。

至是，中山先生已驱逐桂系，收复广东，即将前往组织政府矣。忽易枚丞（易象字）自上海突然而来，刚到，即至予家。予见之大骇，曰：“中山先生已收复广东，应已邀颂公前往，兄不随颂公同去，来此何为？”枚丞叹曰：“本如兄言，颂公邀我与王吉占（王恒字）同往，已买好船票三张，定翌日起行。颂公深恐季隽妄自尊大，常来长沙，兄等阻止不住，以季隽与我素厚，我的话或较兄等为有效，要我回长沙一趟，坚囑季隽加意练兵，勿忘记吴光新的榜样（吴光新为皖系将领，统率四师，驻扎汉口，过江赴

鄂督王占元之会议，为王所擒，所部四师，群龙无首，尽被王解决，为当时近事），有事可派代表，切勿到省。颂公意在保存湖南一点革命实力，为他日北伐之用。我即仓卒而行，达此任务，即取道上海赴粤。今季隽何在？”予告已来此多日，我们已促之再三，他口去而身不去，昨又下乡回家中一次，今日始来，家兄正与仲庄前去，促其迅速返防，并告以五区联防事。枚丞曰：“我亦即去季隽处，余事以后再谈，我至多不过能留三日。”予曰：“汝挂单已定否？”枚丞曰：“挂在木牌楼三号友人家。”说罢即去。是晚，复来，言：“已晤季隽，坚致颂公之意，力劝其即日回防，勿违众意，轻敌自大；轻敌者必疏，自大者不固，二者皆危道也。今局面未定，卧榻之侧即是敌人，舍其田而不芸，留此何意？季隽矢言：再过两日，决然回防；如再不回，非友也。我的话亦不过如此。”予为之喟然曰：“颂公之戒，震若雷霆；吾兄之言，切于针砭；此公总是来如驰马，去若推车，奈之何哉！”

李仲庄自醴陵回省后，赵恒惕邀其住于一师师部。予屡促其搬出，仲庄总是迁延。越一日（即易象回湘之第三日，李仲麟决定回防之前一日也），予迫令李仲庄即刻自一师师部搬至予家，另有黄梦蘧（颂老之老秘书）亦同搬来。是晚，叶松螯请耿荷生吃饭，邀我们作陪，季隽亦在内，易枚丞后至，拉予另坐于一处曰：“局面全未稳定，前途殊可悲观。”正欲详谈，忽程子楷走来，东扯西拉，滔滔不绝，而松螯已肃客入座。予知易枚丞在外间活动一天，见着许多旧友，适间之言，必有所闻，欲于饭后，请他毕其所说。及饭毕，枚丞匆遽而起曰：“冯天柱约我十点钟谈话，今已过时，必须即去。”说罢即行。予兄弟亦归。是夜，李仲庄、黄梦蘧即宿予家。至夜分二时，先兄适醒，忽闻远处枪声数响，先兄遽呼予与李、黄均起，茫然不知何事，相顾错愕，静待有无枪声继

起。其时大约为十二月二十四日夜也。约隔一时许，远处枪声历落四起，我们认为必有非常之事。忽宁督凡来电话云：“叶松鳌已被人枪杀！”先兄问他走开否，他已挂筒。予等至此，知其事与我们大有关系，但深夜亦不能出门，街上必有步哨，只好坐待天明，看可以脱逃否。乃计议觅一暂时躲避处，决定四人分两路从后门而出：予随李仲庄往太平街一个漆铺，系仲庄同学李君家；予时住于犁头后街，去储英园甚近，先兄即挈黄梦蓬往避于储英园友人家。天甫明，予启后门视之，稍远处有一枪兵，正在收哨，街上行人来往如常。入告诸人，可以通行，四人即依前定计划，分途自去。予与李仲庄行抵太平街李家，途中未遇一熟人。是日报载被害者：浏阳门有李仲麟，路边井有叶松鳌，木牌楼有易象^①，某处有瞿维臧^②，石落私巷有萧泽源^③，议会西街有张自雄^④。已而闻张振武、郭步高俱已临时脱险；又闻易象临难时在桌布上题了一首诗。我和李仲庄是晚即宿于李家，翌日，闻我们的朋友多已到山本洋行，于是我们亦去。至山本洋行，则张、郭二人、程子楷、杨源浚、黄梦蓬及先兄均在。闻督凡已临时逃脱，先兄云：昨日早离家行至文运街，将转入储英园时，前面有士兵十余人自文运街跑步而来，知是去犁头后街到我家者；昨已托人到家中探

① 易象字枚丞，长沙人。与程颂老关系甚深，其时在上海办上海晚报，常有骂谭延闿文字，为谭系人所恨。此次被害，上海晚报，亦是一因。

② 瞿维臧，字允坚，醴陵人，湘南护法起义时任四团营长。赵恒惕闻关入衡阳时，至叶松鳌防线，松鳌不令通过，磋商许久，始得允许；至瞿允坚防线，允坚又不令通过，亦颇费唇舌，始得放行。二人皆为赵恒惕所痛恨。此次被害原因，即在于此。

③ 萧泽源，醴陵人，赵之军法官，叶松鳌之内弟，取祸在此。

④ 张自雄，与我们倒谭运动绝无关系，殆谭系诸人有恨之者，列其名于屠杀名单中。

问，据告，我们出门后，不过五分钟，枪兵十余人蜂拥而入，不见一个对象，知已脱逃，在各房搜索一遍而去，亦未往其他各家。翌日，家嫂使人来告，云赵恒惕军法处处长赵广礼来家，将书桌屋子尽行翻阅一遍，抛撒满地，无所得，愤愤而去；临去亢声曰：“脑壳要杀一堆的咧！”予回忆李仲庄如不听予言，比日搬至余家，则已为一师师部之鬼；先兄如不于深夜适醒，得闻枪声，懵然睡至天明，则予等四人同为犁头后街之鬼；枚丞如不来，或不三日而去，不致为木牌楼之鬼。在险者偏得出险，不在险者偏来涉险，是孰使之然哉？然予于枚丞，有余痛焉！人传其被害时，兵士将其自床上曳下，云奉令来执行枪决；枚丞知不可抗，请写几个字，兵士不许，再三要求，始允之；枚丞即于桌布上题诗云：

天外飞来事可惊，丹心一片付浮沉。

爱乡爱国都成梦，□□□□未了因。

末句四字不甚可辨，因士兵再三催促，仓卒间写不成字，故乃模糊。写毕，即于门外遇害。从容就义，临难题诗，凛凛然有文信国之风焉。吾于枚丞初未知其读书养气竟到如此地步，可胜痛哉！事后，林伯渠尝与余谈及，深叹为难能，信不虚也。

予等既聚于山本洋行，赵方渐已闻知，派便衣侦探十余人，守候于山本洋行附近，予等尚未得脱险之法。是时湘江水涸，浅水轮亦不能上来。忽然江水上涨三尺，日本湘江浅水轮自芦林潭开来，山本洋行经理谭笃余告予等云：“你们准备，湘江轮有一二日停泊，你们必须趁此船而去，恐水退再无第二轮可来。但外边守候甚严，我伺其有隙，即来相告，你们好好准备。”翌日傍晚，笃余匆匆来告曰：“守候的便衣侦探十余人皆吃晚饭去了，可急速分批下船。”予与先兄即出山本洋行，直接下坡，呼划子上湘江轮。诸人亦皆随之而至。翌日黎明，船即启碇。至此，予等始真脱险

矣。已而茶房请入餐厅早餐，至则陈设整齐，俨然宴会。询之，始知此日已是一九二一年元旦，船上度年节也。予等纷扰多时，已忘月日矣。我们奔走一场，原是为赵恒惕造成割据湖南五年之局，我们做了轿夫，有的已为坐轿者所杀，有的几为坐轿者所杀。小人之不可与谋也，如此夫！

按民九程赵合作倒谭之事发动于先兄，以李、张、郭三人为骨干，予与先兄及叶松鏊、宁督凡、李仲庄奔走其间，易枚丞参加于谭倒以后之余波，此外别无他人。我们的宗旨只是联赵倒谭，完成程颂老之任务，绝无他意。外间以赵恒惕卒施毒手于我们，又惑于谭系诸人之谣言，传说纷纷，以为我们真有倒赵之意，甚非真相。予为始终其事、如今仅存者之一人，久欲为一文以彰其实，以事属痛心，懒于执笔，怀之有年，徒存意想。今应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之约，用为此文，记其大略。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供稿）

湖南两次驱赵亲历记

唐希扑

谭延闿回湘驱逐赵恒惕

当赵恒惕投靠了北洋军阀，标榜联省自治的时候，他已成为广东革命政府北伐道路上的一个障碍了。一九二三年，赵与盘踞湘西的沅陵镇守使蔡钜猷因鸦片烟税收之争发生冲突。蔡以力薄难以抗衡，派人赴粤求援于谭延闿。谭以为这是一个驱逐赵恒惕，恢复他在湖南政权的好机会，乃向孙中山先生建议，委蔡为湘西第一军军长，随派岳森回湘以亲故关系与湖南第一师师长宋鹤庚、第二师师长鲁涤平、旅长刘鏊、衡阳镇守使谢国光、宝庆镇守使吴剑学等联系（岳与宋鲁是兵目学堂同学，与刘鏊是儿女亲家，与谢吴亦很相得），要求支援蔡钜猷。宋鲁谢吴四人于当年二月九日在湘乡举行会议，由于鲁涤平等还不愿露骨地得罪赵恒惕，会议决定电谭延闿在粤谋正当发展，切勿回湘；同时，又劝赵恒惕勿撤免蔡钜猷的职务。

不久，蔡钜猷仍通电就湘西第一军军长职，组织讨赵军，由辰州、溆浦向安化、益阳等地进兵。赵恒惕乃于七月二日下令裁撤沅陵镇守使，调蔡为讲武堂督办，所部九、十两旅拨归一、二两师节制。蔡抗不受命，赵乃下令讨伐。于是，宋鲁谢吴又于七月十八日在湘乡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联合发出通电：请赵停止用兵，劝蔡退回原防。二十四日，赵恒惕阴使团长十七人联名通

电表示拥赵。这给宋鲁谢吴的威胁很大。同时，鲁涤平因唐生智杀了他的妹夫李希尚（南县县长），内心极为愤激，因而双方矛盾逐渐尖锐，宋鲁在湘乡电请辞职，形势日趋紧张。孙中山先生抓住这一时机，任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回湘讨赵。八月七日，谭在衡阳宣布就职，并组织讨贼军。

八月下旬，谭赵两军开始接战于衡山一带，赵军初有所胜。三十一日，赵军叶开鑫部团长朱耀华和贺耀组部第七团营长罗寿颐（朱罗均系张辉瓒的亲戚）联合自湘潭、益阳袭长沙，赵恒惕出走醴陵，谭部张辉瓒等九月一日入长沙。赵随即集结兵力反攻，张辉瓒等被迫向衡阳撤退。十三日，赵军又回到长沙。鲁涤平于是日再次通电主和，二十一日又通电召集姜畲和平会议。在和谈期间，两军夹湘江两岸，相持月余。十月中旬，赵恒惕得北军支援，大举反攻。当战争再起，陈炯明在广东叛变，孙中山命谭回师平乱。谭即率鲁谢吴张等军入粤，以后他们成为北伐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基础。

这次事变中，我任第二师鲁涤平部的骑兵团长，驻防湘潭，首当其冲。赵恒惕想我效忠于他，特发给特别费三千元，并许提升为旅长；鲁涤平则以谭延闿的名义送我二千元。双方威胁利诱，使我处境非常困难。旅长刘钊更多次和我密谈，指责谭无故掀起内战，扰乱地方；说他们都是一些老朽，必然失败。他表示不信岳森的游说，决心拥护赵恒惕，问我如何打算；还说我们保定同学多数是拥赵的，我叔唐嶽又是赵的财政厅长，劝我和他站在一边。当时，我虽同意刘钊的意见，但我所指挥的骑兵团是鲁涤平的基本部队，我如违背鲁的意志，绝对不能指挥如意，甚至还有生命危险。果然，我团周纬黄营长很关切地密告我说：师长怕我们同学附和唐生智，直接抓我们的连长，并注意我们的行动。我

感到很不安。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决心采取中立态度，自动辞职，双方都不得罪，以留将来见面的余地。乃商托中校团附萧文铎（鲁的亲信）向鲁婉陈我要辞职的苦衷，主要是说我随师长多年，天经地义应该绝对拥护师长，唯命是从，但我自幼为叔父唐猷抚养成人，他现任赵恒惕政府的厅长，当然希望我和他站在一起，我不忍违背他的意思；其次是说我与旅长刘钊关系很深，他已明显倾向赵方，这也使我难于做人。在此情况下，两全之道，唯有请求师长曲谅苦衷，准我离职，赴汉侍母。萧文铎回来说：“师长认为你很老实，天性很厚，他很谅解你，表示将来如果决裂，决不强留，使你为难。师长并要你千万不要去汉口，恐怕经过长沙发生危险，可暂回宝庆休息一下，他将来如能搞好，定要请你帮忙，万一搞不好，也好请你收拾残局。”我听了这番话，心中稍稍安定。

在我与鲁交换意见的第二天（十月十三日），鲁在湘潭姜畲召集营长以上的军官会议。我与同驻湘潭的第三旅第六团团团长袁植等准时到会。鲁本意是想骗刘钊到会加以杀害的，但刘很机警，看到形势紧张，立即到长沙去了。因而鲁在会议上只简单地说：“这次谭总司令回湘，我前在湘乡曾经与刘旅长商量，他表示愿意拥护，我才这样做；现在他突然改变态度，我无法跟上。我无论如何要拥护谭总司令，即令各位不愿帮忙，我一个人也非拥护到底不可。现在时局紧张，各位吃了晚饭，早些回防为好。”他说了这些话，即催促开饭，并未询问我们有无意见。饭后，大家马上回防。行至姜畲公路附近，突然第六团第二营的第八连与师部工兵连借口袁植克扣军饷，投降北洋军阀，当场用刺刀将袁刺死。连长张汉忠（曾充鲁的马弁）大声说：“大家都回师部！”显然这是鲁涤平事先布置的。我回到师部走入鲁的住房时，鲁正绕室徘徊，

见我进去，故意顿足说：“他们这样胡闹，你看怎么办？”接着他又把先天叫萧文铎转达的意思重复说了一遍，最后表示独力难支，非要我帮忙不可。我处在暴力威胁之下，毫不迟疑地说：“现在情况不同，我当然绝对拥护师长。”他认为很好，即决定以第六团一、三两营和骑兵团合编为第一混成旅，要我担任旅长；炮兵团和第六团第二营以及第四旅刘峰营合编为第二混成旅，以戴岳为旅长。当时，我看出鲁有些徬徨不安的情绪，料想他是耽心警卫师部的只有两个连（第六团的第八连和工兵连），兵力单薄，怕第六团一、三两营官兵为袁植复仇。我抓住他这个弱点，好象是在为他打算地说：“现在袁植已死，第六团一、三两营留在湘潭不好，宜调往后方，湘潭防务可以完全由骑兵团担任。”这正合了他的意思，马上下令把周磐的第一营调往谷水，李仲任的第三营调往永丰。鲁对我这样的态度似有好感。其实，我是迎合他的心理，故作倾向于他，使他对我释疑；同时，也是为了保全周磐和李仲任，免得他们再出意外。

十月中旬，衡山前线告急，鲁率师增援。我俟部队开拔后，即兼程前往宝庆，窃幸脱离虎口。路过谷水，把所有随从枪兵完全交给周磐，要他与李仲任好好联系，相机行事。当谭延闿率师回粤之后，刘鏊与周磐、李仲任取得联系，并专人通知我去长沙。刘鏊对我说：赵恒惕仍同意照前议把我们的部队编为三个旅，以叶琪任第三旅旅长，我任第十二旅旅长；第四旅旅长一职，因袁植已死，暂由王者师（旅主任参谋）代理；并预定将来把第四旅和第十二旅合并，取消第十二旅名义，由我任第四旅旅长。刘还告诉我，赵认为我这次保全周、李两部煞费苦心，故把周、李分别编归第十二旅和第四旅。我谦辞一番，然后表示受命。1924年春，王者师辞职，第四旅与第十二旅实行合并，我任第四旅旅长，

率部驻南华澧安一带。

唐生智倾向革命迫赵下野

唐生智原来是依靠赵恒惕起家的，赵也非常倚重他。通过这次战争，唐生智的威望日隆，给赵恒惕的威胁颇大，赵每想加以抑制，如唐在打退谭延闿之后，要求作湘南督办，赵不能不同意，只好把叶开鑫提出来作湘西督办以削弱唐的声势，双方磨擦遂日趋尖锐。广东革命政府见唐能团结保定多数同学，潜力很大，又驻节衡阳，当北伐的大道，乃积极联络，争取他出来倒赵。唐受了国民革命的影响，很快就倾向革命。一九二五年冬，唐向赵恒惕建议派叶琪到广东去观察形势，实际是代表他与白崇禧联系（叶是广西人，又是保定同学）。一九二六年三月初，唐生智在湖南各界人民反赵的声势之下，陈兵衡山，并电责赵政府数事。当时，刘鏊的态度是倾向于唐的，因为唐的第四师和刘的第二师营级以上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保定同学，一向互相利用，关系非常密切。赵恒惕以自己的亲信部队只有第三师蒋锄欧、邹鹏振和第一师郑鸿海三个旅，力量薄弱，不能抵御，乃被迫于三月十二日发出去职通电，委唐生智为内务司长代理省长职务，并于当晚逃岳州，随转汉赴沪。唐生智于十六日抵长。

三月二十五日，唐生智就代行省长职。先天早晨，第四师旅长何键电话告我，说唐召集会议，为明天就职作准备，要我先到他旅部（小吴门外校场坪）去商谈一下。我如约而去，第三师旅长刘重威也随即到达。何键稍事周旋即出，留陶广陪着我们。下午，我们的卫士突被解除武装。我们心知有异，然亦莫可如何。傍晚，我与刘重威被分别软禁到旅部隔壁（陆小旧址）唐的司令部里。第二天下午，我与刘同乘小火轮被押赴衡阳。后来，听说

刘鏊和第二师秘书长萧汝霖以及第三师参谋长张雄舆是同我们一天在唐的司令部被扣，又与我们同轮被押解衡阳的。当时，我感到很惊异，因为刘重威和张雄舆是唐的把兄弟，一向关系密切。这次他们是代表第三师来协商的，我和刘鏊则自以为在事变中还为唐捧了场，刘向唐尚多所建议，颇有居功情绪。唐的这一处置，给赵恒惕钻了一个大空子，赵当时以为有机可乘，赶到汉口勾结吴佩孚作后援，煽动第一师和第二师反对唐生智。首先要第二师各团长反对叶琪，加以出卖长官、出卖朋友的罪名把他赶走（叶是我向刘鏊介绍来的，刘鏊被扣后，叶升任第二师师长）。当时第二师各团长互不相下，乃由赵恒惕出主意以唐嶸暂代师长。第一师师长贺耀组也不满唐的处置，所以容易煽动。于是，由叶开鑫出面把一二三师联合起来向唐进攻。加上北洋军阀的援助，唐形势不利，于四月底退守衡阳。六月二日，唐生智宣布参加国民革命，接受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职。六月下旬至七月初，北伐军第七军及第四军一部协助唐生智反攻，于衡宝之线击溃叶开鑫等军及吴佩孚的北洋军，七月十一日再克长沙，赵恒惕卷土重来的梦想就此破灭了。

我和刘鏊等五人被分别软禁在衡阳旧道台衙门唐的司令部里，生活待遇颇好。除刘重威、萧汝霖和张雄舆在五月间被处决外，我和刘鏊则在唐生智再克长沙后不久（约八月初），由二学园（顾净缘设立的迷信机关）的职员到衡阳来将我们接回长沙。我们到长沙一直住二学园，顾净缘和唐生智、叶琪来和我们见了面，唐向我们说：“委屈了，很对不起！”刘鏊说了几句客气话，顾净缘就把话头岔开，谈些法会的事情。第二天，法会完毕，我们就各自回家。

这时，叶琪任省会卫戍司令。当叶升任第二师师长时，撤换

了他原来领导的第三旅蔡鉴、何培基及第四旅周磐等三团长。因此，当赵恒惕煽起反唐，原来被撤换下来的团长多自动回原部队率兵反对叶琪。叶开鑫等失败后，第三旅第二十八团团长何培基和第二十九团（团长陈维斌离职，向超中代理）与新投入北伐军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师长贺耀组取得联系，合编为该师第四旅，何培基任旅长；第三旅第五团团长蔡鉴率部退到湖北沙市附近，被当地驻军王都庆部解散了。叶琪当卫戍司令没有基本部队，办事很感棘手。他要我的妹夫程继川（广西人，卫戍司令部参谋长，保定同学）来和我商量，要求我劝导徘徊于南县、安乡一带的周磐、李仲任两团回来，保证不更动他们的职务。我考虑我和刘鏞决不能再回部队，让周李回来服从叶琪指挥，我们会更安全一些。我即以此意函告周李，希望他们爱护到底。同时，我还请刘鏞也写了很恳切的信，都由程继川专程送达。程原系第四旅主任参谋，与周李等感情很好，因而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后来叶琪升任第十八军军长时，周李分任正副师长）。

不久，唐生智发表我为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高级参谋，聘刘鏞为湖南省政府顾问，均辞不就；旋得唐同意，于是年冬以考察实业为名，同赴日本，从此脱离湖南军队生活。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北伐军在常德解决袁祖铭的经过

罗子雯 胡 达

一九二六年夏，唐生智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在湖南衡宝之线击溃赵恒惕所部后，下长沙，趋岳阳，继而督师攻略武汉。盘踞武汉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企图挽救危局，密电贵州军阀袁祖铭率部入湘，相机夹击北伐军。袁当时拥有重兵，虎视大局，吴佩孚这一着是非常毒辣的，但卒未得逞。

袁祖铭毕业于贵州陆军小学，曾任王文华部营团长和第二师师长，一九二〇年因与王争夺兵权失败后，被迫出走上海、北京，在北京与北洋军阀勾结上了。一九二二年春，袁在吴佩孚的积极支持下打回贵州，取得贵州政权。次年春，云南唐继尧以兵临之，袁率部出走四川，奉吴佩孚命帮助杨森打熊克武。从此，袁在四川各系军阀中起了纵横捭阖的作用，操纵四川内战达四年之久。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袁在重庆不敌刘湘、杨森等的联合进攻，被迫撤回贵州。当吴佩孚令其出兵湖南时，袁军尚在拼凑整理，迟迟未及应命，而北伐军已迅速击破敌军，占领武汉三镇了。

吴佩孚由武汉败走，企图死灰复燃，续以湖南省主席诱袁，促袁急进。袁仍玩弄其故技，一面接受北伐军左翼总指挥名义以资掩护，一面阴受吴命，自称川黔联军总司令，命所部潜向湖南移动。当时，北伐军集中武汉，仅第八军教导师分驻在长沙、宁乡、益阳一带整训。唐生智乃命该师代理师长周斓率所部钟岳灵、

胡达、罗霖(子雯)三团进驻常德、桃源、安乡一带防堵；并派周鳌山为湘西绥靖处长，赴湘西迎袁，嘱乘便陈说利害，请其参加革命，共同北伐。

一九二六年冬，袁祖铭率精锐先头四个旅及所收编之许克祥部顺沅水东下，进抵常德，几乎户户都驻有袁军。其后续部队何璧光、李燊等师亦陆续入湘，号称十万，绵延千里。由于袁军饷糈缺乏，沿途就食，官兵复多贩卖鸦片，军风纪荡然，地方官民不堪骚扰，告急文电如雪片飞来。但袁和其高级将领到常德后，党政军民仍表示热烈欢迎，一方面意图争取其转变参加革命，一方面也以身当强敌，不能不虚与委蛇。袁虽有先解决教导师之意图，但以教导师驻地分散，而自己部队尚未完全到达，故迟迟未发。当两军杂处之时，周斓师长常束邀袁祖铭及其高级将领，招花设宴，表示联欢。袁烟瘾甚大，每于席间由卫士出其特制的软管烟枪，当众吸食鸦片。本身腐化如此，其部属可知。

袁在常德约有月余，根本无视教导师的力量，虽表面上表示愿意合作参加革命，而暗中则仍与吴佩孚密电频繁，互相勾结，拟俟部队集结，直取长沙、岳阳，截断北伐军后路，破坏革命事业。当时湘防空虚，袁军一旦蠢动，确将危及北伐大局。唐生智察知此情，急电周斓迅集所部，相机将到常袁军彻底解决，并设计歼灭渠魁，以安后方，而利北伐。周斓奉令后，一面调桃源、安乡等地的部队向常德集结，一面详细侦察，缜密部署，并与袁祖铭及其高级人员继续花酒周旋。

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为常德风俗的除夕（常德有以二十七和二十八日为除夕的习俗），周斓师长也借此佳节举行“联欢”，假常德东门外贺八巷常德商业研究社楼上，欢宴袁祖铭及其高级将领，设伏于附近以待之。傍晚，周斓惟恐袁等万一不来，亲往迎

袁。袁以到常以来不时赴宴，未虞有他，乃与其参谋长朱筱珊、师长何璧光等赴会，仅携卫士数十人以从。主客正谈笑间，忽报湘西绥靖处卫队营长请参与宴会的周鳌山处长接电话。周事先未参与军事机密，不知来电有因，怒其干扰扫兴，拒不接话，经该营长托词固请乃出（事后他怪周澜把他当鲁肃）。周澜因亦借小解潜出，号令预伏附近的钟岳灵团陶柳营发动突击，一时枪声大作。袁祖铭闻声骇然，一面令卫队抵抗，一面摔脱大衣，越屋而逃。何璧光负伤登屋，跌落街心，犹与教导师官兵多人肉搏良久始死。朱筱珊则被当场击毙。在宴会处发动突击的同时，教导师各部按预定计划分别向常德城内各地强敌发动突击，全城巷战激烈异常。袁军许克祥部因事先受教导师秘书长周大荒之策动，决定脱离袁部，故未投入战斗。巷战开始后，教导师官兵均以深知此役关系北伐全局与地方安危，无不奋勇歼敌，纷乱之中，往往各自为战。而常德的爱国群众怨恨袁军之骚扰，特别是受到当时革命潮流的影响，多能深明大义，纷纷参加协助围剿和救护工作。当夜，盘踞北门一带之敌即被解除武装。拂晓，袁祖铭已就擒，伏法于东门外。原来，袁越屋逃走，失足跌伤，匿入民家，自承是袁总司令，许官许钱，但求救他一命。不料周澜的弁兵周某和罗霖的弁兵郭连喜恰好携眷住在那里，因而即时就擒伏法。

袁祖铭就擒伏法及其高级将领多被击毙的消息传播后，袁部群龙无首，士气沮丧，混乱异常；而教导师官兵和群众则精神更加振奋，信心倍增；加之罗霖团之主力两个营亦于深夜由安乡赶到投入战斗，至午后，西门附近之敌即告解决；未几，大河街之敌亦次第缴械。这时虽尚有几处敌人负隅，但在我军一面巩固阵地，一面宣传喊话，劝他们放下武器，减少牺牲的情况下，自知力竭势穷，除少数突围逃窜外，余均缴械投降。历时一昼夜的巷战

就胜利结束了。后来，其所侵入湘西之后续部队闻讯，亦纷纷退回黔境。

这一战役，双方兵力悬殊，而教导师能先发制人，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更得当地群众协助，卒能以寡胜众。而袁军则多吸食鸦片，生活腐化，将骄兵惰，战斗力弱，特别是师出无名，士气不振，加之又在夜间仓卒应战，局促于街巷中，无法展布，当渠魁就擒，群龙无首，自然归于溃败。

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围剿”

谢慕韩

一九二九年秋，鲁涤平就任江西省政府主席。随同入赣的第十八师和第五十师，是他的政治资本。我被聘为省政府高等顾问兼省府新设的军事办公厅主任。军事办公厅下设四个组，组长由民、财、教、建各厅长兼，承办各部门与军事有关的业务。我们也提出了一些抽象的办法：要求民政组负责“全民战”，和红军争取民众；财政组负责“经济战”，加强对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教育组负责“宣传战”，宣传反动理论，反对进步思想；建设组负责“交通战”，加强交通、通讯的建设和防止破坏。

军事，是以绥靖开始的。我们到赣之初，对红军一切情况都不明了。由朱培德的介绍，才知道一个概略，然而也仅仅知道当时的红军基干部队员兵约三四万，枪一万二三千支，主要活动地区是：广昌、宁都、兴国、瑞金、雩都等县，而以东固为根据地。此外赣东北有方志敏、邵式平领导的、赣西北有王佐领导的游击队出没，力量都不大（这些现在都知道不符真实，但当时却是这样估计的）。我们依据这些材料拟订所谓分区防剿计划：以第十八师戴岳旅担任南浔路和赣东北，朱耀华旅担任永丰、乐安等县，王捷俊旅担任抚州、宜黄等县的防剿；谭道源的第五十师担任赣西北地区的绥靖；企图由北而南，逐步肃清。各旅又以团为单位分区防剿，对红军中央根据地暂时封锁、戒备。在这种布置下，

红军巧妙地利用区与区之间的空隙进行游击活动。这样，我们就显然处于被动地位，攻则徒劳无功，疲于奔命；防则不能互相呼应，不胜其扰。于是，只好重新制定计划，拟以必要兵力据守重点，即由北而南，据守九江、德安、樟树、吉安、赣州；由东而西，据守上饶、贵溪、抚州、清江、宜春。这样构成十字形的防御阵线，大部兵力则控制于可以策应各方的适中地区，机动使用。如某一据点发生情况，守兵至少须支持三天，机动部队轻装驰援，内外夹击，可收聚歼的效果。这个计划，尚未布置完成，适逢桂、张（发奎）联合攻击广州，蒋介石令鲁涤平抽调谭道源师全部及第十八师的王捷俊旅由谭统率援粤，留赣正规军仅第十八师的戴岳、朱耀华两旅。此时赣东北的方、邵两部红军日益壮大，戴旅完全不能抽动；黄公略部红军又到赣西北，朱旅除防守永乐外，须兼顾赣东。我们所拟十字防守、机动驰援的计划，又成纸上空谈，不能实现。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加强对红军的防剿，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

一、实行碉堡政策。凡所能控制的县城，均选择制高点及交通要道修筑碉堡。环南昌城除筑碉堡外，更敷设电网。

二、在省政府设立保安处，编训保安团，专作省防用。初拟编四个团，编制和军队步兵团大致相同，经费由省库开支（首任处长为路孝忱，副处长为廖士翘，均日本士官生）。这一制度，以后推行到全国。

三、在省县之间，为加强县与县的互相联系和协作，每两县设督导员一人（为以后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滥觞）。

这些“临渴掘井”措施，都缓不济急，因而搬兵求救，还是当时最重要的事情。当时蒋介石的正规军都投入军阀混战，只有宋子文的几个税警团勉强可调。我们通过何应钦的催促虽调来邓

毅仁一个团，但只答应担任九江市的治安。我们只好再向湖北绥靖主任刘峙求援。一九三〇年一月下旬由鄂南调来了唐云山旅。此时，适红军主力由石城向西出动，我们以增加了新的部队，同时又低估了红军的力量，误以为正是进行正规战，以歼灭红军主力的机会到了。随即编成以旅为基干的两个纵队，以唐云山旅为右纵队，朱耀华旅为左纵队。两纵队的间隙不到二十里，可以互相呼应，尤其是唐纵队右侧倚托赣江，左有朱纵队的掩护，在一般军事情况下，可以保证不出意外。两纵队由北而南，齐头并进，二月二十四日，行抵水南以北，唐纵队与红军接触发生战斗。最初出现的是赤卫队，唐云山漫不经意，渡河追击，不料刚渡河后，即遭遇红军主力的围攻，竟全部被歼，战斗很快结束，唐仅以身免。朱纵队驰援，中途闻唐旅败讯，即顺原路撤退，红军也未追击。唐系黄埔一期生，为蒋介石所信任，部队装备良好，枪支达三千以上，红军得到这次补充，实力更加壮大起来。

由于唐云山旅的复灭，我们处境更加困难，唯一希望即谭道源师的重回江西。但谭师转战粤桂，至一九二九年夏，军次广西贵平，桂张又出湘南，谭师奉命由海运转湘。一到汉口，桂张已被击退，谭师又奉调参加蒋冯阎大战，投入漯河、柘城之线。郑州下后，谭师才回江西，时为一九二九年十月（谭师行动情况系当时师参谋长李家白提供的资料）。红军乃利用江西的空虚，迅速扩大占领区，越过樟树直迫南昌城下，一部到达牛行车站附近，并向警戒部队开了一排枪。那时传闻朱总司令曾亲到环城视察，到牛行车站附近的为伍中豪的红三军。我们因环城碉堡已建成，电网之外，更设有其他障碍，守兵除南昌市警察外，仅谢慕庄新成立的一个保安营，殊不敷调遣。鲁涤平又要我到南京找税警总团长温应星，又加派了古鼎华一个营来，负责德安以北及湖口等

地的防务。此时南昌党政高级人员均携带行李就宿于鲁宅对面楼上，意在紧急时，挤上鲁所准备逃难的飞机和兵舰（实际鲁并未备飞机和兵舰），溜之大吉。如此持续约一月，会彭德怀将军由平浏攻下长沙，围城红军为了策应彭部，经高安、上高进入湖南，与进攻长沙的红军会师，南昌之围遂解。后来红军由湘回赣亦迳趋赣南，我们在南昌才取得了“燕雀处堂”的暂息。

一九三〇年秋，蒋冯阎大战结束，军阀混战局面暂时告一段落，蒋乃集中力量，开始了对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的残酷镇压——第一次“围剿”。为了统一指挥，蒋任鲁涤平为南昌行营主任，我被派为行营参谋长。军队陆续南调。是年冬，集中于南昌、抚州及其以南地区的兵力计有八个师，共约十万人。军队系统如次：

鲁涤平的第九路军，辖：张辉瓒的第十八师，

谭道源的第五十师。

朱绍良的第六路军，辖：毛炳文的第八师，

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

归朱指挥的有：胡祖玉的第五师，

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

由行营直接指挥的罗霖纵队，辖：罗霖的第七十七师，

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

此外，为防止红军向西突围，蒋又调蒋光鼐、蔡廷锴所统辖的第十九路军（辖三个师）及王金玉的第二十五路军（辖五个师）向赣西袁水以南地区集中，正由长岳、株萍路向目的地运输中。

以上为战斗序列和兵力集中概况。

我们依据当时所知道的情况和历次作战经验，特别是唐云山在水南复灭的教训所作的情况判断：红军士气旺盛，作战英勇，军官指挥技术卓越，机警果断，因而在素质上对红军作了很高的

估计：在数量上估计红军全部兵力共约四万人，原有枪一万二千支，加上唐云山输送三千支，共约一万五六千支，无重火器，物质力量不及我们远甚。对红军内部编组，根据不确切的情报估计：第一军是朱兼，第三军是伍中豪，第五军是彭德怀，第七军是毛主席兼，第八军是项英，其余二、四、六各军不明。对红军指挥官的个性，除国共合作时期同过事的粗枝大叶地知道一些外，但他们后来的情形也均陷于无知，因而凭主观臆断作出的结论和客观实际相距遥远。

由于依据以上不科学的臆测，判断双方在数量上和物质力量上我们已占绝对优势，在战略上掌握外线作战的有利形势，因而不待蒋蔡的后续部队集中完毕，即进行围攻部署。首先将攻击军战略展开于吉安（罗霖师）吉水（公秉藩师）永丰（张辉瓒师）乐安（谭道源师）南丰（毛炳文师，许克祥师）之线，而以公秉藩归张辉瓒区处。胡祖玉师和李云杰师控制于南城为第六路军第二线部队，防止红军的东逸，形成作战正面三个纵队的态势，即右纵队张辉瓒，中央纵队谭道源，左纵队毛炳文。

攻击开始日期，蒋介石指定为十二月十六日。

张辉瓒指挥右纵队由吉水、永丰向前推进，按照预定进度应于十二月二十日到达东固附近。当公秉藩师如期到达东固时，红军已主动撤离，公师扑了个空，却通电报捷，夸大战果（并得到蒋介石的嘉奖和各方面的贺电），但对张独未报捷。张亲率第十八师未能遵照预定日期推进，于十七日停顿一天，致延迟于二十一日晨方迫近东固，适遇大雾，误认公师为敌，竟行攻击，双方激战达四小时之久，互有死伤。事后，虽经解释，但公认为张系功不相让，事出有意，即率部自由行动到因富，脱离了张的掌握，张也负气不再与之联络，致原形成的重点不复存在（公不服张指

挥的重大原因之一是：鲁涤平因经济权在师，有油可揩，蒋虽发表鲁第五军军长，他却秘而不宣，盖军部经费仅有三千元故也；及至发表第九路军总指挥，每月经费有十万元，鲁才感到兴趣，但仍视第十八师师长为块肥肉不肯交出，张辉瓒以副师长代行师长职，公固不服，加以互相火并，故成见更深）。张又借口掩护后方，置兵于无用之地，将朱耀华旅留东固，仅率戴岳、王捷俊两旅向龙岗轻率冒进。十二月二十六日到达龙岗时，又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尚远在百里以外。次晨，继续东进，戴旅先行，离龙岗约五六里即遭遇红军主力阻击。戴旅全部展开应战。此时张仍控制王旅及直属部队于龙岗，不适时增援前方，对翼侧也不设设备。至午后二时许，红军由戴旅左翼迂回，直趋龙岗。王旅及师直属部队竟未进入阵地，即全部遭到歼灭。张辉瓒、王捷俊及所属官兵皆被俘。此时戴旅更陷于四面包围中，突围不得，副旅长洪汉杰，团长李月峰等皆已阵亡，到黄昏时，也全部被歼灭。戴因平日尚得兵心，得以杂在士兵中逃出。留在东固的朱耀华旅闻败讯亦后撤，右纵队方面的战斗即告终结。

我们在南昌得悉张辉瓒在龙岗败讯，即电令谭道源向左纵队靠拢，免再被各个击破。谭按指定路线进据源头后，因红军坚壁清野，无法采购粮食，也找不到一个向导，用谭以后战报的话说：“到赤区作战真是黑漆一团，如同在敌国一样。”因而在源头停顿未动。奉令后即于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源头移动，行抵牛头湾，后卫周翰团即被红军追及。接触之初，又错误地判断不是红军正规军，可以完成掩护任务，不料愈战愈激，不到两小时即被解决三分之二。本队因出发较早，是晚侥幸到达东韶。但红军追击部队亦尾随而至，次日拂晓即以雷霆万钧之力展开攻击。谭师饥疲之余，未取得瞬间喘息机会，立脚未稳，仓卒应战，真如秋叶被疾风扫

荡一样，无力支持，阵地逐渐缩小，致师部完全处于火网之下，指挥系统陷于凌乱，到下午四时许，便全线崩溃，官兵四野乱窜，如鸟兽散。谭道源战斗经验虽丰富，但面临这种局势也只有单骑逃遁。四日到宜黄，本拟从事收容，无奈兵败如山倒，在宜黄未能立足，直到抚州，官兵才惊魂稍定，算是住下来了。点验结果，团长黄敬阵亡，枪支损失在六千支以上。左翼毛炳文纵队闻败讯也就悄悄收了兵。

至此，蒋介石镇压人民革命的所谓第一次“围剿”，遂以人民武力反围剿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当第十八师在龙岗复灭后，鲁涤平曾亲拟一电向蒋介石报告战况，有“龙岗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的伤心语。蒋回电云：“十八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我兄每闻共党，便张皇失措，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吉安为赣中重镇，望严督固守，只许前进，不许后退。”于是鲁只好移驻吉安，收拾残局。这时第十九路军已到达泰和，第二十五路军已到宜春、安福等县，就整个兵力看，仍占优势。但吉安守兵仅罗霖一师，枪不过三千，颇感单薄，而红军主力尚活动于水南、东固间，对吉安的威胁很大。鲁问我说：“万一红军进攻吉安，我们奉令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岂不坐以待毙吗？”我答：“万一红军来攻，我们向泰和靠近十九路军，岂不是前进了吗？”鲁同意。加以罗霖信心很强，向鲁保证可以凭城固守；二十五路军的第七十三军军长高卓东（原系北伐军第六军参谋处长）也说，如吉安有警，他们可以随时驰援。于是鲁也就安下心来。

不久，蒋介石派何应钦接替了鲁涤平的行营主任职务，负责对江西红军进行更疯狂的军事镇压，受到了更大的挫败。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 “围剿”中的龙岗战役

戴 岳

一九三〇年，蒋阎冯混战于中原，江西红军利用了这种形势，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是年冬，红军已经建立了十多个根据地。蒋介石反动派对于中国人民军队和政权的发展，感到极端的仇恨和恐慌。当中原大战结束，即抽调七个师约十万人的兵力进入江西，派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南昌行营主任，负责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攻。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初，鲁涤平以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兼任第一纵队司令，指挥第十八师和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向东固，以第五十师师长谭道源兼任第二纵队司令，指挥第五十师（未另配属部队）向源头，第八师师长毛炳文兼任第三纵队司令，指挥第八师和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向洛口，企图一举歼灭红军主力。这就是后来所谓第一次“围剿”。我当时任十八师第五十二旅旅长，由高安率兵随张辉瓒向东固进发，途经樟树、新淦、永丰、白沙等地。在永丰因修筑飞机场，停留了十多天，在白沙也休息了两三天，才继续前进。

红军原集结于东固，似有在东固作战的企图。但当我军向东固推进时，他们仅留有小部队在东固虚张声势，主力已撤向小埔、黄陂一带。而张辉瓒以为红军尚在东固，分四路（张师两路公师

两路)向东固进行包围。但张师行至距东固四十里的罗坊,忽然下令休息一天。我当向张辉瓒说,各路部队均按进程表前进,如一路停留,可能引起事故。张不听。次晨,浓雾弥天,对面不见人。我旅先头部队到达东固时,果然与先天到达东固的公秉藩师发生误会,自己打了起来,双方死伤多人。公秉藩以首先占领东固报捷,大受蒋介石嘉奖。由于这次误会,公师不愿听张辉瓒的指挥,并不与张见面,即全部开往因富。张对此非常愤慨。

在东固稍停,张辉瓒派我旅向南龙推进,沿途有小接触,我李月峰团一排长受伤。红军似在迟滞我军行动,或者是诱我深入。我到南龙的次日,与主任参谋练光枢到附近侦察地形,发现荆棘丛中隐匿妇幼不少,证诸沿途找不到食物和应用东西的情况,知道苏区已采取空室清野的措施。在南龙约停三天,没有发生战事。十二月二十六日正午,部队到达龙岗。龙岗位于永丰东南一百八十里,圩镇铺屋约三百余家。当时圩场上寂无一人,但遥见远山红旗隐约,我认为情势是相当严重的。当日午后五时许,张辉瓒率王捷俊的第五十三旅及师直属部队(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骑兵连)开到龙岗。先一日我曾写信给张,请他全部开来,东固不必留兵。他不听,仍留朱耀华的第五十四旅在东固,说是维持后方交通。是晚九时许,师部召开军事会议(师部驻在圩上一铺屋内)。张辉瓒首先说明谭道源师望援甚切,本师奉命驰援,定于次日继续前进。问我们有无意见。我建议停留一天,急电朱耀华旅于次日午前赶来龙岗,电公师于次日午后开达表湖(表湖距龙岗五里),两师齐头并进,互相策应,可立于不败之地。张说:“救兵如救火,应迅速前进,不宜迟疑。”我再询问红军的情况,张说红军与谭师相隔很近,恐已接触等语。我又力争说:“据判断,红军原想诱谭师深入山谷,以便一举予以歼灭,及见谭师不进,并

择地构筑工事(我接到谭师电),解决比较困难,又知我师前来增援,如两师会合,解决更不容易,势必暂时牵制当前之敌,其主力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先来解决我师,然后再回头打谭师。……”张坚持谭师迭电催援,想已接触的成见,指我为判断错误,不肯采纳。并谓命令已下达,各部明日须遵令前进,不得延误。当时参加会议的师参谋长周维黄因病未发言,旅长王捷俊表示唯命是听。其他如副旅长等见张态度坚决,更不敢持异议,会议于是结束。

回溯红军全部出动时,过永丰、经新淦而趋樟树,南昌震动。我彼时驻防峡江(新淦与吉安之间),张辉瓒一再令我渡江邀击。我以敌前渡江很危险,不如尾红军之后,使其不敢进攻南昌,因此没有执行张的命令。红军到安义、奉新时,我率四个团驻涂家埠,与驻万家埠的红军相距二十余里,我不敢战,以战而失败,则将危及南昌、九江。当红军入湘,令我进驻万载以威胁红军之后;但我以红军力量大我三倍以上,我只能守而不能攻,且我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南浔,不能远救湖南,因此,我仅派一个连到万载,而以主力驻在高安。几次没有执行张的命令,已遭到他的疑忌和不满,这次提议停留一天,张更疑我无心作战。我回到旅部后,自思遵令前进必失败,不进则将指为抗命,终夜徬徨,莫之为计,而天已拂晓,部队于六时就出发了。时为十二月二十七日。

部队开出龙岗约五六里,先头黄钟团遇伏接战。我当即督队前进,与红军展开激烈战斗。红军数次向我中央阵地冲击,未能得手,即转向两翼包围,我亦增兵向左右延伸,相持半日之久,阵地无变化。中餐后,红军陆续增加,我正面兵力颇形单薄,乃将情况报告张辉瓒,并请其派兵增援。张仅派出一个团向前推进四里许,没有加入第一线,不作有力的支援。我再次催援,张说

已派陈团来了。我当时不解增援部队为什么不加入第一线。主任参谋练光枢说：“师长可能是别有打算，如前线胜利则一同前进，失败则率其控制的部队退东固以自保，必不肯努力增援。”我说：“失败将同归于尽，前后方均无法自全。”午后三时许，红军以一部兵力从我左后方绕袭龙岗。张辉瓒但注视正面，对侧后无戒备，到红军逼近时才察觉，以致未发一弹，自己直接掌握的部队约五千人全部被缴械。张辉瓒仓卒逃匿，旋即被擒。师参谋长周维黄、第五十三旅旅长王捷俊亦同时被俘。

在龙岗被缴械及溃散的官兵，一时行动纷乱，有些跑向我阵地后方，红军跟踪而至，我前后被夹击，军心动摇。我当即下令转移阵地，占领小溪南面一带高地。因山势陡峻，攀登吃力，待到达山顶时，红军亦已跟踪而上。混战不到一小时，官兵续有伤亡，副旅长洪汉杰亦战死。我率兵一部突围，被红军层层截击，苏区少先队亦持梭标拦阻。我且战且走，从者渐少，李月峰团长亦阵亡。时近黄昏，我已无法突围，率二十余人逃入茶林中隐匿，战事也就结束了。

是夜，我混于伤病兵中在阵地附近山上的“祇园”（一所破败的僧寺，住有农民）度过。二十八日黎明，我与从者十二人分散隐藏于山谷中，他们皆被搜出，我幸获免。黄昏以后，下了毛毛细雨，饥寒交迫，颇不能耐，不得已，只好再爬进“祇园”。一农民以我为奸细，我以患病失队告。他怜我饥寒，初授以火（火箱），继之以烟（水烟袋），旋引入室内共餐。老母妻女，一家四人，均甚殷切。饭后略谈一会，送我就寝。室内颇整洁，帐被齐全，我知道是他们的卧室，不敢去睡，坚请宿于正厅草房中。我心绪不宁，坐而假寐。夜半，犬吠声中似有人细语，起而视之，则是来找我的士兵。我略问情况，知红军已去打谭师，我们被缴械的官

兵已领了路费和放行证离开了龙岗，他们在离龙岗约十里处听候寻我的消息。彼时，我无暇谢主人，即随之循小路（大路设有岗哨，我不敢走）跋山涉水，回到南昌。

龙岗战役结束之夜，红军不顾疲劳，星夜回师去打谭道源。“先捉张辉瓒，再打谭道源”的欢呼声响彻山谷（副官曾仲元告我）。谭师闻讯逃逸，也被红军追歼一部。毛炳文部则闻风向南丰方面逃走了。

据被俘官兵告我，龙岗战事结束后，毛主席曾集合俘虏讲话，愿意回家的每人发给路费三元。大家非常感动，说张辉瓒扣饷不发，有时连买毛丝烟都没钱，我们打了败仗，毛主席不但不杀，而且发给我们的路费，今后我们再不愿与红军打仗了。有人说，王捷俊当时混在俘虏队伍里，低着头坐在田塍上，有对他不满的士兵向他说：“旅长，你也想来领路费吗？”因此，被红军发觉了。当时，我潜藏在山林中，被俘后又来找我的军士戴昭明、程琦认为躲不脱，劝我出去见红军。我以罪不容诛，终不敢出去。今日回首前尘，不禁汗颜无地。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抗日时期国民党的“湘鄂赣边区”

刘 公 武

一九三八年，蒋介石从武汉撤退时，组织湘鄂赣边区（以下简称边区）挺进军，表面上说是向敌后“挺进”，开展游击战，牵制敌人继续进犯；实质上则是防制中共，特别是防制新四军在边区活动，所以边区的核心地区就是老苏区。

初由陈诚保举樊崧甫为边区挺进军总指挥，后改委李默庵、王劲修相继接充，至一九四二年六月，宣告裁撤。我在李默庵任内充当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兹就回忆所及，将边区的组成经过和活动情况，略述如后。

樊崧甫时期的边区挺进军

樊崧甫受命为边区挺进军总指挥，设总指挥部于修水所属的梁塘。其时，尚未明确划定边区的范围，偏重军事活动，只是收编地方团队和从武汉溃散下来的散兵游勇，组成了八个挺进纵队。纵队相当于旅，下辖支队、大队、中队和分队，相当于团、营、连、排。以孔荷宠为第一纵队司令，康景濂为第二纵队司令，钟某为第三纵队司令，徐道南为第四纵队司令，尹立言为第五纵队司令，王作楫为第六纵队司令，×××为第七纵队司令，方步舟为第八纵队司令。各纵队主要分布在鄂南，次为赣西北，再次为湘北。支队司令以下多由地方行政官吏兼任，例如临湘县长王翥

波就兼任了一个支队司令，助长了他在临湘作恶的凶焰。各纵队无一定的名额编制，人枪多寡不一，一般都是人多于枪。当时号称有两万之众，基本上是由各县、乡、保的地方团队和地主的武装拼凑拢来，加以改编的。经费方面，除各纵队司令部由总指挥部发给一点活动经费而外，其他官兵给养都是就地自筹；因之，摊派勒索，花样百出，搞得地方鸡犬不宁。群众反映挺进军是：游而不击，见敌则逃，扰民有余。

樊在任内，虽偏重军事，但未忘情于党政，曾在梁塘设国民党湘鄂赣边区特派员办事处，自兼特派员，以袁雍为书记长，企图插手湘、鄂、赣三省先后沦陷县份的国民党党务，做到所谓“地方党政配合”，以利于军事行动。但是，各沦陷县份的国民党党政人员都已逃跑一空，无从下手；加之三省的党政头目，认为樊的措施是破坏省政的统一，是干涉地方党务，因而磨擦横生，争吵不休。樊在莫可奈何的境况下，感到既是空头总指挥，又是光杆特派员，无可施展，遂跑往重庆，坚请辞职；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改派第八军军长李玉堂（原拨归樊指挥）暂行兼代总指挥职务；旋将总指挥部移设在军部所在地——武宁南茶。一九四〇年一月，蒋介石以李默庵是驻湖南祁阳的军训部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以下简称游干班）的教育长，借口“收训练与作战合一之效”，改派李默庵接充边区挺进军总指挥。

李默庵的边区党政军一元化

一九四〇年二月，李默庵派周兆熊以总指挥部副官处副处长名义，率领先遣人员，前往接收边区挺进军总指挥部。原驻梁塘的樊总部参谋长张润生对周说：“这个总部除一堆公文外，没有什么可以移交的。”驻在武宁南茶的李玉堂则把住总指挥部的关防印

信，抗不移交。一时出现了三个总指挥部互相争吵的丑剧，直到李玉堂调往第三战区，才告一段落。四月间，李默庵到达梁塘，正式就职，随将总指挥部迁设修水所属的漫江。

李默庵到任之初，野心勃勃，以为大有可为。首先，他亲到鄂南几个沦陷县份考察一番，一面了解地方情况，一面施展欺骗伎俩，妄想收揽人心。根据视察结果，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开拓湘鄂赣边区新计划”，要求明确划定边区的管辖范围，实行“党政军一元化”，建立边区整套机构，统一指挥。这些条陈完全符合蒋的防制中共的阴谋，因而全部获得批准。至是始明确划定一九四〇年沦陷的和贴近沦陷区的县份，即湘北的临湘、岳阳、平江、浏阳等四县（原属湖南第一行政督察区），鄂南的武昌、大冶、嘉鱼、阳新、鄂城、咸宁、蒲圻、崇阳、通城、通山等十县（原属湖北第一行政督察区）和赣西北的修水、武宁、铜鼓、宜丰、靖安、奉新、永修、安义、星子、瑞昌等十县（原属江西第十行政督察区），合共二十四个县为边区管辖范围，共有人口约八百万，面积约十万平方公里。

同时，他企图使边区党政军一元化，从而巩固边区阵地，开创一个独立局面。首先是建立和充实总指挥部的机构：派王劲修为副总指挥，戴之奇为参谋长，并负责组设前进指挥部于武宁南茶；另由军统配设调查室，以何际元为主任，同驻南茶；又派罗觉元为参谋处处长，顾隆均为副官处处长，刘隽为军法处处长，陈敬熙为军需处处长，寿山为军医处处长，谢家驹为兵站支部长；增设政治部，以刘公武为主任。总指挥部所属的纵队司令部以下，均无编制经费，无法增设政治工作机构。因此，政治部直属的只有一个政工大队，以萧美西为大队长，下辖歌咏、话剧两个队，分驻于修水漫江及武宁南茶两地。

其次是加强军事力量。当李默庵的总指挥部刚刚改组，薛岳就将原来拨归挺进军总指挥所指挥的第九十九军傅仲芳部调走了，使李感到仅仅遥领几个残破不堪的挺进军纵队，不啻是个光杆总指挥。为了支撑门面，只好把自己在交卸第十师师长时所偷存下来的几百支长短枪扫数运到漫江，用来组成了一个特务营，派亲信周奠民为营长；又加派周淘漉（原第十师的旧部）为步兵指挥官，魏仁鉴为副指挥官，下辖两个补充团，以方正为第一团团长，李伯勋为第二团团长。为了组织这些新部队，曾四出拉丁，增加了地方群众对挺进军的恶感。

第三是为了打入和控制地方党政机构，从而为实现所谓一元化打下基础，即将游干班迁到漫江，调集挺进军分队长以上的干部、各县的国民党县党部和三青团分团部的骨干分子、各县的区乡长以上的在职人员，实施以三个月为一期的“游击战训练”，实质是以拥护蒋介石独裁为中心的法西斯教育。在漫江先后办过第五、六、七期，约共集训了一千五百人左右。李默庵对于利用游干班来集训边区党政军的骨干分子一举是抱有较大的幻想的，他妄想效颦蒋介石，通过集训，来与边区的所有党政军的骨干分子建立师生关系，从而控制地方的党政军务。为了加强训练工作，当游干班迁到漫江以后，对它的内部人事曾作了一番调整：以副教育长刘嘉树兼办公厅主任，李明智副之，韩濬章为教务处处长，郑洛为总务处处长，陈敬熙为经理处处长，寿山为军医处处长，刘公武为政治部主任。每期集训的学员组织为一个总队，先后派尹立言、万砣成、周淘漉等为总队长。此外，还设立了国民党西南游干班特别党部，李自兼特派员，以刘公武兼书记长。每期训练结业前，都举行一次集体入党的宣誓仪式。

第四是利用游干班的毕业学生为骨干，于一九四〇年八月，

在漫江新建三民主义青年团湘鄂赣边区团部筹备处，李自兼主任，刘公武兼书记，即以原在祁阳的游干班第三期毕业学生为各县建团骨干。除接收湖南三青团支团部移转管辖的岳阳、临湘、平江、浏阳等四县分团部为基础外，还陆续新建了江西的修水、铜鼓、武宁、靖安、瑞昌和湖北的通山、通城、崇阳、嘉鱼、蒲圻等县分团筹备处，共吸收了新团员约近千人。

最后，他企图统一党政指挥，从而实现其所谓一元化，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在漫江成立湘鄂赣边区战地党政委员会区会，李自兼主任委员，唐鸿烈为副主任委员，以边区的党政军一级主管——国民党边区特派员办事处书记长、三青团边区团部筹备处书记、各有关的行政督察专员和挺进军的副总指挥、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各纵队司令等为委员。李默庵妄图利用这个机构来统一边区的党政指挥，建立一个“边区政府”。李的这一企图。首先就遭到湘、赣两省的反对。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以身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认为湘、赣和鄂南三省战地都属他的指挥范围，不愿别人在他的辖区以内别树一帜，因而对李公开表示不满；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也不卖账，硬性表示不准他人过问他所辖地区的行政。剩下的只有鄂南一隅。由于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远驻在鄂西的恩施，对于鄂南沦陷各县，鞭长莫及，加以李默庵曾是陈诚的旧部，现在又向陈多方讨好，才取得了陈的同意，委任边区挺进军鄂南指挥官彭旷高兼任湖北省第一行政督察区专员，并委派游干班职员颜健为崇阳县县长，万廉为通城县县长，岳锡山为通山县县长，萧正谊为嘉鱼县县长，邱岳为蒲圻县县长，作为在边区推行党政军一元化的开端。又在战地党政区会之下，设立一个党政工作总队，来开展实际工作，以万劭成为总队长。总队下辖三个大队，每大队辖五个分队，每分队约三十人，多是以游干班各期毕业的

学员充任，负责协助边区所属鄂南各县的民众组训、运输、军队联络和搜集敌后情报等工作。总队部先设在武宁南茶，以后推进到崇阳傅家山。

尽管边区的党政军一元化已经有了鄂南一隅的雏形出现，但是，既不能掩盖住边区的种种困难，也不能满足李默庵个人的欲望。李默庵妄想整饬挺进军的军纪，提高它的战斗力，使之逐步走向正规军化，曾经发出不少的空头支票，进行过一系列的欺骗宣传，例如说：要统一发饷，统筹补给和补充械弹等等。结果是年复一年，徒成画饼。散布边区的挺进军，都是些衣不蔽体、食不得饱、枯瘦如柴的叫化子兵，所需给养一直是各自就地摊派勒索，加以军队纪律荡然，日夜四出搜括，弄得十室九空，怨声载道；军官则大都挥霍无度，凶横残暴；因之，军民之间固形同水火，官兵之间亦有如仇敌，“愿与偕亡”的愤懑情绪，随处可以听到。再则，各地方原有一套党政机构，李默庵为了一元化，又另外建立一套，以致边区所在地，机关林立，人浮于事，终日勾心斗角，争吵不休，除了扰民以外，别无其他作用。当一九四一年九月，湘北日寇为了策应进犯广州，一度沿粤汉线佯攻长沙，国民党正在空喊“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时候，边区挺进军既不能“挺进”，也不能游击，根本不能起到牵制和阻击日寇的丝毫作用；至于边区党政人员，一闻日寇进攻的消息，就惊惶失措，纷纷准备逃命。李默庵处此境况，束手无策，牢骚满腹，曾对我谈及抗日初期，自己从西北战场被解除军团长职务一段往事，怨愤地说：“胡宗南有什么本事，只是生得地方好；我们湖南人是得不到信任的。如今象边区这样的‘烂场伙’，怎么拖得下去？”此时，李默庵感到边区的党政军一元化已经到处碰壁，独立王国的幻想已经破灭；另一方面，李是以贪财好货著名的，边区油水不多，不能满

足他的欲望，遂决计脱离这个“烂场伙”，另找出路。恰好英国驻重庆的军事代表团听到西南游干班迁到边区实地训练游击战的虚名，于一九四一年十月派朱勒少校等二人来到漫江参观。李趁此机会，剽窃了中共方面的游击战术的一些皮毛，向朱勒等大肆吹嘘，因而获得了英国军事代表团的同意和蒋介石的批准，中英合作组训游击部队。即以西南游干班为基础，中国出人，英国搞爆破技术，成立突击部队，以营为单位，配备轻装，准备参加远征军，援缅作战。这一遭遇使得李默庵喜出望外，认为洋人有钱有枪，大有前途，立即如弃敝屣般地摆脱了边区职务，于一九四一年年底，仍旧带着西南游干班的老本钱迁回祁阳，在中英合作的名义下，继续搞他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去了。

边区内外矛盾重重

李默庵接收边区总指挥部以后，妄图在边区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首先就与湘、赣两省当局发生矛盾，已如上述。其次，边区总指挥部与驻军之间、总指挥部与地方封建势力之间，甚至总指挥部内部都是矛盾重重，明争暗斗，与总指挥部共其始终。兹择要纪述如下。

(1) 李默庵与杨森、王陵基之间的暗潮。长期驻在平江的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和驻在修水的第三十集团军王陵基与边区挺进军李默庵之间，在强寇压境的时候，不但从来没有过互相协作，互相配合、发挥共同抗敌的作用，反而是互相歧视，互相排挤。杨森认为平江是他的管辖区，李默庵的一元化就不能化到平江。平时彼此不通来往，虽然没有发生过正面冲突，但暗中互相攻击，不遗余力。杨认为李搞的这一套是多余的，徒然增加麻烦，没有理睬它的必要；李则指摘杨是老军阀，不服从国民党中央。至于

王陵基和李默庵，同驻修水县境，相距咫尺，双方都在挖空心思应付门面，特别是王对李戒备甚严，总是耽心李向蒋介石打他的小报告。王曾暗中对薛岳说：“李默庵是空头总指挥，搞的尽是一些杂路，没有什么用处。”而李则总是攻讦王的部队军纪败坏，企图取而代之。李默庵一向是以蒋介石的嫡系自居，自以为对于杨、王这些杂牌部队有监视之权，因而经常盛气凌人，更为杨、王部属所痛恨，以致挺进军与川军之间势若水火。在老百姓看来，则是一邱之貉，所以当地流传着：“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川老鼠窜到家，遭殃受害，无处告发！”和“挺进军，贼子心，不打日本人，只打老百姓”的歌谣。

(2) 戴之奇和刘公武的龃龉。戴之奇原任游干班政治部主任兼总队长，和副教育长刘嘉树争宠，闹得丑态百出。在游干班迁移前，因戴、刘积不相容，戴即随同李默庵先到漫江，被调为挺进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充当李默庵走陈诚路线的一名小卒。

游干班第三期有一个女生队，在祁阳毕业后，被骗到漫江，参加三青团边区直属区团部筹备处和修水山口镇的户口调查工作，由新任游干班政治部主任刘公武领导。戴之奇自以为是这队女生的老师和上司，应该受他的节制；我却不肯卖账。因此，戴与我之间时有龃龉。一九四〇年十月某日深夜，总指挥部军法处处长刘隽来找我，告称：“接到戴参谋长从南茶来电话，指出两名女生（广东人，姓名记不清了）不服从调配，不肯去前方工作，有共产党嫌疑，要军法处即晚逮捕审讯；如再不听从命令，就把她们活埋掉。”我们晤谈以后，一致认为这是戴蓄意陷害，立即同去找李默庵，李同意了我们的建议，把两名女生资遣他去了事。戴之奇因此十分羞愤，增加了对我的恶感。戴一直玩弄女生；同时，为了讨好于总指挥部的几个无耻“将官”，经常介绍女生伴同

他们游玩，甚至姘作姨太太。戴自己向来惧内，不敢公开与女生姘居，乃借口收女生张玉珍（浙江绍兴人）作干女儿，随侍左右，当作勤务兵使用，实则暗加玩弄，以饱其性欲。后来，张玉珍经我指点开导，才脱离了虎口。从此，戴对我更加含恨在心，时图报复。

（3）彭旷高和尹立言的内哄。彭旷高原任游干班办公厅主任，自从调任挺进军鄂南指挥官兼湖北省第一行政督察区专员后，驻在鄂城县境，把鄂城作为试行边区党政军一元化的起点。他以为既有军事指挥权，又掌握了行政权，党、团也都归他兼管，不啻是李默庵的化身，加之处在敌后，独当一面，大可便宜行事。于是借整顿游杂部队，统一开支为名，实行统一税收，发行纸币，大肆进行搜括。挺进军第五纵队司令尹立言则认为鄂城、阳新一带是他的管辖范围，只能由他为所欲为，仍然照常设卡收税，摊捐派粮，不容许彭来插手。因此，彭、尹之间，明争暗斗，已非一日。彭见尹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恐其取己以代，乃先发制人，于一九四一年十月，出尹不意，突然将尹扣押，星夜解送南茶总指挥部，指控尹不听指挥、扰害人民等罪，以为可以得到李默庵的支持。尹被解到总指挥部后，对彭反咬一口，控诉彭在职作恶多端，罪不容诛。李默庵感到左右为难，遂向上推卸，电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请示。由于尹是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高参外调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一班掌权的高级干部都是尹在陆大特三期的同学，凭借这些关系，结果薛岳以“着毋庸议”四字，不辨是非曲直地将尹释放了。至是，彭认为大丢面子，愤而辞职，跑到恩施去了。彭去后，由挺进军副总指挥王劲修兼任彭所遗职务，另派总指挥部高参周芸寰为挺进军鄂南指挥部参谋长，代王负实际责任。

(4) 边区挺进军与地方封建势力的矛盾。边区挺进军与修水地方势力虽然同是反共，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仍很尖锐，甚至酿成武装冲突，其中突出的为修水新民乡徐某（名字记不清了）父子被杀事件。徐某世居修水县漫江北面的山区里（与平江县毗连，是湘赣边老苏区的据点之一），早年做过北洋军阀时代的“京官”，后来寄住南昌。工农红军北上抗日之后，从他的学生廖某（任江西省保安副司令）处，借得步枪九支，组织还乡队，回到老家，强从邻乡划出五个保，单独建乡，命名为“新民乡”，屡次报请县政府备案，均未批准；县政府一再严令撤销，徐某也置之不理。建乡以后，徐某倡言“地方自治”，自立规章，按照丁亩，派工摊捐，指定其学生某（姓名记不清）为乡长，他的第二个儿子为乡自卫队队长。徐某自以“师长”“族长”“家长”之尊，在上发号施令，成了这个乡的“土皇帝”。抗日军兴，徐某复假借保卫乡土的旗号，积极发动和组织在乡壮丁，轮流实施军事训练。通过多次收缴邻近乡保和散兵游勇的枪枝，共积有长短枪百多支，遂自行规定“壮丁不离境，税粮不外调”，实行抗丁抗税，县政府莫奈之何。一九三九年，徐某的大儿子徐梦苏（北京大学毕业，三十岁左右）在贵阳某学校教书，请假归省，目击老父处境艰险，遂自动留在家乡，帮助他的父亲，因而声名更大。当局指摘徐梦苏是“共产党”，图谋铲除徐某父子，更加迫切。其时，赣北行政督察专员熊某迭次唆使驻军使用一团以上的兵力，袭击新民乡，由于徐某父子利用了崇山峻岭的有利地势，采用了坚壁清野的有效办法，使得驻军屡次扑空而归。如是僵持经年。

边区的机关驻在漫江，背倚新民乡，中隔一高山，相距仅十多里，正是边区机关的重要后方。因此，李默庵责成我负责解决僵持已久的新民乡问题。我受命后，与徐某父子往返商洽，于一

九四〇年十二月，将新民乡自卫队收编为挺进军的一个大队（相当于营），派徐梦苏为大队长，他的弟弟改任中队长，划归王理直支队建制，并开赴武宁南茶，实施训练。因支队部对徐氏兄弟歧视、压迫，迫使徐梦苏于一九四一年三月，率队袭击王理直支队司令部之后，拖队连夜南逃。参谋长戴之奇与我原来龃龉已久，见我所经手收编的队伍发生了叛变，正好乘机报复，遂危言耸听地说：“这是共产党有计划的暴动，将要进攻漫江，抢劫仓库。”其时，对于徐队的叛逃，南茶既无兵可以追击，徐队所经过的中途又无兵可以拦截，漫江兵力单薄，只是仓皇准备应变。我当时住在漫江，当夜接得李默庵电话，得知徐队叛乱情况，同时，也知道戴之奇正在乘机报复，张大其词。因此，我在电话中回复李说：“徐梦苏既不是拖队北去，而是南窜，这决不是共产党的问题，也不可能进攻漫江，一定是逃回老家去了。只等天亮，我决计亲往新民乡与徐某父子面商收拾办法。”翌晨，我往新民乡，由乡长带路，在深山中找到了徐某，伴同他到乡公所。午夜后，徐梦苏也只身来和我见了面，言辞激昂地对我说：“我这次是‘反压迫’、‘反黑暗’，一时莽撞，没有考虑后果，只决心三不当：不当汉奸，不当土匪，不当共产党。现在，人都打散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一切由我负责，不要连累其他的人。”翌晨，随同我去的周营长对我说：“已和总指挥通电话，命我派兵把徐家父子在今日午前分途解往漫江审讯。”我当时认为徐梦苏既已投案，不必再将他的父亲连同解去。周却低声密告我说：“据乡长谈，如将徐某放出，他们冒得活命。”并说：“徐某最爱告上状，将来可多麻烦，总指挥指示，一定要把他们父子一起解去。”当天下午，据报徐某在半途企图逃脱中被击毙了。后来，徐梦苏经过军法审判，以率部叛变，围攻支队司令部，抢缴守卫枪枝，劫夺军饷等罪证，被执行枪决。在逃的

徐某的第二个儿子，不久，也由王理直支队在平江四明山缉获，解到南茶处决了。

王劲修的最后挣扎

王劲修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升任为边区挺进军总指挥，并接充李默庵在边区所遗各职之后，将总指挥部迁并到南茶；同时，将边区党政区会等机关移进到与南茶相距约五里的回坑。除由黄炳阳接替我为政治部主任和三青团边区直属区团部筹备处书记外，其余各单位的主管人很少更调。

王劲修接任以后，仍图继续挣扎，不仅努力支撑残局，而且企图有所作为。无如李默庵把新组成的一点兵力改编为突击营随身带走了，以致王没有一兵一枪的基本力量，对于各纵队一贯要求增加经费和补充械弹等迫切的具体问题，更是束手无策，因而逐步削弱乃至失去了对各纵队的控制和指挥作用；加之，与王陵基总部同驻在一个地区，机构重叠，矛盾丛生。对于此种现象，薛岳早已表示不满。过去，因为李默庵直接依恃蒋介石，薛对李还有所顾忌，莫可奈何；王劲修却是势孤力单，显然可欺；遂借口调整战斗序列，裁并重叠机关，呈准裁撤边区，命令将所有冠有边区头衔的各种机关于一九四二年六月一日一并撤消。除调王劲修为沅陵师管区司令，黄炳阳为长沙县县长和唐鸿烈仍回重庆外，其余党、团、政等组织和各级人员都仍按建制移归各省接管安排。至是，国民党的湘鄂赣边区正式宣告结束。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国民党苏浙皖边区挺进军总部见闻

刘 漱 石

(一)

一九四三年一月，顾祝同（三战区司令长官）发动皖南事变后，更进一步加强反共措施。他将原驻浙西于潜的第一游击区总指挥陶广驻防皖南歙县，改称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成立副总司令部（原驻歙县的第二十三集团军川军唐式遵部调驻江西婺源），辖第二十八军第六十二、一九二两个师（仍驻浙西），第五军所属一四四、一四五、一四六三个师（驻皖南），第一挺进队（驻浙西），第二挺进队（驻苏南），忠义救国军（军统特务武装，驻苏南宜溧、皖南郎广地区，周伟龙、马志超先后任总指挥）及五十二师（驻皖南宁国河沥溪附近）等部。并强调所谓“总体战”，实行党政军一元化，将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江苏省党部江南办事处、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浙江省党部浙西办事处、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划归该副总部指导。一九四四年一月，复改组为苏浙皖边区挺进军总司令部，陶广仍任总司令。当时，我任总部办公厅主任。

为了奉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这样一个军事指挥部里，还设有所谓“党政处”，处长是由战区联秘处（党政军特种联席会报秘书处的简称，主任秘书为军统特务卢旭）委派中统特务姜子匡专任（姜到任前由总部参谋长谭道平兼任了一

个时期)。处内分总务、民政、调查三课，由各行署、党务办事处派代表一至三人参加工作，以加强联系。但调查课长一职非一般人可得充当，谭道平兼处长时期，由中统特务丁静如担任，娄子匡接任处长，由卢旭介绍刘治汉担任。另有党政工作队，设队长一人、队员十人。关于防共工作，党政处直接听命于战区联秘处，调查课和党政工作队又直接听命于处长，对其他人员严守秘密。娄子匡接任处长，党政处从离歙县城二十华里的棠樾村迁至城内办公，工作人员由联秘处委派，经费亦由联秘处拨发，以致该处的许多事情，连陶广也无从过问，往往只将普通公文送他签行划诺而已。一九四四年二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派CC特务黄先明抵歙，成立边区挺进军特别党部，陶广任特派员，参谋长谭道平、参谋处长萧敦复、党政处副处长唐升节、办公厅主任刘漱石等任执行委员；黄先明任书记长，实负其责。五月，战区联秘处又派军统特务李如河于总部设调查室，李充主任，也在歙县城内办公。冠以总部名称，只不过为李如河作掩护其特务活动的幌子。一九四五年夏间，长官部又附设赈务处于总部，袁季梅任处长，假歙县城内江苏农民银行办公。该处名为收抚、救济陷区流亡青年，其实是为防止其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罢了。以上这些机构，虽各立门户，但他们在反共方面则是一致的。

一九四四年一月和一九四五年二月，陶广曾两次召开边区党政军联席会议，各军师团长以上军官、行署主任、行政督察专员、党务办事处主任均出席。长官部派战区联秘处主任秘书卢旭莅会指导。会议主要内容：听取党政军负责人汇报共产党活动情况，决定“防制”对策及“清剿”计划（仅记当时活动于皖南黄山地区的有胡明、老高部队）。并针对共产党的“三山一湖”（天目山、黄山、茅山和太湖）计划定出省县“越界追剿”及正规军、地方团

队“联防协剿”办法（因系军事机密，笔者虽担任大会副秘书长，但未参加分组讨论，不悉详细内容），以加强防共剿共措施。

蒋帮的反共反人民，是不遗余力更不择手段的。一九四四年秋，川军一四五师团长张昌德在皖南前线叛变投敌，易帜伪和平军，张被任为师长。张昌德投敌后，顾祝同曾派员（似为长官部高参柏良，四川人）前往示意，与张成立默契，相约在“防共”的共同目标下“互不侵犯，和平共处”。更有甚者，一九四五年二月，陶广承顾祝同意旨，派总部参议杨思义潜至上海勾结南京伪组织协同“防共”。杨思义在沪，曾与陈公博、周佛海、唐蟒诸逆及伪浙江省政府主席丁默村见面密谈，传达顾、陶意旨，希望南京伪组织全力控制京、沪、杭三角地带，防制共产党势力渗入，于日寇退却时完整地交给国民党政府接收，立功赎罪。陈、周表示同意，并派督练处长张海帆偕来“报聘”，周逆佛海并有亲笔信由张海帆带交顾祝同（抗战胜利后，周逆在江苏高等法院受审，杨思义曾出庭为周作证；陈公博供词中亦提及陶广派杨某到沪商谈防共之事）。

一九四五年六月，张海帆随杨思义抵歙。顾祝同得报，电约杨、张赴江西铅山长官部秘密会谈伪军防共事宜。旋派柏良随张海帆去沪，商定战区与伪方在沪设参谋团，拟议以柏良为团长。张、柏经浙江淳安循水道赴杭转沪，时已接近日寇投降前夕，上海形势紧张，国民党驻沪机关被搜查封闭，人员被捕者日有多起。柏良抵抗，畏缩不敢前进，张海帆单独返沪复命。丁默村将柏良匿藏于某女职员家中，直至日寇投降后始露面。张海帆、柏良去后，杨思义于七月间又衔顾祝同、陶广命赴沪继续活动，直至日寇投降后才回徽州。

(二)

蒋帮军政要员在抗战时期除积极反共外，并营私作弊，大发“国难财”。当时，苏浙皖边区未沦陷各县，距离陷区近者数十里，远者二三百里，由于地理条件，该边区成为三战区商货集中吐纳之地。边区军政首脑多利用职权，借物资交换之名，行走私肥己之实。其方式为集团走私，武装护运。有些人则贿通武装力量或地方政府，掩护出入陷区。因之，此一三角地带，出现畸形的繁荣局面，官商勾结，利益均沾，酒肉征逐，烟媚酬应，几无虚夕。

先是，陶广驻浙西于潜时，曾以第一游击区总指挥名义，设“义民工厂”于昌化，假收容难民、生产自给的幌子走私牟利，以军米、桐油运往敌伪区，换回食盐、布匹、百货、香烟等物资至后方倾销。资金来源主要靠银行息借，由其同乡伪安徽电政局长匡经猷居间接洽。又私卖枪弹，一部分系陶部驻湖南时谎报兵员浮领扣发的库存，一部分系陆续收买民间流散枪枝。另一部分系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委托转手售卖。刘建绪在湖南时办有军械修理厂，抗日军兴，刘调任第十集团军总司令，驻浙江金华岭下朱，军械厂随迁至金华，专修破旧枪枝，抵换新枪发给部队，将新枪委托陶广转运陷区，卖给游杂部队及伪和平军。陶广调驻皖南后，昌化“义民工厂”仍继续经营，另于屯溪设皖南印刷厂掩护走私交易。总部参谋长谭道平扬言为总部官佐调剂生活，也委其亲信邹建藩（总部秘书），经常往来于浙西、皖南经商。

边区军政首脑走私经商，自陶广以下几乎无一人不染指者，相习成风，恬不为怪。例如：第二十八军军长陶柳、第一挺进队司令钟光仁，除代陶广私卖枪弹外，亦以军米、桐油运入陷区换回食盐、百货至淳安、屯溪销售；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每委派一

县长，责成一次缴现款若干，购买枪枝，实际上是变相私售武器。

一九四四年春，三战区军法执行监王震南（蒋介石表弟）至歙，会同边区总部设食盐监察委员会于淳安，名为查缉私盐，实则征收私盐规费，致使食盐出现黑市，加重了食户的负担。当时，王震南参加了战区军风纪巡察团，由上饶至歙县视察，随带宪兵一班押运私盐两卡车，委托歙县城外渔梁镇盐业公会孙衡甫四处兜售。王震南又垂涎皖南木材厚利，串同陶广设木材出口监察委员会于宁国之河沥溪。陶广派总部参议唐升节、王震南派军法执行监部督察官钟子然为委员，抽收走私木材规费，间亦以低价勒买走私贩运，直至日寇投降，总部撤销，该会始行结束。

（三）

蒋介石培植嫡系势力，排斥地方军队的一贯手段，对于陶广也不例外。陶广所部系湘军班底，地方色彩浓厚，陈诚、顾祝同一贯加以歧视，久已蓄意消灭，餉械补给与中央嫡系军队相差悬殊，陶部高级将领深感不满。陶广任总司令期间，战区厉行“幕僚长制”，关于边区军事部署指挥，概由参谋长谭道平负责，谭直接秉承长官部命令，陶广徒拥虚名。陶素以儒将自命，平日喜爱临帖作字，此时抑郁难伸，表面上只好寓情于金石书画，附庸风雅，其实，仍时刻热衷于名利。他看到刘建绪、王陵基以集团军总司令擢任福建、江西省主席，亦大做其先得集团军总司令而后过渡到省主席的迷梦。一九四五年六月，总部还开办了干部训练班，积极培养扩军基干；办有《明报》三日刊，作为对外的宣传工具。当特别党部书记长黄先明一九四五年春去渝时，陶曾托黄去见陈立夫，致投靠之意；又乘第二十八军军长陶柳赴渝出席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便，求助于陈诚。陶寄以满怀希望，覬

觊的对象是湖南省主席。八月，日寇投降，苏浙皖边区挺进军总司令部奉令撤销，军官佐编入第十七军官总队办理退役转业。撤销令突如其来，陶广多年处心积虑的想望，顿成泡影。他痛心于乌尽弓藏的命运，对中央及陈、顾大生怨怼。陶后来退役流寓杭州，杭州解放前夕，被浙江省政府诱捕，经其旧部营救获释，解放后病死杭州。

（民革湖南省委员会供稿）

蒋帮勾结日伪反共的一幕丑剧

杨 思 义

一九四五年二月，蒋帮第三战区长官部在苏浙皖边区挺进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的徽州棠樾召集了一个重要的秘密会议。会议主持者是第三战区战地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卢旭和挺进军总司令陶广，参加会议的，除了陶广所属的军师长和重要幕僚外，还有浙西、皖南、苏南三个行署主任。那时正是新四军在三山一湖（天目山、黄山、茅山和太湖）地带取得一个重大的胜利，歼灭了陶广的一九二师，击溃了二十五集团军李觉所辖的许多部队，解放了宣城、孝丰、宁国、于潜等地以及杭嘉湖游击地区（国民党抗日游击区）的大部，三战区感到威胁很大，陶总部且有西迁之议。我以总部参议，客居郑村，虽未参与会议，但风闻会议是专为讨论防共剿共的问题而召开的。

会议后的第三天，陶广忽然邀我到郑村一家比较精致的洋楼上密谈。落坐后，他突然问我：“汪精卫的伪组织里你的熟人多么？”我惊疑地回答说：“那里的熟人并不多，但也认识几个人。”他又追问说：“哪个和你的交情好些？”我赶快声明说：“和这些人还谈得上什么交情，不过认识而已，若说认识得较早，只有伪参军长唐蟒。”他高兴地说：“那就很好，这人我也晓得，他虽然落了水，但表现还好，我们的地下人员有许多人得到他的照顾。他又是一个日本通，你能去和他见面么？”我说：“如今人鬼殊途，怎好再和他见面？”

他说：“不是的，现在有个最重要的爱国事业要你去做。昨晚顾长官（顾祝同）由铅山打电话来问我不有人能到敌区去做策反工作，因为中央有密令来，要我们去抢杭州湾，好迎接盟军登陆。如今杭嘉湖地区已被新四军占领，只有策动敌伪和我们夹击，把新四军赶到江北去，我们才好抢杭州湾。”陶并悄声说明：顾祝同告诉他，这是中央的国策，要我严守秘密。我把任务承担下来了。过了几天，陶广持三战区策反专员委令给我。我不受，但要求给予凭信。陶知我不放心，亲书“吾兄倘能策动敌伪与我联合剿共，则功莫大焉”的便条（签名盖章）给我，并写了一封信给唐麟，说我因事到沪，请照料一切云云。

约在二月中旬，我到达富阳上游的场口。我方情报站替我制造了一张假良民证（把一张崔水荣的良民证换上我的照片，再用仿制的水印按一下，便难分真假了），为我化名崔水荣。沿途辗转滞留，四月初才到达上海会见唐麟。唐对我之去沪感到非常兴奋，登时把他的心腹朋友罗宝找来相商（罗为黄埔六期生，门道很宽，敌伪首脑都晓得他，他和内地特务也有联系）。罗宝主张我暂时不去接头，先由他和唐麟分途向陈公博、周佛海疏通，唐去会陈公博，罗去见周佛海。对陈则说：蒋方可以公开抗日，而不可以公开反共，伪方不可以说抗日，但可以积极反共，双方配合进行，分工合作，然后把我的任务告诉他。对周则说：我到上海来是找周佛海搞湖南人大团结的，说三战区所属部队尽是杂牌军，而且湖南人最多，光总司令就有刘建绪、陶广、李觉、李默庵等四个，他们正在搞湘人大团结，并派我来找他加入，协同驱走江南的新四军，然后在东南建立一个第三政府。我怕露出破绽，主张直截了当说明来意。罗宝说：“这方面的实力都操在周佛海手里，陈公博只是一个空头的主席而已。周曾经对我说，‘东南方面第三战区，

湘籍总司令占好几个，如果和我们联合起来，倒可在东南建立一个新政府”。我知道他的野心，所以要加一番话去打动他，引起他的兴趣，你的任务也容易完成些。至于这些内容，他不特不会向陈公博对证，而且还会要你我都守秘密。”唐蟒也同意他的说法，于是他们分途而去。晚上，周佛海要罗宝用他的汽车接我到沪西他的秘密住所去谈话。我先把我的任务告诉他，然后按照罗宝的意思加上一段鬼话，引得他抚掌称快，紧紧拉着我的手说：“你来得真好，暂且住在罗教植（罗宝的别号）家里，不让日方知道，我将和你从长商量，等布置好后，你再回去复命。至于应付日方，由我负责，公博那里你也去会会他，只不要多谈，但将你的任务告诉他就是了。”次日上午七时，陈公博要宣传部长赵尊岳来找我，赵对我表示要协助我完成联合剿共的任务，然后陪我去见陈。陈对联合剿共的问题也颇感兴趣，不过认为自己只是当个空头主席，不大管事，要我和周佛海商量，他是会同意的。

周佛海把我安顿在罗宝家里之后，经常派人来招待，有时接我到 he 家里去商谈办法，又叫丁默村经常和我接触。丁见罗家来往人多，就每天接我到巨赖达路他的家中去谈话。赵尊岳却天天到唐蟒家里邀我和罗宝同去商量。我们商议后提出的办法是：先由唐蟒到浙江去统率江南的伪军，协同三战区的陶广、李觉等部驱走江南的新四军，等盟军接近我国的东海岸时，即攻取杭州迎接盟军登陆。陈、周对我们提出的这个办法并未反对。只以后来日寇对第三战区发动攻势，并在杭嘉湖地区进行扫荡，新四军已自动退到江北去了。形势一变，伪方乃改派丁默村去当浙江的伪省长，把贺劲生、袁庆光、张华甫等部伪军编为伪保安第一、二、三团，驻在杭州凌家桥及富阳、崇桐一带，掩护伪方和三战区的交通走廊。同时，在五月下旬，周佛海又商同陈公博共派伪督练

处长张海帆（湖南石门人，黄埔军校第四期生）同我转去向第三战区输诚。我们到杭州为日寇拘捕，得伪警察厅长陆某等掩护得脱，于六月初返抵徽州。顾祝同闻报，即令我陪张海帆到铅山长官部去。顾对张海帆之来喜形于色。张把敌伪情形详细告诉了他，彼此谈得很投机。通过一次秘密会议后（我未参加），顾祝同告诉我说：“我和张海帆已经把双方联合的办法商议好了，伪方的任务是担任长江北岸的防务，主要是防阻江北的新四军渡江南犯，其次是掩护杭州富阳至场口一线的交通走廊。双方互相交换物资，并互派参谋组织一个参谋团驻在上海，由我方派专人去主持军事。我已派本部高级参谋柏良（四川人，曾任一四五师副师长）担任这个任务。仍请你同张海帆、柏良转回上海去，你专和伪方商谈政治问题。”我推脱不得，乃让张、柏一道先走，我回徽州休息了十来天，于七月初动身赴沪。到凌家桥，恰好伪保安部队贺劲生团驻在附近。贺要我不要进杭州，更不可到上海去，因为上海连日被捉去地下人员甚多，我是被日寇注目的人，万万去不得。并说柏良还在杭州，由丁默村把他匿藏在一个女职员家里，只张海帆独自回上海去了，等等。我没有听他的劝告，仍冒险于七月中旬再到上海，由罗宝介绍住在霞飞路徐重道药局对门周西寰医师家里（周系湖南同乡），随与陈公博、周佛海等取得联系。日本宣布投降后，我才回到徽州。

一九四六年，第三战区长官部和挺进军总部先后结束，我和陶广寄寓杭州。当时，国共合作之声高唱入云，而陈逆公博在口供上暴露说，陶广曾经派杨某和他接头，商谈联合剿共的问题。我为之耽心，对陶广说：“陈逆如此供出，一旦共产党得政，我们将会死无葬身之地，应当来一个声明才好。”随将我所预拟的稿子给他看，大致说到沪和伪方接洽，是奉三战区令策动伪方作内

应，掩护我军抢杭州湾，迎接盟军登陆；陈逆的口供是故意离间国共合作的，云云。陶认为要得。我乃将它登载于杭州的《中央日报》，企图自白于人民，其实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

同年五月，我到南京入中央训练团受训。某天，章士钊突然要一个姓周的（周佛海旧部）来找我。我随周某去后，才知道章受聘为周佛海的律师，就住在周佛海家里。章请我为周作证，要我向主审法官只谈周与第三战区联合抢杭州湾，准备迎接盟军登陆，不谈联合剿共的事，并说法官问什么就答什么，不必涉及其他。顾祝同时任陆军总司令，我向他请示，他也嘱我不要谈反共的事。大约在端节前后，江苏高等法院在南京朝天宫公审周佛海，我出庭作证，法官的提问，恰多是我们预先准备要谈的一些内容，根本没有涉及反共的事。我参加的这一幕丑剧也就此结束了。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记上海黄金风潮案

何 汉 文

国民党政府从抗战末期到崩溃前夕，由于买办资本集团进行疯狂掠夺，前后发生过两次黄金风潮案。第一次是1945年三月间，发生在重庆，原因是由于蒋政府为了骗取人民的金钱，借口吸收游资，自1944年九月起，由中央银行开办“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和“法币预购黄金期票”。到1945年三月二十九日，黄金牌价由每两20,000元提高到35,000元时，加价之先，已经走漏风声，以致银行人员利用职权，乘机购储黄金。风声传出来后，蒋政府中的政学系、CC派，为了夺取财政大权，乘机掀起风潮，闹得重庆满城风雨，经监察院检举后，由法院判刑的有财政部总务司司长王绍斋、中央信托局储蓄处处长王华等，孔祥熙也因风潮影响，被迫下台。当时虽然煞有介事，打了几个苍蝇，但对主要负责人并没有彻底追查，只是含糊了案，并且给予新上台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以进一步加强向人民掠夺的机会。宋借口打击投机者，由政府宣布：凡购储黄金的存户和预购黄金期票的头主，都要“捐献”四成。据后来财政部的报告，总计这次“捐献”的黄金有820,468两。而实际上真正的大户投机者，大都和中央银行有关系，消息灵通，办法很多，黄金早已到手，没有“捐献”分文；被“捐献”的都是些普通存户。经过这次横暴的掠夺后，黄金储蓄和购买黄金期票的骗局被戳穿了，再没有人上当了，中央银行只好改用抛

售黄金的办法，企图稳定金价物价。结果又引起了第二次黄金风潮案。这次黄金风潮是1947年二月发生于上海，接着波及全国，被牵及的贪污有关人员，上自宋子文、贝祖诒（淞荪），下至中央银行职员，金号老板。案子发生后，在蒋政府内部引起了一场政潮，行政院长宋子文和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都因此下台；蒋政权下的经济，因此加速崩溃。我是当时监察院派出彻查这个案件的四监委之一，并且是后来调查报告书的起草人，和对宋子文、贝祖诒提出弹劾案的领衔人，对于这次黄金风潮的内幕，略知梗概。现在就我所能回忆的略述如下：

黄金风潮是怎样发生的？

抗日战争结束后，许多国民党的官僚、军人都在劫收中发了横财。他们除了大肆挥霍外，还握有大量的货币成为游资，寻求出路。在当时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况下，他们感到：储存银行怕变水，投入工商业又担心时局的不安定，因此，大量游资都集中于市场上的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搞得抢购风潮日甚一日，物价更加狂涨，法币益趋恶性膨胀。这种现象在上海表现得格外突出。这时宋子文上台不久，中央银行还控制有九百多万两的库存黄金、十亿美元的外汇和大量的美援物资，同时二十亿的美援贷款，也正在进行谈判。蒋、宋之流还妄想凭恃这笔有限的现金，来和那些泛滥成灾的游资作斗争，从而达到稳定物价和币值的目的。在美国顾问杨格的献策和怂恿之下，1946年三月行政院决定，实行开放外汇市场，规定外汇牌价的办法，同时由中央银行公布黄金买卖办法，以库存黄金，向上海市面抛售。这个办法施行以后，从1946年三月到1947年二月十二个月中，上海的黄金市价，在最初几个月，波动还较小，到1946年十月以后，便出现了大幅度的

波动。当时金价波动的情形，如下表所列〔按黄金每条（十两）折合纸币计算〕：

1946年各月份	最高价格	最低价格
一至三月	1,940千元	795千元
四至六月	2,030千元	1,420千元
七至九月	2,300千元	1,863千元
十 月	2,240千元	2,150千元
十 一 月	2,727千元	2,340千元
十 二 月	3,715千元	2,758千元

1947年开年以后，市面金价每天都是波动几次，到二月初，中行停售黄金的前几天，一天涨价竟达九次之多。现在仅就一月四日到二月十三日上海市的金价波动情形表述如下（按每条黄金价格计算）：

	最高价格	最低价格
一 月 四 日	4,580千元	3,954千元
一月卅一日	4,630千元	4,190千元
二 月 四 日	4,700千元	4,400千元
二 月 七 日	5,330千元	4,840千元
二 月 十 日	7,200千元	5,430千元
二月十一日	7,340千元	5,810千元
二月十三日	7,800千元	6,700千元

中央银行虽然逐日抛售金条，但是黄金涨风不但不能平息，上涨的幅度反而越来越大，涨风越来越凶，最后上海库存黄金快要完结的时候，更包用中航运输飞机，将重庆的库存金条也运来济急，但是杯水车薪已无济于事。以致中行抛出黄金越来越少。在一月三十日这一天抛售的黄金还有一万九千条，而二月份的上

半个月，一共只售出了一万零九百多条，其捉襟见肘的情况已经很显明了。当上海市面发现了重庆厂条和售出金条日见减少的时候，一般嗅觉很灵的黄金投机买卖者已察觉到库存频近告罄的迹象，进一步引起了大量的购进。中行只好于二月八日停止暗售，市面上更掀起了抢购黄金的高潮，迫使中行于二月十五日正式公告停止抛售黄金。至是，上海黄金市场顿时变成了只有黑市，没有牌价。于是有钱的人们集中抢购黄金美钞和重要的物资，进一步助长了一切物价狂涨、物资奇缺、市场和金融十分紊乱的局面。上海在当时是全国经济金融的重心，它发生了这样大的骚动以后，不能不影响到全国各城市，以致蒋管区的财政金融由紊乱发展到全部崩溃。原来中行的黄金抛售，只限于上海一处，其他各地都只逐日公布牌价，没有黄金出售。因此，形成各地的黄金市价都高出上海的牌价。例如在二月十一日这一天，上海的最高金价是734万元一两，而南京为930万元，武汉为950万元，重庆为950万元，广州为1100万元，北平为860万元，天津为830万元，青岛为750万元。正因为各地的金价都高出上海，所以各地纷纷向上海抢购黄金，上海的黄金大量向其他各地流散。当时重庆、武汉、广州等地的中航飞机，常常被人包占，以至客机的包价也发生高出规定运费若干倍的黑市。其次，当时沿津浦、陇海一带，正是大军云集，进行内战，许多部队的高级军官都把领到的军饷钞票，措不发下，大批装运到上海来抢购黄金美钞，甚至中行由南京开往徐州等地的运送钞票的专车，开到半途，便又掉转车头，运回上海。当时各部队为了争取交通工具运送钞票，经常发生争执，以至武装冲突。再次，上海当地金融、工商部门的CC分子、江浙财阀，为了大量抢购黄金美钞，除了拿出他们自己的钞票外，还不能满足欲壑，更设法向四行贷款。仅在十二月初的头几天中，

四联总处便放出了560亿元的“生产贷款”。这些贷款到手以后，他们都是马上用来抢购黄金美钞。甚至中行在上午发出的“生产贷款”支票，在当日下午抛售黄金的收款中，支票就回了笼。由于这些特殊的原因，更加剧了上海黄金美钞市场的紊乱。在二月初的十一二天中，黄金涨了一倍，美钞涨了一倍半，跟着一般物价也都涨了两三倍。全国各城市都是一样的涨风凶狂，弄得人心惶惶。一般人民和低级职工，睡一觉醒来，十万元的生活用款已经有二三成化了水，一个星期下来，更是失去了大半。许多学校学生在饭馆吃零伙的，前几天一千元一顿，逐日涨为二千元、四千元一顿，许多穷苦学生都因此吃不起饭，饿着肚子。总之，当时凡是靠工薪吃饭的人们，在此风潮中，为了保家保命，都只好设法购买一些生活必需的物资，而其工薪又不能及时发出，等到发下，实质上已经大打折扣，所以大家都弄到无法生活下去。中小工商企业者，没有豪门背景，分不到“生产贷款”，为了保本保值，就只好丢开生产，设法把流动资金移来购进一些与生产无关的物资，好多企业都在风潮中破了产。仅有官僚资本家互相勾结，上下其手，乘机抢购了大量的黄金美钞以及花纱布匹等重要物资，在这个大风暴中发了一笔大横财。

监察院为何打起老虎来了？

面对这个严重的情势，当时国民党政府掌握财政金融大权的宋子文一系，已经吃饱了，把事情弄糟了；为了苟延残喘，在停售黄金以后，实行又一次的黄金掠夺政策。二月十六日行政院提出了一个“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由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施行。根据这个方案，宣布禁止黄金买卖，取缔黄金买卖投机，规定“取缔黄金投机买卖办法”十条，禁止商民把金条金饰在市场买卖，

禁止用黄金代替通货，禁止人民携带黄金，把黄金冻结在中行停售黄金以前的价格，凡违反规定的，将其所有黄金充公或由中央银行照牌价兑换法币；同时宣布冻结一切职工的生活指数。这个办法公布实行后，在上海组织经济督察团，由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担任团长，发动许多宪警特务，以检查为名，对于商民持有黄金美钞以及重要物资的人实行搜刮；并且鼓励告密，来扩大和加深其搜刮范围。结果是：许多中小户当时在风潮中为了保全血本，抢购了一点黄金美钞或物资，至是又都遭到了没收充公，还要坐牢；一般职工因为生活指数冻结，而物价依然不断上涨，生活更加痛苦。自从这个“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实施以后，上海的市场虽然在反动高压之下，表象上暂时稳定了一些，而实质上是经济崩溃进一步加深了，特别是广大人民和职工生活都已濒于绝境，反动政府反而从新的掠夺措施中再一次从商民手中抢得仅存的一些金钞和物资。我们在上海查案时，据宣铁吾很得意地告诉我们，在经监团成立后的十天中，经检查没收所获的黄金有二十多万两，美钞有一百二十多万元，棉纱布匹价值三百多亿元。他还请托我们在查案中随时将所发现违反“紧急措施”规定的情事都转告经监团处理。我们也照他的要求在指挥上海审计处抽查上海某些有投机嫌疑的银行工厂时，举发了一些案件，例如当时的正泰橡胶厂、大中华造纸厂、生化制茶厂等都因为以“生产贷款”买金钞、囤物资被举发而搞得吃官司。除了宋子文一系利用职权采取继续掠夺的措施而外，还有参政会、立法院、监察院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部分人，一方面同意采取上述掠夺政策来维持反动统治；另一方面又倡言要彻查金潮发生的责任，惩办失职人员。不过持这种态度的人，又各有不同的打算；在各派系中，如政学系因为自从宋子文上台以后，把张嘉璈从中央银行排挤出去了（原

先张是中行的副总裁，宋上台后调张到东北搞接收），张群之流也不得意，现在主张查办，是为了想乘机倒宋，攫取财政大权和行政院长；CC派主张查办，是因为他们当时在财政金融上还只占有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中央信托局还在争夺中，中央银行还无法插手，所以想乘机把宋子文在这些方面的垄断势力推翻，进一步扩大他们的垄断势力；孔祥熙和他的喽啰也在主张查办，是因为宋子文从1945年起把孔的财政大权夺去了，此时他想倒掉宋，好卷土重来；至于监察院，于右任和许多监察委员过去一贯是以超然自居，自命不介入一切派别斗争，而现在也主张查办，而且是挺身而出实行查办的唯一机关，则是因为看到当时宋子文已经成了众矢之的，闲散多年、无人重视的“养老院”——监察院想乘机打打宋断气的老虎，可以博得许多人的喝采，来提高自己的威望。由于这种种不同的动机，汇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打倒宋子文的怒潮，酿成了当时国民党内部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

监察院于二月十六日举行全体监委紧急会议，会中一致决定派员彻查这次金潮酿成的情形和负责者，会上并且有人慷慨激昂地说：“这次的查案，监察院必须下决心打老虎，不要只拍苍蝇，必须派几个精明干练的委员，才能完成任务，莫使各方失望。”结果，由院长于右任当场指派何汉文、谷凤翔、万灿、张庆楨四监委为上海黄金风潮案彻查委员，并责成上海审计处协助工作。为了使查案进行不至因为外间复杂情形的牵制发生困难，四监委决定于即晚赴沪，开始调查。

四监委抵沪以后，首先是考虑查案如何进行的问题，因为不但本案案情复杂，并且当时来沪查案的除监察院而外，还有两起：一是上海经监团已经在“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公布的前两天成立，开始活动，我们去时，他们已经在大千其对商民的检查没收工作，

一是国防部也派了第二厅厅长郑介民、高参锺英、易伟等来沪调查军人在风潮中乘机投机囤积的情形。我们为了在工作上不致发生冲突，在警备司令部开了一次三方面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决定：凡是关于军人在风潮中投机贪污的事情都归国防部方面负责；关于商民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的事都归经监团负责；关于公务人员贪污投机的事都归监察院方面负责；三方面随时交换调查所得的重要情报。这个决定，表面上是职责上的分工，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查案的主要目标是对宋子文，恐怕范围牵涉太广，会发生阻力，因为军人都是受蒋介石的支配，我们搞得不好，会碰钉子；商民在上海是五花八门，下自流氓，上至豪门，都有关系，搞得不好，也会碰壁，所以情愿把彻查范围大大地缩小。其实军人何尝不是政府成员呢？商民的投机倒把何尝不是和官僚勾结一气甚至官商不分呢？因为这样分工的结果，所以当时我们所查的仅限于和中央银行有直接关系的少数人员和一部分的黑暗事实而已。^①

①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载资耀华先生“国民党政府法币的崩溃”一文中说：“CC派看到宋子文假借外力已不足恃，经济情形不可终日，抢购黄金已不可能，乃掀起第二次黄金大疑案。由参政会、监察院、立法院等机关联合对宋子文提出弹劾，并派大员到沪，会同淞沪警备司令部进行检查。声称要拘捕中央银行总裁，并立即拘捕了该行业务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仁安及某金号经理。于是宋子文不得不辞职出走广东，中央银行要职又为CC派所占据。”资先生这段记述和当时事实有出入。第一，当时参政会、立法院在其委员会议上虽然都有质询案提出，但是都没有派员到上海去查案，更没有和监察院联合进行检查。至于说三机关联合对宋子文提出弹劾，更是于法不许，因为弹劾权在当时是属于监察院的职权，立法院和参政会都没有弹劾权。当时对宋子文、贝祖诒的弹劾案是由四监委提出，由监委金毓黻、于树德等审查成立，移付惩戒。第二，说这次黄金风潮案是CC派掀起的，也与事实不符。CC派乘机参加倒宋是事实，但是把这一案都归之于CC派所发动，未免抬高了CC派，其情形已如上文所述。第三，说金潮案的结果是宋子文倒台，“中央银行要职又为CC派所占据”，也非事实。宋辞职以后，行政院是张群接任，贝祖诒免职后是张嘉璈接充，副总裁由刘攻芸接充，上台的不是CC派而是政学系。

中央银行抛售黄金的内幕

自从1946年三月中央银行实行向上海市面抛售黄金，当时抛售的办法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明配，每天上午十时由中行业务局根据当日上海黄金市场的金价规定牌价，由上海市金号、银楼两公会会员提出当日申请购进的黄金数量，交由公会负责人报请中行业务局配给，上午由中行将黄金配下，下午金市收盘时，配售户将配给黄金的价款缴库；第二种是暗售，由中行业务局于当日明配之后，根据市场情形，随时以波动的最高黑市价格（因为当时明配的黄金数量总是供不应求，所以市面交易的金价往往高出牌价），由中行暗地将金条交由委托的几家金号、银楼向市面抛售，中行不直接露面，其目的原来是想压平过于波动的黑市，但实际上只是追逐黑市而已。

中行内部关于抛售黄金，一直都是由总裁贝祖诒、业务局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仁安负责处理，每天的抛售数量由三人决定，抛售价格由林、杨二人和公会负责人商定；每天黄金买卖的情形，都用英文向宋子文作出报告，连财政部长（当时财政部长是俞鸿钧）都不能过问。一直到1947年1月，因金价波动厉害，财政部指令中行按时报告，才每周呈送一份买卖统计表到财政部。俞鸿钧是和政学系勾结的圆滑官僚，非宋一系，所以中行虽是财政部的直属机关，但事实上是完全不许俞鸿钧过问。因此黄金买卖的勾当，完全是以宋、贝在上指挥，林、杨二人为执行者。当我们查案时，询问中央银行究竟原来库存有多少黄金，一年间抛售了多少黄金，现在还存有多少黄金，贝祖诒对我们的答复是：“中行原有库存总数，从1946年3月至11月的抛售总数和现存底数，以事关机密，奉主席（蒋介石）谕，对任何人不能公开。”其余据他

的报告，1946年12月份计买入黄金2,056条，售出78,306条；1947年1月份买入300条，售出68,454条；2月份至15日停售止，买入135条，售出10,986条。虽借口机密不肯将库存原有总数和现存底数说出来，但是我们利用孔、宋之间当时的利害矛盾，访问了孔祥熙，据孔说，在他辞财政部长职时，交给宋子文的库存共计有900多万两黄金。根据上述中行两个半月的黄金买卖数字报告，大致每月售出黄金约在700,000万两左右，12个月中共计约售出8,500,000万两左右。当时所谓买进的黄金，仅有极少数的矿金。可见孔祥熙向我们说的数字是大致可靠的；中行在宣告停售黄金时，已经是库存告罄，无金可售无疑了。一年之间，为了蒋介石的内战军费和豪门官僚的投机侵夺，竟将国家这样一笔巨额的黄金花尽，无怪当时有人骂宋子文是蒋介石经济上的“败家子”。

中行抛售黄金的市场代理人是上海金业公会和上海银楼业公会。当时中行为了便于控制（其实是为了便于勾结舞弊），在金业公会的六十五家会员中指定同丰余、太康润、大丰恒三家金号，和银楼业会员中的方九霞昌记、杨庆和发记两家银楼，负责综核会员每日申请购金数目，经领和分发明配和暗售的黄金。这五家金号银楼是当时中行在上海抛售黄金的信用代表者。当时上海金交易所的成员分为金号和银楼两业：银楼业多半是历史悠久，注重信用，营业稳健，黄金的买卖数量也比较少。金号以投机买卖为主，大都和官僚资本、豪门资本有密切的关系；许多金号吞售量极大，在黄金市场上具有很大的操纵力量；它们多半是乘金价波动才设立的，其中有的甚至连正式的店面都没有；当时的65家金号中，有44家连营业执照也没有领到，登记的资本都很少，如同丰余资本为1500万元，太康润为2400万元，大丰恒为1000万元，方九霞为910万元，杨庆和为960万元，以当时法币价值论，都等

于零；而据当时中行的报告，单是在1947年1月至2月15日，五家经手的配售黄金额共计有79,832条，计同丰余占43,597条，太康润占16,247条，大丰恒占7,359条，方九霞占4,502条，杨庆和占7,835条。以如此微小的资本，承办这样大的黄金买卖业务，已经充分证明了中行经理人员和他们的互相勾结，营私舞弊，疯狂到令人难于想象的地步。

以詹莲生为首的金牛党的神通

我们检查中行抛售黄金的程序和手续，发现：第一，行内经办抛售并没有规定什么法定的手续，一切都只要由宋子文、贝祖诒“O.K.”了事，因此林凤苞、杨仁安在承办售金业务时，得以为所欲为。第二，虽然规定两业公会会员要购买黄金，须填具申请书，由五家代表转呈批准，然后配发，但实际是当时中行只指定了上海金业公会主席同丰余经理詹莲生一人包办，其余四家都是由詹的关系介绍来的，每天配给金条多少都是由他决定，由他经领分发。第三，每天中行黄金牌价的公布，规定是由中行业务局和两会五代表商议决定，事实上都是由林凤苞、杨仁安二人和詹莲生用对讲电话（由中行和金号间直接通线，以防外间窃听消息）作出决定，暗售的黄金也都是由詹莲生一人承办分配。所以当时中行抛售黄金的决价、明配、暗售，詹莲生都是操纵者，他成了当时上海黄金商人和中行之间勾结的总代表。更重要的，詹莲生还掌握了当时中行全部金条的改铸。因为中行库存的黄金都是400两的金块，市面出售时是十两的金条，所以在抛售前须加以改铸。这项改铸的业务也是全部交詹莲生经办，由他分发与大丰恒、宏丰永、生元永、元成永、杨庆和、裕发、永祥等金号改铸。中行对改铸每条给以三分的火耗。我在二月十九日讯问詹莲生时，据

他说：“改铸金条，每条有三分的火耗，每天归同丰余的火耗约有240两，其余经手分铸的几家不过在成色上略微有些好处。”可知他是独吞了中行给与的全部火耗，估计每月他可以得到7,200两黄金，一年中共计有86,000两黄金落在他的手里。又由于他是明配和暗售黄金的包办者，所以中行抛售的全部黄金，同丰余占了55%以上，即中行一年中售出的850万两黄金中，由同丰余经售的有450万两左右。其经售所获的暴利，当时詹莲生虽含糊不肯说出具体的数字，其数额之巨，何止倍于火耗。我们估计詹莲生在中行抛售黄金一年间，利用两业公会五家代表首领的地位，其经售“利润”，即以三分计算，当在十三万五千两以上，加上火耗的收入，成色的掠取，落到他手里的黄金总有二十多万两。实际上这个估计还太低了，因为他还利用每日优先知道中行的黄金牌价，熟悉中行库存情况，从而操纵市场金价，以及大量吞进中行暗售的黄金，在这方面所获得的暴利，更难于估计。据当时有一个在金交易所投机失败因而破产的黄金商人向我们控诉说，詹莲生在一年中所赚得的黄金有十万条以上。

詹莲生为什么有这样广大的神通呢？这是因为他凭借了两个集团作他的活动的本钱：第一个是在上海市场上以上述五家金号银楼作基础的金业公会，大部分的会员都受他的指挥；他的金号同丰余是在金价波动期间才成立的，在上海商业局一直没有批准备案，其余在他集团内的金号也大都是没有备案；他们操纵金价，打击集团以外的黄金买卖者，因此，在当时上海的黄金交易市场上谁都要看他的颜色。这个集团当时有“金牛党”之称。第二个集团是和中行的贝祖诒、林凤苞、杨仁安紧密勾结在一起。他们的勾结有其深切的历史关系：贝祖诒是苏州人，是当地一个地主兼买办阶级的世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的颜料大王贝

润荪就是他的哥哥，他因为和宋子文是留美的同学，交情很好，在宋子文当中国银行董事长时，贝就担任过中国银行的纽约、香港等地行长和沪行经理，在抗战时是对黑市外汇处理的负责人，他很得美国人的赏识，据说，美国人认为中国只有半个人懂国际汇兑的，就是指他。所以他又被人称为中国国际汇兑问题的权威。因此，在宋子文和美帝国主义勾结，谈判二十亿美援贷款计划时，他被选为谈判的代表，成了宋系下的第一个红人。詹莲生也是苏州人，又是贝家的亲戚，原来是贝家作颜料生意中的经纪人。贝祖诒当了中国银行沪行经理时，他便在上海金交易所暗地里与贝勾结，利用中国银行的资本，作投机生意，赚了大钱，因而在金业方面形成了他的势力。贝当了中行总裁以后，除了在外汇上与宋子文狼狈为奸，运用他的国际汇兑“知识”，大出其贪污花样，抢得了巨额外汇外，还想在黄金买卖上再大捞一笔。他不好自己出面，所以运用詹莲生作为他的代理人。至于林凤苞、杨仁安一直是贝祖诒在中国银行时的亲信和得力爪牙，所以贝到中行时，二人也当了业务局长和副局长，成为他在中行干贪污勾当的重要走卒。因为贝、林、杨、詹间的这种密切关系，所以中行抛售黄金当中他们便结成一气，狼狈为奸。同丰余在实质上便是他们四个人结合而成的一个贪污机构。我们在检查同丰余的账目和内部情形时，董事会的名单有两个假名查不出下落，据说便是贝、林、杨等的化名。同丰余这样大的买卖，连一本出进的日记账目詹莲生都说没有；直到送法院，才搞出了一本假账目。单从这两点看，贝、詹之间和他们所干的黑暗勾当是不能见天日的。上面说过，同丰余是一家没有向政府立过案的黑店。我们向上海商业局质问：“何以同丰余没有经批准立案，而他经理这样重大的业务，你们不加以取缔呢？”该局负责人向我们苦笑着说：“贝总裁招呼我

们不要管，我们只好不管。”我们讯问林凤苞时问他：“黄金抛售业务，为什么委托一个没有批准立案的同丰余老板詹莲生呢？”他的答复是：“因为上海金业公会会员复杂，不可靠的多。詹是公会主席，熟悉情况，有信用，有号召力，贝总裁也知道他的负责可靠，所以选择他负责。”盘问贝祖诒也是同样的答复。显然可以看出，在当时黄金买卖中他们四人是完全勾通一气的，詹莲生所获得的巨额黄金，并不是他一人独吞，而是四人朋比分赃。所以詹莲生在我讯问他：“你赚得的大量黄金哪里去了？”他答复说：“赚项也大，应酬也大，并没有救得多少金子。”当时我在东方饭店以迂回不着边际的谈话方式，讯问了大半天，起初他有恃无恐，毫不在乎，大谈他和宋子文、贝祖诒的关系，上海黄金交易的情形，同丰余的组织营业情形，中行和他的往来情形等等。及至把笔录给他看，要他签了字，他才有些感到不利。当时其他三监委都因事回到南京去了，留在上海讯问詹莲生的只有我一个人。詹在经过讯问以后，因为觉得事情不妙，在离开我的房间时，很恭顺地向我说：“我这些都是同何委员私人谈话随便讲的，有些欠妥之处，还是要请您包涵包涵！”当天晚上，王新衡（上海的军统大特务，杜月笙的徒弟，立法委员）约我到 he 家里吃饭，饭后他问到我讯问詹莲生的情形，末了，他向我说：“我想以老同学的资格，对你谈一点知心话。詹莲生这班家伙的确可恶，要办一办；但是官场的事适可而止，不必太认真。反正今天讯问他的只有你一个人，你如果不把笔录拿出来，或者改一下，开脱开脱，叫他拿出两百根条子来，倒也是一件一方二便的好事。今晚本来杜老板（杜月笙）想来和你谈谈，觉得有些不便，我的意思可以说也是他的意思，不知道你以为何如？”他这一番话当时使我有些感到为难，正面拒绝吧，他已经搬出一个“杜老板”，上海是流氓世界，得罪了

他，可能出毛病；答应吧，一来我当时还怀着一股当“铁面御史”（这是当时报纸上送我的“荣衔”）实行“整饬吏治”的幻想，觉得维护我的“令誉”比金条更重要些；同时我还警惕到怕宣铁吾、郑介民乃至军统故意弄出这一套来陷害我。因为我们和宣铁吾、郑介民虽然在查案开始时已经达成前述的协议，但是由于我们在查案中有些地方表现得很起劲，报纸上替我们大吹大捧，使得他们有些吃醋，用这样一手来对付我们是很可能的。我在这种为难的情况下，只好用推诿的口吻敷衍他说：“今天的讯问，当笔录的是上海审计处派来的人，和我过去不熟。几家晚报又已经把我讯问詹莲生的事大登特登。这样一来，恐怕有些不便。请杜先生放心，我总不把案子搞得太严重就是。”第二天，其他三监委恰好又回到上海来了。于是我们把詹莲生利用金业公会代表的地位操纵上海金市，以同丰余金号非法商号组织攫取巨额暴利，以及同丰余买卖黄金账目与中行抛售受主账目不符，显有情弊等罪名，连同笔录提出检举，送上海地方法院起诉审判。同时把林凤苞、杨仁安的利用职权，勾结贪污部分，也送法院起诉。结果詹莲生判了十二年徒刑，林、杨二人判了七年徒刑。法院院长查良鉴是当时国民党司法界有名的“漂亮人物”，他一方面和我们几番商酌，顾到外间的注目，保持了司法的“尊严”，马上把詹、林、杨三个人判了刑；一方面在金条神通之下，不久三个人都以“保外就医”，逍遥法外了案。

究竟是谁的命令？

我们了解，这个案子不止是贝、林、杨、詹的朋比为奸，造成百万两黄金的贪污问题，而是已经牵涉到宋子文乃至蒋介石的问题。对蒋、宋说来，究竟只是由于“失察”呢，还是在他们有

意纵容包庇之下所造成的呢？这是案子的关键所在。

我们在查案中对于这一方面抓住了一点，即中央银行在1946年三月实行抛售黄金是经过行政院决定有案的；而此次中行于二月八日停止暗售黄金，十五日停止一切黄金的抛售，以至引起大风潮，事先并没有由财政部或行政院向最高国防委员会提出市场金价不断狂涨，中行库存黄金告罄等严重情形的报告，通过讨论作出决定。事先行政院既无决定，究竟是谁发出的停售命令呢？当时我们问贝祖诒，他的答复是：“停售黄金是奉宋院长的指示。决策是上面的事，中行是业务机构，不能参与，只是奉令执行。”我们要他拿出宋子文的原令来，他说：“是电话指示，没有文字手令。”恰好当时宋子文到了上海，我们又到宋家去追问，他的答复：“停售黄金是奉主席的口头指示，我不过是奉令行事。”在谈话中他还说：“在停售黄金的两三个月以前，我看到事态严重，向主席请示过，并且表示工作困难，我干不下去。当时主席表示，‘因为时局紧张，前方百万大军的饷给重要，职是不准辞，办法由你去想，黄金能用到那一天用完再说。’当时我以为美援贷款有实现的希望，把库存问题看成次要。贷款实现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着力在贷款的进行。不料贷款搁浅^①，在紧急情况之下，只有宣告停售黄金之一法了。至于事先没有提出讨论，一来事机迫促，二

① 在1946年初，宋子文勾结美籍顾问杨格，进行二十亿美援贷款。蒋介石为了想取得这笔巨款，所以任用他为行政院长，同时以贝祖诒充任贷款计划谈判代表。宋上台以后，以为这笔贷款成功无问题，所以又接受杨格的主张，开放外汇市场，实行黄金买卖。结果，造成大量外汇和黄金直接间接流入外商之手，把中行库存的九百多万两黄金和十多亿的美元外汇都搞光，而贷款始终没有实现。

来主席的意思，大家也不会另有什么好办法，徒然引起一些无谓的争论，暴露国家的机密，影响戡乱大计。主席为国家元首，所以由他决定行事。现在责任落在宋某身上，我反正是奉命行事，我的能力不行，已经向主席提出辞职，一切听上面决定处理。”

贝、宋既然都把停售黄金的命令责任往上推诿，我们只好以四监委的名义于二月十九日打了一个电报问蒋介石：“此次中央银行停售黄金，事出突兀，致引起风潮，摇动金融经济。据宋院长称，停售系奉钧座指示，确否祈赐电示。”这个电报发出后，一直等了一个星期，没有回信。于是我们于二十六日回到南京，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查询。当时文书局长许静芝向我们笑笑，说：“主席批是批了，不好复电，你们看看吧！”原来蒋介石在电报上的批示是：“并无其事。事到如今，有何办法！”我们看了以后，真是啼笑皆非。既然是“并无其事”，也不说“应予追究责任”，而仅说“事到如今，有何办法”，明明是要以不了了之。事情已经非常明显，蒋介石对于这一案件的酿成应负主要的责任，但他既不愿意自己承认负责，又要庇护宋子文，并且实际上很可能是事先得到了他的同意，不过这时要点流氓手段，这样一批了案。

由这些情形，可以看出这次黄金风潮案的演成，上自蒋介石、宋子文，下至贝祖诒、林凤苞、杨仁安、詹莲生，是一条黑线通到底的。

案子的结局

我们看到蒋介石这个无赖的批示后，对于这个轰动全国的黄金风潮案，感到如果只把詹莲生、林凤苞、杨仁安几个小苍蝇送法院判几年徒刑，悄悄收场，那么，在全国人民面前太不好交账，于监察院的面子也太过不去。会商以后，决定进一步向宋子文、

贝祖诒作正面进攻。首先由我领衔，提出对宋、贝的弹劾案；并且打破过去的关于弹劾案处理程序的限制^①，将全案的调查报告书，由监察院正式公布，同时发动立法院召开临时院会。立法院开会时，宋子文、贝祖诒出席报告后，一些立法委员根据监察院调查报告的材料，正面提出尖锐的攻击，弄得宋子文面红耳赤，无法答复，愤然退席。接着参政会也向宋、贝提出质询攻击。全国的报纸舆论都纷纷发出猛烈批评。在这样四面楚歌之下，宋子文才提出辞职，溜到广东。蒋介石为了敷衍环境，才准许宋子文辞职，并免去贝祖诒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

宋、贝虽迫于形势去职，但是并没有因为监察院的弹劾而受到任何法律处分；并且蒋介石为了安慰他这位内兄，接着就发表他作广东省政府主席。

另一方面在这次风潮结局中收到实惠的是政学系。宋子文垮台后，张群继任行政院长；贝祖诒免职后，张嘉璈继任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当副总裁。他们登台后马上又发行了一亿美元美金公债和三亿元美金库券，进行新的搜括，蒋家王朝财政金融的崩溃，更因此加速了。

在风潮结局中最失望的是CC派，他们在宋、贝倒台后，没有捞得什么好处，因此，大唱高调，主张进一步彻查宋系官僚的贪污。在三月二十三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纠集了CC中委黄宇人等一百人提案：“请政府迅速切实惩治金潮案负责人宋子文、贝祖诒及其部属，并彻查官办商行账目，没收贪官财产，以肃官箴，而平民愤。”在提案中还指出：“官办商号如一统公司、孚

^① 1932年，汪精卫为怀恨监察院不该把弹劾曾仲鸣贪污案移付惩戒的案情在报上披露，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案。凡监察院的弹劾案件，在未经惩戒委员会决定执行以前，一概不准公布。

中公司、中国建设银行、扬子建设公司等，皆有利用特权，套购巨额外汇，输入大量奢侈品情事。”他们这种做贼喊捉贼的姿态，无非是借此来掩饰他们自己的原形，并且向继宋系上台的政学系作出示威而已。

事实上宋子文当时贪污最重大的部分的确也是对中行十亿美元外汇和几十亿美援军用剩余物资的侵吞。所以在国民党中央把全会提案发交监察院执行后，监察院又第二次派遣何汉文、谷凤翔、田炯锦、王冠吾四监委彻查宋子文外汇贪污案。彻查结果，又把他在外汇上贪污的情形，作成调查报告公布，并且第二次对宋子文提出弹劾，作为弹劾黄金贪污案的补火。尽管大炮放得这样震天价响，全国舆论也加以支持，但是因为蒋介石的极力庇护，弹劾案终归石沉大海，宋子文依然安安稳稳作他的广东省政府主席，监察院也只好沉默不问了。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我所知道的汤恩伯

宋 涛

汤恩伯是蒋介石嫡系之一，他忠心耿耿地执行着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一贯政策，得到蒋介石的特殊信任。在抗日战争后期，他与陈诚、胡宗南分掌重兵，独当一面，捍卫蒋家朝廷，有陈、胡、汤三大巨头之称。

我和汤恩伯的关系并不深，对于他一生的所作所为，我知道得不多。抗日战争期间，我曾担任汤的三十一集团军总部副参谋长、参谋长，苏鲁豫皖边区总部参谋长兼党政分会秘书长，第一战区副长官部总参议，前后在他身边做幕僚工作达六年之久。以后虽未在一起工作，仍经常过从。现就我的记忆所及，将过去所直接间接了解到的有关汤恩伯的材料，写述如下。

一、汤恩伯的起家

汤恩伯，浙江金华人，一八九八年秋出生于一个恶霸地主家庭。兄弟四人，汤恩伯居长。他幼年不勤学，性情放荡，好打架闹事。读过中学后即辍学，以后曾一度到杭州进体育专科学校，毕业后，因不安心做体育教员，乃邀朋友两人到福建陈肇英部当兵，几个月后又回了家。在家闲荡无事，结识二三同类朋友。后来其中一人因犯案而被县政府拘押，审讯时，他去法庭旁听，掷砖大闹公堂。事后怕拘捕坐牢，逃出故乡，流浪杭州。在杭州打

流期间，遇有吕姓阔少爷欲赴日本留学，胆小求伴，汤乃伴其赴日。到东京后，吕某未进学校，却与汤共开一小饭菜馆。年余，吕某思家心切，束装归国，饭馆由汤独自经营，稍有积蓄。后来汤将饭馆结束，考入日本士官学校第十八期学习军事。

汤恩伯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到湖南，在陆军第一师贺耀组部任学兵连连长。一九二六年转至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十八师张轸部任团附。因为贺、张都是士官前期生，汤与他们相处得还好。一九二八年，汤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军事教官，继任第六期上校大队长。他颇能耐劳吃苦，对连排教练的野外演习动作、也表现得比较熟练，得到军校教育长张治中的器重。一九三〇年蒋介石成立教导师时，汤恩伯经张治中的推荐和陈仪（时任军政部次长）的吹嘘，由大队长升任教导第二师第一旅少将旅长。一九三一年升任陆军第二师师长，一九三二年调任陆军第八十九师师长。一九三四年升任第十三军军长。汤自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即由连长擢升至军长，可算官运亨通。主要原因他是浙江人，又与陈仪关系密切，而蒋介石一意独裁，用人惟亲，故虽非黄埔军校出身，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张、杨扣押。汤在平地泉防次闻讯，嚎啕大哭，如丧考妣。个人恩德之感，于此可见一斑。汤为人虚假凶狠，善于玩弄手段。据吴绍周回忆：汤恩伯任八十九师师长时，恐怕黄埔军校学生在部队中捣乱，不易指挥掌握，在一九三三年秋天，部队到达南昌以后，就去报告蒋介石，以八十九师副师长冷欣升充第四师师长；二六七旅旅长王仲廉升任副师长，代理八十九师师长，遗缺由五三三团团长龙慕韩升充；二六五旅旅长张雪中调升江西省保安二师师长（以后调回任八十九师副师长，这时师长是王仲廉），遗缺由五二九团团长陈

大庆升充。在八十九师的黄埔一期学生都升了官，自然对汤深为感激。从此，他自己既能直接掌握八十九师，又能直接指挥第四师，奠定了以后当十三军军长的基础。

汤恩伯从一九三一年起就参加了反共反人民的战争。他担任第二师师长时，在河南潢川、光山、新集一带进攻豫鄂皖边区，被徐向前将军击溃。一九三二年在八十九师师长任内，又在卫立煌指挥下，到鄂东黄安一带进行“扫荡”，曾派其工兵营长门长春在黄安三角山杀害农民自卫军五十多人，又在郭家河烧毁民房数百间，使人民在天寒地冻中无家可归。一九三三年调到鄂南阳新、大冶、通城、通山地区，在陈继承指挥下侵犯湘鄂赣边区。同年秋，蒋介石调汤恩伯部进入江西，归陈诚指挥，围攻中央苏区。据说八十九师在瑞金驻扎半年，修筑了几条公路，命名为“恩伯路”、“介人路”、“雪中路”，几十个村庄修了几十个纪念塔，几个烈士墓，宣扬他们自己的“反共业绩”。一九三四年春，“福建事变”发生，汤部又由江西调入福建，经建阳、建宁到福州、厦门，对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作战。一九三六年春，汤奉蒋介石命令，率十三军进入山西，支援阎锡山反共，在陕北绥德、瓦窑堡之线阻挠红军北上抗日。随后又开到绥远，归傅作义指挥，驻扎平地泉、凉城地区，美其名为参加绥东抗战，实际上仍是防止红军北上抗日，收复失地。总之，从一九三〇年蒋与冯阎的内战结束后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七年中，汤恩伯坚决执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不惜残民以逞，成为两手沾满人民鲜血、个人飞黄腾达的人物。

二、抗战初期的汤恩伯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开始时，汤部辖王万龄的第

四师和王仲廉的八十九师，在南口作战，士气尚旺，打了一次硬仗。当时范长江同志任大公报记者，曾到汤部访问，并写文为之鼓吹。汤的声名因之大著。同年冬季，汤部调河南担任漳河防务，并在豫北安阳、新乡各地整补。这时部队扩充为十三军（军长张轸，半年后由张雪中接充）、八十五军（军长王仲廉）两个军，汤升任第二十兵团司令。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在洛阳代理一六〇师师长，原归刘峙指挥。刘因保定之败撤去一切职务，从开封回汉口，路过许昌时，曾面恳汤恩伯保我实任师长（其时我师新拨归汤节制指挥）。但汤存心鲸吞，于刘峙去后的第二天，即率马厉武来洛阳警备司令部（祝绍周任司令）接替我的师长职务，而要我到他的兵团司令部去任职。我当时借口要办理移交手续，不能同他去许昌。汤离开洛阳后，我就回湖南暂住。是年六月，我应王东原之约赴武昌，又遇见了汤恩伯。他一见面就握住我的手问道：“你这几个月到哪里去了？”随即要我到他部九十八军任参谋长，并说将来要带兵是很容易的。原来，汤兵团在台儿庄会战中尚能奋勇抗敌。徐州会战失败后，日军乘胜西进，国民党在花园口决口，造成黄泛，河南平汉铁路以西地区得以暂时苟安。此时汤恩伯部在豫南鄂北扩编为三十一集团军，除原有的两个军外，又增加了一个九十八军。这个军是由几部分杂牌部队编成的，其中有张刚的八十二师，川军李宗鉴师，黔军罗启疆师以及鲍刚的独立旅（部队编成后由张刚任军长）。由于部队庞杂，加以将骄兵惰，生活腐化，战斗力更加削弱了。我在九十八军呆的时间并不久。一九三九年二月，汤调我任三十一集团军总部副参谋长。这时他兼任南岳游干班教育长，调我兼任游干班办公厅主任。三十一集团军总部及其嫡系两个军则由参谋长万建蕃率领，经鄂西移至鄂北、豫南一带。汤除兼任南岳游干班教育长外，仍临时指挥其他三个军

在醴陵、衡山一带整训。

一九三九年夏，三十一集团军总部在平江地区驻防时，杨森在嘉义袭击新四军后方留守处，造成“平江惨案”。汤恩伯曾亲至杨森司令部对杨表示赞扬。

南岳游干班本来是国共合作训练一部分抗日游击干部的。但是汤恩伯并没有真正遵守国共合作的原则。他兼任教育长，中共方面派叶剑英将军兼任副教育长，共产党员担任教官的有边章五、万里等四同志。汤恩伯指使总务处对中共人员的生活应照料好，但教课内容则限于游击战术，其他学科不得与闻。他派军统特务陈振东、王伯刚等住在山冲密林中，他们从大路去中共教官的住所比较远，由小路插过去则刚刚在其住所的背后，仅隔两个山林，便于随时监视他们的行动。我们原住在南岳圣经学院内山中的一栋一楼一底三开间的小洋房，汤恩伯住楼上一边，叶剑英将军住一边，我住楼下一边，机要室主任黄树滋和译电员住一边，环境幽静，宜于办公。我们吃饭在一起，我也曾到叶将军房中谈过话。两个多月以后，汤恩伯忽然叫我同他一起搬到岳云中学南边山腰一栋平房内居住，离原住处有两三里路。他这种疑神疑鬼的态度真使人捉摸不定。此后三四个月内，我再也没有到叶将军房中去了。汤恩伯在抗日获誉之后继续反共，充分暴露出他忠心耿耿地秉承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真实面貌。

三、屯兵河南，反共残民

一九三九年夏季的随枣战役，汤恩伯曾赴鄂北前线约两月，应付了日寇大规模的扫荡，部队尚算保存完整。本年，汤率总部留湘人员全部北上，总部驻河南镇平。南岳游干班交李默庵接办。冬末，汤部参加鄂北之战，在随县、高城战斗正紧张时，汤要抽

调总预备队（八十五军李楚瀛师）绕攻应山，实际上是他在动摇，想借此机会转移总部位置。经我与参谋长万建蕃力争要坚持，方击退日寇的扫荡。原来此时汤把敌人的进攻估计错了。当时日寇主力仅一个旅团，由高城北进，并非战略要道，而信阳、桐柏方面又毫无敌情。在这一情况下，若不沉着应战，坚持抗击，则必然造成全线溃退，弄得不可收拾。经过幕僚长们据理力争，最后，他自己带随从人员转移到稍后一个山寨，总部指挥所始终未动，多坚持了一昼夜。结果，日寇先行转移，我军不过多伤亡一点，但尚能全师而回。

一九四〇年夏秋之间，沙市、宜昌相继失守后，汤总部一度移驻湖北南漳，部队主要担任对宜沙方面的警戒。是年冬，总部回驻河南南阳。这时陈大庆由陕南汉中、城固等县整训出一个二十九军，开来豫西。至此，汤部共有三个嫡系军。其番号如下：

第十三军（军长张雪中）：辖八十九师（师长舒荣）、一百一十师（师长吴绍周）、新一师（师长黄咏璜）。

第八十五军（军长王仲廉）：辖第四师（师长石觉）、二十三师（师长李楚瀛）、预十一师（师长蒋当翊）。

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大庆）：辖九十一师（师长王育文）、一九三师（师长赖汝雄）、新十六师（师长吴求剑）。

一九四一年春，三十一集团军总部移驻河南叶县大岭头。此时汤恩伯的最高头衔是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兼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但三十一集团军仍是他的基本力量。三十一集团军总部驻叶县三年多未移动。在这几年中，对日寇也没有打什么仗，真是袖手旁观，坐等胜利。事情并不止于此，他抗日虽然消极，反共则更加积极了。一九四一年春节期间，他率王仲廉部东进，在漯河、界首等地设立警备司令部，并将二十九军陈大庆及九十二军李仙

洲两部推进到阜阳以东和以北地区。后来叶县、阜阳等地也相继设立警备司令部，在界首则成立党政总队，这些都是反共反人民的工具。当时，我还留在南阳主持后方总部，对于军队的移动以及变更部署都不知其详，以致苏联顾问别尔科夫问我要军事部署图，并问汤确在何处时，我竟瞠目无以置答。当时别尔科夫顾问曾表示不满。第二天，翻译告我，说顾问们将向重庆总顾问报告，我说此亦莫可如何，因为责任并不在我。以后在叶县时，对顾问们专修一所房子，设备较好，并找了西餐厨工，派副官专办招待事宜，在生活方面照料殷勤周到。但在军事方面，小规模连排演习，甚至炮兵掩体的构筑，手榴弹的投掷等等，都请教顾问；大的行动部署，则对顾问讳莫如深，实行保密。

我担任汤恩伯的幕僚长，在处理案件方面，内心很感困难，因为汤恩伯知道我参加过大革命。我认为既是国共再合作，联合抗日，而大敌当前，国难方殷，又何必阳一套阴一套呢。我有这种想法，但一点也不敢暴露出来。因为一家大小靠我吃饭，兵荒马乱之中，再也来不得一点风吹草动。一九四一年夏，汤部一个团去汝南一带活动，主要任务是督促地方挖断绝沟。这个团长将新蔡任芝铭先生（全国政协委员，现年九十余岁，前年尚担任河南民革主委）及中学校长王某和一教员捕送党政分会，说他们是“奸党”。汤问我如何处理，我说：任老先生已是七十高龄之人，行将就木，新蔡县地方派别又多，动辄给对方戴红帽子，此案宜慎重处理。汤当时没有表示态度。我密告一女译电员转告在重庆工作的新蔡女生（她们都是汤的二十兵团教导队学生）来函营救。秋初，汤交代我将任老先生开释，任老先生才脱离虎口。何柱国部高参丙淳曾被派到皖北新四军第七师彭雪枫师长处担任联络参谋，一年左右回到部队，带来一个勤务兵，系陕北米脂县人。同

事因此控丙有“奸党”嫌疑，何柱国将他捕送党政分会。此案迁延不决将近半年，最后经签呈丙有神经病，他人之控确系无中生有，因仇寻隙，方将丙释放。一九四三年春夏之间，一一〇师到南召清理伏牛山区，捕来青年五十多人，汤恩伯将有所处置。经我再三婉陈，对青年不能错杀多办，这批青年以后都交青年训导团教育半年释放。同年秋间，叶县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展绪于一夜之间用汽车将总部所办的《华中日报》总编辑杜宇（原来同左翼作家臧克家同来的）及几个编辑拘捕直送汤处。同时逮捕的还有参谋处中校参谋何元邦及副官处、军医处官佐共十人。次晨，汤恩伯唏嘘太息地对我说：“糟了！我的何元邦也是共产党。”我说：“这要看情报来源如何，有庙就有鬼。叶县城里既设有警备司令部，意在防共，那么当然就会有人借此来密控诬攀。何元邦从十七八岁起跟着你，五年多升到中校，始终没有离开过。说他也是共产党，你要过细考察。”经我这样一说，他为之一惊，要我对刘副司令说说。顷刻间刘也来了。汤的急躁情绪发作，要刘严讯原告石某。结果石某果然反供，说前次供出的是假的，并无其事。刘将复审经过具报。汤在盛怒之下，立即杀石某而释杜宇等十人。

上述几个案件，当时我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谁不是共产党，至今也还不知道其中究竟有多少共产党员。因为汤恩伯嗜杀成性，反共心切，就挖眼寻蛇，捕风捉影，弄来这些难以处理之案。总部军法处处长杨中格是一个老于世故、看风转舵的人，在案件处理过程中，他固然不敢违背汤恩伯的意旨，也要看看参谋长的颜色，因而案件虽迭次发生，尚未至多杀。至于汤恩伯决心要杀的人，往往直接批交警备司令部或特务团，不经过总部军法处审讯。如一九四一年夏黄泛区总指挥部在泛东捉来三人，他们自认是共产党员，汤就把他们交给漯河警备司令部处理。又如杨根深、郭

雪萍两人系中共叛徒，一九四〇年汤委他们做县长兼纵队司令；过了一两年又把他们杀掉了。他们虽有其他问题，主要还是由于汤恩伯怕他们靠不住。

汤恩伯还残杀部属，嫁祸别人。据吴绍周回忆：一九四一年夏天，第十三军副军长鲍刚，在部队扩编时没有当到军长，略有怨言。他向汤恩伯请假，想回安徽去。汤怀疑他是打算回安徽去参加汪精卫伪组织，便密令陈大庆乘鲍刚在湖北枣阳视察防务的途中，埋伏部队，把鲍狙击致死。事后把尸体抬回南阳治丧，扬言是被共产党打死的；并发给治丧费三万元，请鲍刚之妻护送回安徽凤台原籍安葬，以蒙蔽旁人的耳目。汤恩伯对高级军官如此，对下级官兵也是动辄曰杀。据万建蕃告我：某次有五个排长在一起打麻将，被汤恩伯看到了，他立即枪毙了四个，只剩一个“做梦”的未杀。在南漳时，他的一匹洋马被蚊子叮咬生了疮，他一怒而要枪毙马伕。

我同这样一个骄横残暴的人相处，实在难于应付。我借信仰佛教为外衣，替他的部属说情讲话，有些案件因而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其中政治性质的案件虽为数不多，确也伤了很多脑筋。一般人乐于来找我，说我是一个大慈大悲的老好人。但汤恩伯后来也怀疑我了。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他曾对我说过：“你光做好人，我们将有分家的危险。”果然，一九四四年他组织副长官部时，就不要我当参谋长了。

为了积累反共资本，汤恩伯汲汲于扩军。除了随时找机会鲸吞杂牌部队和地方团队以外，豫南的唐河、南阳、镇平三个师管区以及镇平的二十一补训处，均归其直接管辖。征集补充，任意处理，用人惟亲，重庆亦少过问，如李宗鉴、万建蕃等均经他直接派充补训处长。预十一师在南阳乡下抓逃兵，曾枪伤农民，受

害群众控至总部，师长蒋当翊竟强辩不认错。三十一分监部有时直接征集粮秣，专员、县长多仰其鼻息，强征勒索，急如星火，丝毫不顾人民死活。特别是汤恩伯任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兼党政分会主任以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独断专行，肆无忌惮。辖区内专员、县长均归其指挥，他又擅权任免，更加目空一切。安徽临泉县商会会长某巨绅和河南南召县财务委员长，均因案被汤下令枪毙。汤恩伯这样的作风，无非是建立个人的威信。此外，他在临泉大办边区干训班（富文任教育长），在叶县大建政治学院（马元才任院长），征料运树，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怨声载道。总部组织庞大，用费浩繁，虽有嫡系各军上缴一点经费，但杯水车薪，难以解决问题。于是他异想天开，在边区总部设有物资管理处，用几个搞军需工作的人开一鼎泰公司，由前任经理处长陈铭勋任董事长，专门从界首向上海和其他敌伪地区经营贸易，生意兴隆，赚钱不少。边区总部经理处也是亦官亦商，生财有道。结果上行下效，部队军风纪荡然。各级吃缺赚粮之风盛行，私自经商牟利的极其普遍，甚至个别有盗卖军装弹药以饱私囊的。黄泛区总指挥陈又新所辖各纵队尤其违法乱纪，公开经商走私。驻守各渡口的部队，借检查名义而受贿私放。因此，敌探潜入，敌知我方情况甚详，而我对敌情则茫然无知。有人说：“汤恩伯的十三军最坏，八十五军好一点。”旁人接着说：“八五还不是一十三吗！”

外间舆论如此，内部又将骄兵惰。部队虽年年扩充，发展很快，而争权夺利，升官发财之风更甚。凡属黄埔军校毕业的，哪一期到了哪一年，不问才能功绩如何，凭资历就得升官。马厉武是黄埔一期学生，因升任军长迟一点，竟到汤恩伯家中大闹特闹，他也莫可奈何。

河南自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连续发生大旱灾，继之以蝗灾，受灾面极广。一九四二年秋，暴雨数日，沙河又在叶县西北曹镇附近决口，叶县、舞阳、偃城、遂平、西平等县汪洋一片，几天以后大水方流入洪河。天灾如此严重，加上汤恩伯的残民以逞，因此，当时河南省参议会会有人说：“河南四害，水、旱、蝗、汤。”豫人恨之至深，汤恩伯刚复自用，毫不反省自责。他昏头昏脑地养剧团以自娱；办报馆瞎宣传，自吹自捧，恬不知耻。此时部队虽多，但能战者少，已成颓败之势。

四、汤集团和平汉线以西的溃败

一九四四年初，汤恩伯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三月，汤在叶县将三十一集团军总部改为副长官部。此时王仲廉升任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总部驻临汝；李仙洲任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总部驻禹县；何柱国任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总部驻沈邱；陈大庆任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总部驻安徽阜阳。汤恩伯自己仍兼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总部驻临泉未动。所辖四个集团军共有八个军，另骑兵一个军，各集团军均配属炮兵及其他特种兵不等。此外，陈又新担任黄泛区总指挥，有地方纵队二十余个。边区总部还指挥远在苏鲁地区的部队。也有不属副长官部建制而临时拨归指挥的，如刘汝明、高树勋、孙桐萱等都临时归他指挥过。汤集团实力此时最为庞大，西自伏牛山，东至淮河中游的正阳关，在一、五两战区之间形成一个独立的大战区。

这年三月十二日，汤恩伯将我调为副长官部总参议，并要我搬到离副长官部约二里的地方单独去住。我刚搬去两天，汤恩伯打电话要我再到参谋长办公室去看看。他在电话中说：“参谋长、参谋处长都是新接手的，现在有情况，你去看看吧！”我随即去了。

当时办公室有副参谋长两人、高参两人，连同参谋长刘子奇共五人，将地图摆满一地，正在研究。我问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们说有日寇正在中牟强渡，后续部队大而不详。次日，大家在汤恩伯的办公室商谈：有人说，这是敌人小规模の扫荡捣乱。我们现有四五十万大军，应以主力从周家口、界首渡黄泛，向开封、商邱两路进攻，迫使渡过河的敌人不攻自退。这个办法本来是好的，但是将骄兵惰、素无准备的汤集团，怎能于仓卒之间渡泛作远距离进攻呢？几天之后，即三月下旬间，日寇又在黄河铁桥附近渡过一部，与我荥阳、汜水境内的八十五军吴绍周部发生战斗。八十五军虽尚能支持，但中牟方面的新十五军刘昌义部萧劲师则支持不住，败退下来，以致郑州失守。我军主力十三军、八十五军、二十九军、七十八军四个军拟在登封、密县、禹县、许昌之线布置防御阵地。敌军占领郑州后，一路沿陇海路西进，一路沿平汉线南下，又攻取了新郑。这时敌人的主攻矛头似向南指。汤恩伯也曾电令在平汉路东的十五、二十九两集团军准备调兵西进夹击。命令下达后，汤赴洛阳第一战区长官部开会，我奉汤命到鲁山赵村设立副长官部指挥所，采取紧急措施，在十天内修通自赵村至伏牛山中心车村的大车道。日寇大部过泛集中后，四月初，以一个装甲师团（坦克、装甲车、汽车共三千余辆）于黄昏时自新郑以南转而西进，从禹县、襄县的中间地区进行闪电式的急袭。当时汤集团的总预备队（十二军贺粹芝部）在郟县境内尚未进入阵地，日寇的装甲师团在郟县亦未休息，第二天拂晓就到达临汝。临汝不但是三十一集团军总部的留守处所在，也是洛阳的南侧背，地位极为重要，是这一广大战场的枢纽。临汝陷入敌手，我前线登封、密县、禹县的部队都不战而退，望风披靡。日寇占领临汝后，其装甲部队继续向洛阳方面乘胜前进，以致在巩县、偃师一

带的第四集团军赵寿山部也不能不仓皇西撤，洛阳陷入敌手。据事后了解，这次进攻的日寇，系喜多诚一指挥的第二军团，附有一个装甲师团。这次的闪电战真是快得很，仅仅一夜之间，汤集团和平汉路以西的二十多万部队，可以说并没有部署占领阵地就被日寇打得溃不成军，日寇不费什么力量即攻占了洛阳。

沿平汉路南下之敌，攻许昌时战斗颇剧烈，我守许昌师长吕公良阵亡，官兵伤亡很多。以后也没有经过多大的战斗，敌人就将平汉中段郑州至武胜关地区完全占领了。

日寇占领临汝之日，情况是混乱已极的。我所带的五十瓦电台（副长官部枢纽台），几天之内叫不通各台，和汤恩伯所带的电台也联络不上。事后才知道，他在从洛阳奔洛宁的途中，曾被地方团队劫去电台，经当地县长交涉才予发还。王仲廉部在临汝以西，也被地方团队阻挠，几至发生战斗。在此纷乱之夜，我能够用电话联络的，只有贺粹芝的十二军，因他们正靠近伏牛山的山边苟安图存，彼此相隔不远。

汤恩伯的副长官部，由叶县经赵村撤至车村，五月间移西峡口，以后又移至陕西境内清油河，部队大都移豫陕边界地区整训。我所负责的副长官部指挥所，先在鲁山的赵村，继移南召李青店，直到十月间才撤销。但当时所能指挥的部队，仅十二军和各县的十个地方纵队。

一九四四年冬，汤恩伯因此役受到了撤职留任的处分。随后调贵州任第三方面军司令，部队大部分留豫、陕一带归胡宗南指挥。这时，我也离开了部队，赴内乡丹水镇担任河南省政府委员。

五、从接收京沪到逃窜台湾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汤恩伯部队从贵阳空运到上海、南

京地区接收，万建蕃又担任南京卫戍总部参谋长。汤此时任京沪卫戍总司令，后又兼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南京、上海、衢州一带均归其管辖。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的三年间，我虽在河南省政府任委员，但每年曾去南京、上海一次，每去总有机会和汤恩伯、万建蕃等见面谈话。从一九四八年起，国民党开始丧失军事上的优势，处于挨打的地位，局势急剧变化。这时我内心已肯定内战打不得了。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得变了。我对万建蕃、刘昌义都暴露过这种心情。一九四八年五月，我从南京回湖南，与万建蕃临别前夕，两人静坐相对。我说：“我这次回湖南，总还有大革命时代的老朋友可找。我不去河南了，南京、上海我也不再来了。”万说：“你还有老路可走，我是势逼处此，将来只有当‘白华’。”

一九四九年一月，淮海战役结束，蒋介石全面调整军事部署，将未被歼灭的残余部队南调，依长江布防，企图确保南京外围。并下令成立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以汤恩伯任总司令，布置江防守备，企图作最后的垂死挣扎。这时，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鉴于大势已去，密函汤恩伯顺应时势，不要再抗拒共产党，要他开一渡口让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陈仪凭借过去和汤恩伯的密切关系，不虞有他，特派亲属专程赴沪将信送达汤手。当晚，陈以电话询汤收到信没有？当时，军统特务头子毛森适在汤恩伯家中，询汤何事，汤以实告，并同毛森于当晚搭车往南京向蒋介石报告。汤以与陈仪关系深，请求表面上只撤陈的省主席职务，实际上由他去捉陈仪，并要求保全陈的老命。次日，汤即搭车去杭州，邀陈仪同往衢州绥署细商（汤此时仍兼衢州绥署主任）。到衢州后，汤单独回上海，转南京向蒋复命，令绥署副主任张雪中软禁陈仪。陈仪在衢州绥署被扣数月，蒋介石集团逃窜台湾时，将陈押解赴

台，后被枪决。汤恩伯平时对我们说过，“我对公侠（陈仪别号）先生以父事之”，可见其感恩之深。但到反共反人民的紧要关头，则平日恩情如父之人，也要置之死地，真是反动透顶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进军上海时，汤恩伯把上海一切可航海的船只抓住，从吴淞口上船逃往台湾。据云后因牙病在日本开刀身死。

复兴社的军事处及护卫队

蔡杞材

关于复兴社的内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的《文史资料选辑》已经刊登过好几篇资料。但由于这个反动组织的一切活动都很秘密，它的各级组织只许采取纵的关系，不许发生横的联系，因而一般成员都不可能对组织里面的情况全面了解；即使是各个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及工作人员，也大都只知道自己部门的情况，不易明了其他部门的具体活动。我曾在复兴社总会军事处工作过一个时期，特就军事处的组织情况及其领导的护卫队和骑射会的内幕，作一个简略的介绍。

（一）军事处的成立和桂永清的“雄心”

复兴社总会开始只设有书记处、组织处、训练处、宣传处、总务处、特务处^①六个单位，并没有军事处的设置。军事处是1934年初才成立的。复兴社总会既不指挥军队打仗，又不管理军队的教育训练，为什么要增设一个军事处呢？原来蒋介石组织复兴社

① 特务处即军统前身，戴笠任干事。名义上虽隶属于复兴社总会，但其人事、经费、业务均由戴笠直接秉承蒋介石的意旨行事。其办公地点设在南京鸡鹅巷（总会在明瓦廊办公）。上下公文均不经过总会，平日亦不向总会汇报工作，完全是戴笠的独立王国。

的目的是要效法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先进”经验，在中国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而复兴社的一班高级头目，除了个别的人如刘健群不是黄埔学生以外，绝大多数都是一些没有拿到枪杆子而又朝思暮想玩枪杆子的军人政客，他们看到墨索里尼的党卫军和希特勒的 S. S. 对维系法西斯血腥统治和镇压人民起了一定的作用，因而东施效颦，建议由复兴社组织德、意式的法西斯特务武装——党军。这个建议当然是正合蒋介石的“孤意”，为蒋所同意。是以复兴社总会于1934年初增设军事处，主持其事，派桂永清为军事处干事，胡靖安为助理干事；处址设于南京第一公园南边的一幢独立洋楼内（街名及门牌号子均忘记了。不久，办公地点迁移到宗老爷巷，以后又迁移到程阁老巷，最后迁并明瓦廊复兴社总会）。桂永清和胡靖安系同时留学德国的，对于德、意法西斯的一套特务武装组织比较熟悉，以之出任军事处正副干事，可算是“用得其材”的了。军事处的经费预算是仿照特务处的成例，由桂永清直接呈请蒋介石批准，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特支费项下开支，不列在复兴社总会经费预算之内。处内编制比其他各处（特务处例外）庞大，职员薪给也比其他各处要高。处内工作人员全系桂永清一手安排，不为桂之同乡，即为桂之部属，如助理干事胡靖安、秘书匡正宇和查某、组长王建煌、组员张某、会计何某等，皆系桂之江西同乡。其余如李西开、李昌龄、郭岐、蔡杞材、夏辰、庞宗仪、陈嘉珍、包烈、王康奇、朱剑侯、桂运昌、陈阜东等，多系桂永清在教导总队和前军官训练班的部属（桂是当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的总队长和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官训练班的主任）。此外如李忍涛、赵范生、吴中杰等，或为桂之留德同学，或为接近桂之复兴社分子，或为复兴社有力头目所介绍，与桂永清都有一定的关系。由此，复兴社组织中就形成了一个桂

永清系统，复兴社内部也从而出现了“桂先生”^①的称呼。

桂永清对复兴社内各派系在表面上采取中立态度，对各派系头目皆不得罪。桂永清对蒋介石表现得很“忠诚”，平日对蒋总是开口“校长”，闭口“领袖”，无论在公私场合提到“校长”或“领袖”时，总是挺着胸膛，靠紧脚跟，表现出“肃然起敬”的样子。他为了表达自己对“领袖”的拥戴，曾亲撰了一个“领袖歌”，由罗海沙谱曲，以之在教导总队、军事处、护卫队等所辖单位传授歌唱。我尚能背诵的后一段歌词是这样的：

“……大哉中华，代出贤能。蒋公中正，今日救星，历经变乱，均能复兴。我们跟他前进！前进！复兴！复兴！”从这几句肉麻的歌词里，可以看出桂永清的“拥蒋”是达到了何等狂热的程度。有人说桂永清是“桂草包”，其实桂貌似蠢愚，心殊狡黠，是“十三太保”中的水鸟型人物。

军事处初成立时，桂永清的“雄心”极大，他对军事处的工作很积极，不论如何忙碌，每天都得到军事处来一两次，万一白天抽不出时间，往往把一些会报和会议安排在晚上举行，如果搞到夜深了，使用自己的小汽车把参加会议的人送回家去。桂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有一个十万党军建设计划，大家将来要做的事情多得很！你们如果想带兵，将来有的是兵带。”关于成立“党军”的具体步骤和武器装备与干部来源等问题，桂曾责成庞宗仪等草拟了具体计划和办法。为了考虑将来的党军驻地问题，还责成包烈参照实业部经济年鉴编撰委员会最新出版的《经济年鉴》和测量

① “先生”在复兴社内部是各个派系喽罗们对其头目的一种习惯尊称，如贺衷寒派的喽罗祝贺为“贺先生”，康泽派的喽罗称康为“康先生”，军统人员称戴笠为“戴先生”（后改称“老板”）。余类推。

局的地图，汇集了有关的经济资料与地理资料，作为参考。但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十万党军”计划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一直不曾见诸实现。桂永清送到蒋介石那里去请求确定党军编制预算和拨发武器装备的签呈，也如石沉大海，不见批回。久而久之，桂永清不免有些泄气，乃于1934年冬辞去了复兴社总会军事处干事兼职，改由刚自德、意考察归来的杜心如接充（桂永清辞去军事处干事职务，其中有无别的原因我不知道）。此时正值鄧梯接任复兴社总会书记，他与复兴社另一头目潘佑强有宿怨（潘在鄧之前当过复兴社总会书记），而杜心如又是潘佑强的心腹，当鄧梯在复兴社总会当权的岁月里，杜心如的处境自然不是那么美妙。过去桂永清所不能实现的“十万党军”计划，到了杜心如的手里便更难实现了。

我虽没有参与过桂永清拟订“十万党军”计划的机密，但我想桂的计划一定事先经过蒋介石同意了，否则复兴社总会就不会有军事处的设置。蒋介石既然授权桂永清负责筹建党军于前，为什么后来又忽然变卦，以致军事处成为虎头蛇尾的结局呢？这个闷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麼药，不但军事处一般工作人员搞不清楚，恐怕连桂永清本人也不一定完全清楚。

（二）护卫队的组织、训练和任务

复兴社总会军事处成立后，即着手筹建护卫队。护卫队的任务是护卫“领袖”和护卫“团体”（“团体”是复兴社分子对组织的称呼）。也就是说：凡是蒋介石驻节所在的地方和复兴社机关所在的地方，当地护卫队有保卫其安全的责任。它的性质显然是为了镇压人民和消除异己的一种秘密特务武装组织。原计划是：凡各省市有复兴社组织的地方，都要建立护卫队。其队员由当地复

兴社组织的内层分子中挑选(即是由革命同志会^①的会员中挑选,一般复兴社社员不能当护卫队队员),每人配发必要的武器和交通工具(如手枪、自行车、摩托车等),以便担负各种突然事故发生时的特殊任务。队员为义务职,不在营,也不脱产,除了定期训练与定期演习外,一般是非有特殊任务不采取集体行动。为了试点摸索经验,1934年3月假南京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即黄埔同学会)成立首都护卫队。该队共有队员约百人,均系从南京各机关、学校年轻力壮的革命同志会成员中挑选而来,其中有陆军大学学员潘华国(陆大学员约选有十人,编为一个小队)、骑兵学校队长文谟、中央军校学生杨友柏、联勤总部科员胡献群、军委会铨叙厅科员彭濮、教导总队营长邓文儒、排长萧西清、首都警察厅督察周继昌和中央政治学校学生十余人(政治学校学生编为一个小队)。由桂永清兼任队长,蔡杞材兼任队附。下分三个区队,以乐干、彭月翔等分任区队长(另一个区队长似为郭岐,我记不大清楚了)。每区队辖三个小队,小队长由队员中遴选指定。成立会的仪式虽然很简单,但气氛却十分严肃,由桂永清领着大家站在蒋介石的挂象前举手宣誓,誓词内容是:“余以至诚,效忠领袖,护卫团体,绝对服从命令,严格遵守纪律,不成功,便成

① 复兴社的核心组织为三民主义力行社(简称力行社或力社),其内层组织初为革命军人同志会(简称军会,以吸收军人为主)和革命青年同志会(简称青会,以吸收文人和青年学生为主)。约在1933年左右,革命军人同志会与革命青年同志会合并,改称为中华革命同志会(简称革命同志会)。复兴社乃是第三层的外围组织。由于分子复杂,不易保密,故外间均知其臭名。此外还有中国童子军励进社及忠义救国会等,则更属外围之外围。本文所指的复兴社,实力行社、革命同志会、复兴社三层组织的混称。

仁。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大意如此，文字上可能有出入）。为了便利桂永清的指挥掌握，设队部于南京桃源新村桂永清住宅左邻的一幢洋楼内（后来迁往宗老爷巷教导总队占据的一处营房内），由一个姓龚的副官（江西人，系桂永清介绍）和一个姓尹的司书（益阳人，系我介绍）及两名传令兵常川驻在队部。我则往来于军事处与护卫队队部之间，处理日常事务，较重要者就近送请桂永清亲自处理。大约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由于桂永清的兼职过多，队长一职改由军事处助理干事胡靖安兼任（胡也住在桃源新村护卫队队部附近），我仍兼任队附。胡秉性狂暴，自视甚高，因没有当上复兴社最高级的干部（指总会干事会干事）老是牢骚满腹，怨气冲天。他就任队长职务后，来队部除了谈看相、算八字以外，便是骂人。他对复兴社的一些高级头目几乎个个都骂，只不骂戴笠。据胡自称：戴是他的老部下，由他一手培植起来的。他说：“团体里的干事（指复兴社总会干事会干事）根本不值钱，谁也不是凭自己的真本事得来的，都是靠老头子（指蒋介石）的钩子过日子。老头子好比是一个秤钩，大家好比是块肉或一件物品，今天钩了你你就是干事，明天钩子一松你就跌下来，愈是钩得高的人愈是跌得重。你们对那些今天跑红得意的人千万不要羡慕！”胡的这番“妙论”有时竟在首都护卫队集会上的讲话中公开宣扬。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复兴社诸头目的耳里，一致对胡深表不满，并指责桂永清不该引用这样一个狂妄之徒到团体内部担任重要职务。胡靖安因此被撤掉了复兴社内的本兼各职，首都护卫队队长改由军政部化学兵总队长李忍涛兼任。李虽然不是黄埔学生，但与桂永清是同时留德的好朋友，他的老婆是个德国女人，他的住宅也在桃源新村。由于本身职务较忙，他经常住宿在化学兵总队，对护卫队的工作实际上很少过问。胡靖安离职

后，军事处助理干事亦改由黄正山^①继任，黄因服刑未满，不便在外出头露面，专负处理军事处内部日常事务和一般公文之责。桂永清虽然辞去了首都护卫队队长兼职，但他凭着军事处干事的职位，仍随时对首都护卫队发号施令。比较重要的问题，我都随时向他请示。

首都护卫队成立后，每星期日集合训练一次。训练内容原有“领袖言行”、“精神讲话”、“德意考察报告”、“马术”、“射击”、“自行车练习”、“摩托车练习”、“爆破演习”、“侦探常识”、“化学通信”等。当首都护卫队成立之初，队员们皆以“领袖”的卫士和“团体”的尖兵自居，彼此会心地流露出一种“升堂入室”和身穿黄马褂的得意神态，我自己也满以为从此“鹏程万里”，更是飘飘然不可一世。大家对护卫队组织都感到很神秘，对队的纪律一般都能认真遵守，参加训练也很踊跃。后来由于武器、装备迟迟没有配发，有关技术训练的课程也因教材与教官的缺乏无法实施，以致护卫队成立了许久，而训练内容仍只能以“精神讲话”为主。复兴社诸头目除了贺衷寒、刘健群等极少数人尚能勉强卖卖膏药，大家还愿意听听他们的吹牛以外，其他都是一些“墙上芦苇”与“山间竹笋”之辈，他们的“精神讲话”对听众来说，只能起到催眠的作用。护卫队队员都是经过挑选来的，一般都自命不凡，他们对一而再、再而三的“精神讲话”实在不耐烦听了。有的说这不是“精神讲话”，而是“瘟神讲话”；有的说这是“神经讲话”；有的说“天不怕，地不怕，只怕星期天听讲话”；甚至

① 黄正山即黄珍吾，因其任宪兵团长时，在苏州处死一个英国人，引起外交纠纷，被判若干年徒刑。黄服刑未满，秘密出狱，故不敢用真名。抗战胜利后，黄任南京首都警察厅长时，即已复用黄珍吾的原名。我没有问他是什么时候恢复原名的。

还有在背地骂娘的。我看了这种情形，也无可奈何，只有装作没听见。护卫队是一个极端秘密的黑店，不能找外面的人来队讲课。十八罗汉团团转，讲课的人还是只能在复兴社诸高级头目中间打主意。这班家伙明明是病在“胸无点墨”，可是他们却偏要装成“日理万几”、“席不暇暖”的“党国要人”模样，今天请张三讲话张推脱，明天约李四教课李不来。因此，队员之间很快地产生了消极厌倦情绪，定期训练每多流产，应到受训的人常有缺席。兼队长李忍涛后来干脆连队部也不来了。我是队部的实际负责人，每到星期天，我就感到如临深渊，不可终日，别人过星期天是吃喝玩乐，我过星期天是诚惶诚恐。我看到这种每下愈况的趋势，深感欲罢不能，难以为继之苦。但又不敢大胆将队员的涣散情形如实地向桂永清反映，对他泼冷水，只有敷衍应付，徐图脱身之计罢了。

1934年暑期，桂永清为了企图把护卫队这一反动组织扩大到全国范围，乃由军事处举办一个护卫队干部训练班，班址设在南京宗老爷巷。学员约八十人，训练期间为一个月。训练内容有：“军事教练”、“精神讲话”、“政治经济学讲话”、“情报学”、“护卫队组织、训练及其任务”等。桂永清兼班主任，黄正山兼副主任，李昌龄兼队长、郭岐兼队副，萧西清等兼区队长（队长、队副、区队长，均系从教导总队调来）。学员一律穿军服，佩挂“教导总队”的符号、臂章。教练用枪及被服、蚊帐、军毯、工作器具等，亦均由教导总队借用。“军事教练”主要是灌输教导总队所推行的德式操练，由队长、队副、区队长负责实施；“精神讲话”主要是由桂永清、黄正山担任；“政治经济学讲话”由孙伯寿主讲；“情报学”由参谋本部的一个高级德国顾问讲授，桂永清协助翻译；“护卫队组织、训练及其任务”或由桂永清、黄正山讲授，或分发参

考材料由学员研究讨论。调来受训的人员多系各省市复兴社的负责干部或骨干分子，我尚能记忆的有河南的胡佛（湖北人，当时任河南省保安团长），湖北的李书玉、山东的郭家范，北平的李慎之、姚渐逵（姚是湖南人，当时在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工作）等，军事处工作人员王康奇、桂运昌、陈嘉珍和我也参加了受训。我乘受训的机会，将首都护卫队队附兼职移交给杨周熙接替。杨周熙系军校六期交通科毕业，以著《论法西斯政治》（？）一书获得蒋介石的赏识（蒋看到杨的著作后，即传见杨，并命杨同他由九江坐兵舰返南京。蒋在兵舰上和杨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当即“手谕”派杨到德国和意大利考察法西斯政治制度。杨刚从德、意考察归来，便接任了我的这个职务）。他膜拜德、意法西斯独裁政治达到了疯狂的地步：无论是身穿军服或身着便装，在公私场合对人都是行国社党的举手礼；唱歌、跳舞都是模仿德、意法西斯党徒所习用的曲调；他买回许多当时在德、意流行的法西斯歌曲唱片，在首都护卫队的集会或其他公私场合中不时搬出随身携带的唱机公开播唱，自己则随着唱片狂歌乱跳，丑态百出。

护卫队干部训练班结业后，受训人员各回原职，着手筹备建立各地的护卫队组织。我因要求带兵未成，仍回军事处工作。之后，上海、开封、北平、武汉、安庆等地的护卫队相继成立（已成立护卫队的省市我记不完全了，但肯定不止上述几处）。各地护卫队人数多少不一，活动情况大致与首都护卫队相同。由于整个护卫队的经费和装备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各省市护卫队队部每月只发三十元办公费，队长每月只发二十元津贴），除了首都护卫队由桂永清私人从教导总队借来德式快慢机和白朗林手枪共二十余枝外，其他省市始终没有配发武器。桂永清在护卫队干部训练班所作的许多诺言很少兑现，各地要枪要钱的报告纷至沓来，也

得不到具体的答复。因此，各省市护卫队成立之后，也是同南京一样地松弛涣散，甚至更有过之。

1934年冬，杜心如继桂永清任军事处干事。他当时从德、意考察归国不久，在复兴社内既无“群众”基础，又未掌握公开的军政实权（杜心如后来掌握了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逐渐形成了以杜为首的“军训”系统）。蒋介石对杜心如的信任也不会高于桂永清，再加以酆悌与杜之间的磨擦，杜对护卫队的工作更是一筹莫展了。

复兴社创立的时间虽然不太长，但一班高级头目的贪婪、凶残、倾轧、跋扈却表现得十分突出。外间唾骂日甚，内部矛盾日深。这样一来，不免给蒋介石增添几许“恨铁不成钢”的失望情绪。不仅党军、护卫队的发展计划遭到搁浅，而且复兴社这个蛆堆动乱的脓疮，也显然到了快要穿泡的程度。我于1935年春离开了军事处，护卫队这个组织最后是如何收场的，就没有再与闻过了。

（三）“骑射会”的内幕

当蒋介石创立复兴社之日，亦即高唱“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之时。为欲一手以蔽天下人之耳目，对于复兴社这个见不得天日的秘密法西斯团体不得不想方设法，采取各种措施，加以掩护；尤其是对于护卫队这样一个极端秘密的法西斯特务武装组织，更少不得披上一件“合法”外衣，以免天机泄漏，露出自己的狐狸尾巴。这就是骑射会出现之所由来，也是复兴社外围组织的另一种方式。

骑射会在表面上看来是一个提倡“军事体育”的群众性的公开社团，实质上乃是复兴社为着掩护护卫队训练和集会的一个外

围组织，不过在形式和方法上另要一套手法而已。骑射会的蓝图也是桂永清从德国抄袭来的。当军事处着手筹建首都护卫队的同时，为了解决护卫队集合和训练的地点问题，桂永清即倡议建立首都骑射会。首先由复兴社总会军事处印好一个发起筹募首都骑射会基金的“倡议书”，由桂永清四处找人签名列为发起人。由于当时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彼此巧立名目成立各种各色的所谓“学术机构”与“社会团体”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往往相互攻讦、冲突迭起，弄得社会诟病、舆论哗然。因此，稍微束身自爱的人，对于各个政治派系所操纵的“社团”组织，大多避而远之，不愿涉足。桂永清为欲把骑射会说成是一个纯军事体育性质的“群众团体”，并力图冲淡骑射会的政治派系色彩，以避免暴露复兴社幕后操纵的秘密，故意邀请一些在国民党内派系色彩不甚显著或是在军事教育方面负有一定虚名的人作为首都骑射会的发起人。如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宪兵司令谷正伦、南京市长马超俊、首都警察厅长陈焯、陆军大学教育长黄慕松、步兵学校教育长王俊、炮兵学校教育长邹作华、工兵学校教育长林柏森、兵工署长俞大维等都被邀请为首都骑射会的发起人。为了扩大骑射会的声势并控制发起人的多数以便于操纵理、监事会，除了邀请上列诸人作为发起人外，又选定大批复兴社分子列入发起人名单。这些复兴社分子中有高级头目贺衷寒、袁守谦、邓文仪、刘咏尧、萧赞育、刘健群、滕杰、周复、张元良、桂永清等，也有军事处骨干如赵范生、李忍涛、匡正宇、夏辰、李西开、郭岐、庞宗仪、陈嘉珍、蔡杞材等（赵范生以下诸人均系军事处工作人员）。每一个发起人给一本捐簿，由各人分途负责筹募基金，共计募款约五千元左右。另由南京市政府征拨中山门内南面靠城墙的数十亩空地，就中建西式平房一幢作为会址，并辟简易打靶场和马术场各一处作为会

员练习射击和骑马的活动场所。1934年四、五月间正式成立首都骑射会，选举褚民谊为理事长，桂永清为副理事长，谷正伦、陈焯、马超俊、林柏森、李忍涛、匡正宇、夏辰、郭岐、庞宗仪、蔡杞材等二十余人任理、监事（理、监事绝大多数为复兴社分子，具体人名记不完全了）。并派庞宗仪兼驻会干事，实际负责处理日常会务，还有一个专任事务员常川住在会内，担任收发、缮写及保管等事项。

首都骑射会的发起人和理、监事人选是在“声望”和“专长”相结合的幌子下产生的，其中有当时的所谓“党国要人”与杀人不眨眼的头号刽子手，也有连公开职业都没有的复兴社分子。前者臭名远扬的“声望”固属实在，后者的骑射“专长”却全是骗人的鬼话。因为除了李忍涛的手枪打得相当准确以外，其余没有一个是善于骑马和射击的。外间看来这是一个名位悬殊，不合常规的名单，哪知把戏的秘密就要在这个“不合常规”里面。俗话说：“打浑了水好捉鱼”，这就是桂永清策划的“浑水摸鱼”计。因为不要这个“掩眼法”，就不可能使外人看不出骑射会的政治面貌；不要这个“掩眼法”就不可能把骑射会操纵在复兴社手里。

为了使外间摸不清首都骑射会的政治背景，凡举行会员大会或理事会时，都是推举褚民谊为主席；在报上发表新闻时，也把褚民谊的名字列在第一位，并有意识地对他作一些吹捧。我有一次和桂永清谈到褚民谊的政治关系时，我说：“褚民谊是改组派的重要人物，他能和我们真诚合作吗？”桂说：“改组派不象CC，它不会多我们的事。褚民谊是个八面玲珑，喜欢戴高帽子的人，我们可以利用他的名位影响别人。大家今后在表面上要对他恭敬一些。”首都骑射会每次开会时，事先都由军事处拟好会议议程、讨论事项、人事名单、主席讲话要点等各种现成的材料，交给桂永

清随带在身边，到了开会的时候用电话通知褚民谊来参加，褚总是有请必到。褚对骑射会的秘密作用或者是有意装聋作哑，佯作不知，或者是真的不明底蕴；再加以他一天到晚东奔西跑酬应不暇，弄得昏头昏脑；他对骑射会开会的内容事先既无准备，仓卒爬上主席台，当然只好根据桂永清准备的资料照本宣科一番。到会的人绝大多数是复兴社分子，大家对于开会的目的要求事先都胸有成竹，只要褚民谊是按照桂永清的方案行事，当然是一呼百诺地举手通过。

根据首都骑射会的章程（章程也是由军事处拟订的，我和庞宗仪起草），凡申请加入首都骑射会为会员者，必须有首都骑射会发起人或理、监事二人以上之介绍，并经理事会的审查批准。首都骑射会既是为着掩护首都护卫队的训练与集会而设、它的发起人和理、监事又绝大多数为复兴社分子，凡非护卫队队员，也就必然不会吸收为骑射会会员。因此，首都骑射会除了吸收首都护卫队全部队员为会员外，其他非护卫队队员一个也没有被介绍为会员的。为了便于识别，每个会员还制发了一枚铜质会徽（会徽系我设计、经桂永清核定的）。首都骑射会成立后，首都护卫队每星期日上午的例行训练就以该会为固定地点了（大雨天或某些讲演会，仍假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礼堂举行）。

由于桂永清的党军建设计划一直不见下文，护卫队的装备问题也一直没有解决，首都骑射会虽然成立，会址虽已落成，但购买马匹和摩托车以及充实各项设备的原定计划皆无法实现。除了将首都护卫队的二十多枝德式快慢机和白朗林手枪全部借来应付外，并没有什么新的添置和设备。首都骑射会的活动项目除了手枪射击和自行车练习外，连马也没有骑过一次。手枪射击只有中央政治学校的队员还稍感兴趣，其余军人队员大多不喜欢这个玩

艺儿（因为玩厌了）。随着首都护卫队的日趋涣散，骑射会的活动也很快地濒于瘫痪状态了。

各省市护卫队建立后，某些大城市如武汉、北平、上海、开封、安庆等地，也同样由当地的复兴社分子发起成立了骑射会（成立了骑射会的具体省市，我记不清楚了。凡是建立了护卫队的地方，一般都成立了骑射会）。关于首都骑射会的建立的方式、方法和工作经验，在护卫队干部训练班中已详尽地传授给各地受训人员，所以各省市骑射会的活动内容与首都骑射会当会大体相同。我在复兴社总会军事处虽然是主管各省市护卫队和骑射会这一方面的业务，但一直没有到各省市去实地视察过，因此，对各地骑射会的具体活动情况，也知道得很少。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蒋军第八十五军在淮海战役中被解决经过

吴 绍 周

淮海战役中，蒋军以黄伯韬第七兵团在碾庄的复灭开始，继之以黄维第十二兵团在双堆集的被解决，决定了蒋军全部被毁灭的命运。第十二兵团是一九四八年九月编成的，以黄维任司令，胡璉任副司令，初辖第十军，第十四军、第十八军及一个快速纵队（骑兵一团、美式战车一连），九月初，集结于河南的汝南、驻马店、漯河一带，归华中“剿总”指挥；后来又将第八十五军编入。黄维兵团在作战期间，由于内部的派系矛盾和对非嫡系部队的歧视、压迫，以致军心涣散，斗志消沉，加之第八十五军的两个师在战场先后起义、投诚，进一步影响了战局，加速了全兵团的复灭。我当时以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兼第八十五军军长参加作战。现就回忆所及，将第八十五军被解决经过略述如下。

第八十五军编入第十二兵团的过程

第八十五军辖第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第一百一十师（师长廖运周）、第二百一十六师（师长谷允怀，欠一团）和军直属部队山炮团、重迫击炮连、工兵营、搜索营、特务连、卫生大队，综计全军官兵约三万五千人；原在广水、应山、随县、安陆地区维护交通，归华中“剿总”直接指挥。十月初，接白崇禧转来国防部电令：第八十五军归入第十二兵团序列，并将我原职第四兵团副司

令改调为第十二兵团副司令，仍兼八十五军军长；令将广水、确山防务交与张淦兵团接替后，准备东开。当接到这一电令后，我的内心起了极大的震动，考虑我军被编入第十二兵团，有种种困难，对我个人前途和第八十五军都不利：首先，我不是黄埔出身，也没进过陆大，在人事关系上，又与陈诚的“二八集团”（即第十八军老干部和保定八期陈诚的同学）无联系。回想本年三月驻扎应城时，曾接到国防部电报，告以蒋介石批准，我被升任为第四兵团司令，但以后由于陈诚不同意，竟将命令搁压，不予公布。现在又被编入陈的嫡系第十二兵团，将来必被整编吃掉。其次，回忆一九四六年三月间，驻防河南新乡时，胡宗南认为我不是黄埔学生，又不是陆大系统，要在整编时把我换掉，因为汤恩伯不同意，王仲廉也不赞成，才没成为事实。现在又要重复陷入那时的处境，不能不增加我的顾虑。第三，第十八军官兵骄横无比，在确山时，曾与我军二十三师官兵发生过严重冲突，今后同在一个兵团，势难协同作战。第四，第八十五军当时担任护路，所有辐重及部分重装备都留置汉口后方，仓卒东开，不能适应作战要求。因此，接到国防部电令后，我曾将这些顾虑，在电话中向白崇禧委婉陈述，请他转电国防部准八十五军仍担任护路，归张轸指挥，或编入第三兵团建制内。我之作此请求，是从我个人利害结合当时白崇禧的利益出发的。张轸为程潜、汤恩伯的旧部，得汤信任；在他任第一百一十师师长时，我任副师长，私人感情颇好；并且他与八十五军部队，亦有历史渊源，若能归他指挥，当能得到照应。这点如不能达到，则请编入第三兵团建制。第三兵团司令张淦为桂系骨干，又是白崇禧的亲信，这是我想迎合白崇禧的心理。但都被白崇禧拒绝了，他说：“这是总统的军令，不易收回，我不能当家，也不能帮忙。”要求既不能达到，只得匆忙准备东开，于十

一月上旬，由广水出发，经正阳、新蔡、阜阳、蒙城循兵团经过路线，向宿县急进。

盲目进军

根据兵团的行军命令，第八十五军附第十八军的第四十九师为第二梯队，在广水集结后，迅速车运确山，循兵团进路向阜阳急进。当部队开拔的时候，除了得到兵团如上述的简单指示外，对当面敌情和以后的具体任务，是毫无所知的，以为只是一般的归还建制。因此，在匆忙出发时，全军携带的粮秣弹药，不足三天之用；并且行军的路线，要横过洪河、淮河、涡河和浍河，都是在人民解放军的凭险阻击之下，因之行程迟缓，部队疲劳，平均每天没有超过六十华里；尤其使人头痛的是走在兵团后尾，沿途老百姓受到兵团先头部队的蹂躏，都已相率逃避，比及我军追踪所过的地方，都已十室九空，如入“无人之境”，这样，更增加了进军的困难。十一月中旬，全军进到阜阳，稍事休息，并补充粮秣。某晚，接到张轸的电报，说第八十五军有仍开回广水原防的消息。我很高兴，乃向张轸联系，方知他并未接到正式命令。可是黄维电促速行，不敢违误，只好续向蒙城前进。到达蒙城后，又接到国防部电令，我被升任第四兵团司令，第八十五军军长则以第一百一十师师长廖运周升充，所遗师长缺以该师副师长杨柳营升充。接到这一电报后，我想部队已经接近战场，而且又在第十二兵团战斗序列之内，并无明令脱离其建制，中途来这一出“升官”的把戏，真是滑稽之至。如果立即公布，可能会促使部队更加混乱。为了安定军心，我即将此电报交由人事科保存，准备等到战役结束后再公布。

由蒙城继续行军，于十一月廿三日到达南平集兵团集中地区，

参加双堆集的战斗。

兵团部的军事会议

十一月廿三日，我率军直属部队及第二十三师到达南平集。黄维于当晚召集我和第十军军长覃道善、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等到兵团部研究当面敌情和决定尔后的军事部署。他首先告诉我们，蒋介石电催我兵团参加徐州以东地区作战，以解黄伯韬第七兵团之围。其次，综合当面敌情：宿县已为解放军占领，通宿县的公路上发现了解放军的大部队运动；又据空军通报，泗阳大道上亦发现了解放军大部队南下；第十军发现了解放军强大部队由西而东，攻击该军侧背，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与第十军的后卫部队发生接触。当时，我也将军部留置蒙城的病兵逃出后所说的“蒙城已为解放军所占领，兵团后路已断绝”的情况提出报告。这时，黄维已经意识到情况确实严重，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才能脱险。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首先发言，认为兵团目前所处环境，非常严重。解放军大军云集，布下了天罗地网，我军已经陷入圈套，必须采取稳妥行动，才能解脱。我在详细研究地图以后，对黄说：“我们是大兵团作战，必须有后方源源补充粮弹，才有胜利把握，最好是把兵团重点摆在十四军右翼，向固镇西南的铁路线靠拢，一方面取得后方的补给，一方面与刘汝明、李延年两兵团合股，再沿津浦铁路线向北打，这样，可立于不败之地。”黄维紧锁双眉，焦急无计，会议并未作出最后决定，因已夜深，只得散会。一直等到半夜以后，才接到兵团向固镇转移的命令。

兵团规定的转移部署如下：

一、第十四军迅即向东平以东浍河之线前进，沿浍河南岸向北警戒，阻止解放军南下，以掩护兵团的转移，

二、第八十五军以主力于南平集附近占领阵地，向西北警戒，以掩护第十八军和第十军的转移，待两军通过后，即经罗集向固镇以西瓦疃集附近前进；

三、第十军迅即脱离解放军，向浍河南岸依靠第八十五军、第十四军的掩护，向固镇以西前进；

四、第十八军迅即脱离解放军，连同快速纵队经双堆集向固镇西北湖沟集前进；

五、兵团司令部在第十八军后跟进。

当时，我根据兵团的这一转移部署，曾就各军的战场态势通盘考虑，认为第十军和第十八军依靠自己的警戒与掩护，可以安全撤下战场；第十四军和第八十五军各就现地取捷径自到固镇西南集结，要迅速便利得多。黄维之所以如此部署，显然存有损人利己的私心，是为了确保嫡系部队的安全，不惜牺牲非嫡系部队。由于他利用兵团司令的职权，发布命令，我初归建制，而且又关系到本军的任务，因此，也就不敢提出异议。不过各师官兵大都愤愤不平，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地勉强遵照命令行动。

第八十五军的掩护战斗

兵团的转移命令传达到团，已经是二十四日上午九时了。在临涣集的解放军由北向南压迫，与我第二十三师发生剧烈战斗。第一百一十师廖运周部（欠一个团）则依照兵团命令，于廿二日先由赵集东进，担任对东南方的搜索，掩护兵团主力转移。该师单独行动，与军部已经隔离。当天下午，南平集以东的解放军亦向我第二十三师掩护阵地猛攻；第十四军正面河东的解放军也展开全面的攻击。

二十五日晚，解放军已在几处强行渡河，战斗仍继续进行，

部队的大部都在阵地彻夜战斗。廖运周师(欠三二八团)则随同兵团部已到达双堆集宿营。第十军与第十八军亦陆续撤出阵地，集中双堆集，准备二十六日按兵团转移计划行动；惟因解放军包围形势已成，部队不能行动，只得就地停止。

二十七日晨，黄维命令廖运周师先头出发，兵团部、第十军、第十八军在廖师后续进，第八十五军(欠廖师)在后掩护。

各军正开始行动时，北面东面的解放军跟踪追迫，全面的战斗正式展开。当我率第八十五军(欠廖师)到达双堆集时，兵团部、第十军及第十八军均已将村庄房舍驻满，仅由第十八军让出集东南几个小村庄与八十五军军部及第二十三师住宿。因房少人多，军直属部队及廖师姜继鑫团与第二百一十六师新兵团俱在集镇的空地露营。以后，第十八军在双堆集西面夺回小村一处，兵团令廖师姜团进驻，并就近归第十八军指挥。这样一来，姜团又从我的直接指挥之下调去替第十八军做挡箭牌了。

廖运周阵前起义

当八十五军直属部队暨第二十三师到达双堆集时，廖运周率师部及两个歩兵团已进出于双堆集以南，中间经解放军截击，与我失去联系。以后我率姜团前进，但出双堆集不到五华里，即为解放军阻击，不能越雷池一步。当我军已陷入包围时，曾经用报话机向廖师联络，仅一度听到该师参谋长冯炉青在报话机上说出：“我们到了安全地带，请你放心”几句简短的话，以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这时，我以为廖师只是被解放军截断联络线，被迫向外围转移了，尚没有意识到廖运周会率部起义。我之作此想法，是有根据的：首先，一百一十师官兵与我很深的历史关系。廖运周出身黄埔五期炮科，平日为人精明能干，工作负责，对命令

能够绝对服从，每次都能达成任务。一九三七年，我任一百一十师师长时，他来当团长，我对他印象甚深；又由于他是黄埔学生，容易得到上级的信任，因此，我升八十五军军长时，就力保他当一百一十师师长。廖当了一百一十师师长后，我们之间的友谊自然又增进了一步。过去我对廖既推心置腹，这次廖真要起义照理也不会隐瞒我的。其次，就部队本身说，当由广水匆忙出发时，全师眷属及重兵器、战防炮与辎重等都留在汉口后方，纵或廖要起义，全师的官兵未必会随廖行动。从这些关系和情况来考虑，当时我没有想到廖会在这时起义。

二十八日，各方面战斗继续进行，前沿村庄据点纷纷失掉，已经形成了被包围的态势。二十九日，包围圈逐渐缩小。当日，兵团副司令胡璉由南京乘飞机到双堆集降落，带来了蒋介石的命令和指示，也带来了廖运周起义的确实消息。当时蒋的指示大意是：（1）刘峙由徐州飞蚌埠指挥；（2）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三个兵团放弃徐州，先向西撤，以后再南向转到蚌埠集中；（3）黄维兵团即在双堆集牵制解放军，掩护杜聿明部的左侧背，以便该部迅速向蚌埠集中；（4）由南京、汉口抽调部队到蚌埠北进增援。在胡璉传达这一指示后，各军师即开始构筑据点工事，企图固守现有村庄，并在双堆集东南侧修筑临时空降场，以接受空军的联络与补给。

在包围圈里挣扎

十二月上旬以来，强大的解放军占据了沿双堆集的四周村落，构筑纵深阵地，将第十二兵团围困在一个方圆不到十里的狭窄地区内，十几万人马辎重拥挤一团，机械化兵、炮兵、步兵和骑兵相互妨碍，都不能充分发挥各自的特性和威力。在激烈的战斗中，

粮弹日少，伤亡日多，士兵斗志消沉，战斗力逐渐削弱；各级指挥部也一筹莫展，只是捱打而已。在廖运周部起义消息传播后，又在无线电中听到黄伯韬兵团已在碾庄被解放军歼灭；杜聿明所率解围的三个兵团，到达萧县、永城后，也被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所包围，陷于黄维兵团的同一命运。黄昏以后，遥闻该方面的枪炮之声彻夜不绝。兵团当面的解放军除了夜间进行猛攻渗入，占领周边村庄，紧缩包围圈外，白天则在阵地前展开宣传攻势。如在阵地前沿竖立门板，写上大字口号：“欢迎起义”、“优待俘虏”、“不杀不辱”、“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团营连长用望远镜看得十分清楚，相互转告，消蚀了死守待援的决心；有时，对阵传出了响亮的喊话，也深深地刺激着第一线士兵的心情，从而大大削弱了斗志；最使指挥部头痛的是解放军陆续放回的俘虏，纷纷传播解放军的宽大政策，进一步瓦解了官兵的战斗意志。兵团部及各军、师、团长以上指挥官曾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禁止收听解放军电台广播，隔离被俘官兵，又从南京用飞机一再带来打气的消息，传达已由汉口、南京调集强大增援部队集中蚌埠，北进解围等等。但是这些自欺欺人的“好消息”，只能在各级指挥官的脑海里昙花一现，很快地就幻灭了，大家意识到已经不能够摆脱全军复没的悲惨命运了。到十二月八日，本军所属的第二十三师、第二百一十六师的一个团及军部卫生大队由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率领，又在阵地上向解放军投降，敞开了第十八军的大门，就更加加速了整个兵团的被歼灭。

黄子华率部投降

从十一月廿七日廖运周率部起义后，我已受到第十八军的监视。杨伯涛以便于指挥为名，叫我搬到第十八军军部“共同指挥”，

表面上虽未将我扣押，但我的起居行动，均有第十八军的军官和卫士跟随；又将第八十五军对所属部队的通信网撤收，与第二十三师的联络，则由第十八军总机接转。在这种情况下，全军官兵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廖师的姜团和二十三师的两个团，位置在双堆集东南小村庄，前受解放军的猛烈攻击，后有第十八军占领坚强阵地阻止交通，既不能与我联络，又不能接受粮弹补给，处境异常恶劣艰苦。由于二十三师原系地方系李云杰的部队，官兵多属湖南嘉禾、蓝山一带的人，师长黄子华在师历史悠久，故虽在这样困苦险恶之中，尚能暂时守住阵地。但到十二月上旬以来，气候骤然寒冷，伤亡愈多，补给日少，集内空投场所又为黄维指派嫡系部队第十八军所把持，最初尚以其余滴分润各军师，以后空投日少，分润的更寥寥无几。二十三师既处于饥寒交迫、弹尽粮绝之中，又遭受这种不平待遇，乃有部分官兵不顾兵团命令，自动到空投场边拾取粮弹，第十八军部队竟开枪射击，引起该师官兵愤慨；再加上前在确山时曾与第十八军发生过武装冲突，当此饥寒交迫的时候，旧恨新仇交织，再也无法压抑，遂至大打出手，双方开枪射击，互有伤亡。

十二月十日晚，双堆集东南突然一片喧哗之声，十几分钟后，归于沉寂。少顷，二十三师副师长周卓铭经十八军许可，来指挥所见我，说：他们当面情况紧急，黄师长要他报告，请我亲自去指挥督阵。这时，因廖师的起义，我的行动，早已被监视，不能自由前往。周亦未说其他的话，即行退出。次日，杨伯涛告诉我，黄子华已率部向解放军投降了。到此时，我所带的八十五军战斗部队已是先后归向人民，剩下的只是我这个光杆军长了。在这种战况极端艰难的时候，黄师的突然阵前投降，敞开了十八军的大门，在战场态势和官兵心理上的影响，较之廖师的起义更为严重。黄

维切齿痛恨，电令杨伯涛将我送到兵团指挥所第十一师师部掩蔽部内扣押看管。次日，黄维在掩蔽部内对我说：“这里炮弹随时落下，很不安全，你坐飞机到南京去吧！”这很明显，黄维、胡璉企图将这次战役失败的责任，推在我一人身上，将我送南京去受军法制裁。幸亏这时临时机场已为解放军炮火控制，飞机不能降落，随着包围圈的缩小，临时机场完全不能使用，因此，他们这一阴谋未得实现。

从突围到被俘

十二月十五日，黄维、胡璉召集杨伯涛、覃道善及代参谋长韦镇福等到兵团指示突围计划，其要领是：“四面开弓，全线反扑，觅缝钻隙，冲出重围”。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四散逃命而已。他们判断解放军围攻的重点是保持在双堆集南面和东南角，主要是挡住蒋军逃向蚌埠，所以他们指示突围时，分向东、西、北三方面冲走。由于联络八十五军的电话早已撤收，韦参谋长不可能向八十五军残余部队（当时由副军长张文心指挥）直接传达这些指示，只好就近告诉了我。是日黄昏时，即开始突围，黄维派来卫士指定我乘坐第三号战车，紧接在黄维、胡璉所坐战车之后行动。行至玉皇庙渡河时，黄、胡所坐的战车将浮桥压坏，我所坐的战车不能通过。这正合了我的心意：与其到南京去送死，倒不如呆在这里被俘。当即和两个随从卫士下了战车，走到玉皇庙门口，坐待解放军的到来。约经四小时后，即有解放军第一纵队的搜索部队到达，叫我和两个随从卫士去到公路上集合，我们缴出了一支左轮手枪和两支卡宾枪，其余的东西都被允许保留自用。随后，我们被带到一个小村庄里休息。第二天（十六日），各军各师被俘的官兵约有三百多名都来了，解放军的王连长派十多名战士把我们送

到另一个较大的村庄，由某政委接待，并向我们讲述了解放军的优待俘虏的政策。讲完后，开始点名，要每人报出自己的姓名、年龄、籍贯和军职。当点到我的时候，我如实地报称：“吴绍周，四十五岁，贵州天柱县人，八十五军军长。”点名后，政委把我带到一间比较好的房子里休息，他问我：“八十五军还有一些部队吗？现在这些部队到哪里去了？”我说：“廖运周率两个团起义，黄子华带五个团及军直属部队一起投降，剩下的军医院、卫生队和担架营都留在原地，没有突围。”他说：“这样做法是很好的。”次日（十七日），黄维、杨伯涛、覃道善和一些师长、团长等都一起被送来了。

从此，我们都在党的宽待和教育之下，走上了新生的道路。

（民革湖南省委员会供稿）

淮海战役中蒋军第八十五军 二十三师的投诚

黄子华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蒋军第二十三师参加了淮海战役。在这一战役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了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当时担任二十三师师长。现就回忆所及，将二十三师作战和投诚经过情况概述于后。

加入十二兵团战斗序列和行军经过

二十三师原属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建制，由第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三个团、一个炮兵营、一个辎重营以及特务连、工兵连、通讯连、搜索连、卫生大队等编成。一九四八年秋，二十三师驻在广水、确山一带整补，并担任平汉铁路的护路任务。同年十月，蒋介石采用所谓“兵团战术”，二十三师奉命将护路任务交替后，随同八十五军列入十二兵团（黄维兵团）战斗序列，开往淮海地区作战。

十月下旬，二十三师在广水集中完毕，乘火车至明港。这时，兵团后卫通过明港已一星期了。二十三师对敌情、任务还不明了，盲目地循着兵团行军路线，在本军的先头采取强行军的速度，经过正阳、新蔡、阜阳等地向皖北前进，沿途曾遇到解放军游击部队，发生过多次小战斗。因上令催促甚急，师部决定采取一面掩

护、一面通过的方法，以期迅速赶上兵团主力。二十三师官兵对这次列入十二兵团多不愿意，仓猝开拔，动员准备，完全没有，加以雨雪泥泞的长途强行军，因而士气非常低落。行至阜阳附近，忽接到军部传达的命令，要我师暂在现地停止待命。一时传闻八十五军将要返回原防，官兵大为兴奋。停了半天，吴绍周赶到，对我说：“兵团电令我军速进，严限如期赶到，违则以军法从事。”我师不敢违抗，官兵们垂头丧气地继续前进，于十一月二十日前后到达蒙城附近，赶上兵团。吴绍周乘吉普车超过部队先头，去兵团报到。黄昏时，吴回到部队，指示：兵团在蒙城稍事整理和补给后，现已渡过涡河，向宿县方向前进；二十三师暂在蒙城停止，赶快补给，等候一百一十师到达（该师在我师后，相距约二天行程）。次晨，军部转来兵团部命令要旨，大意谓：兵团与解放军战斗在浍河以北，八十五军迅速前进。我师渡过涡河后约十五至二十里宿营。二十一日，推进到南平集，担任该地及浍河沿线对西北的警戒和对孙疃方面的侦察。当晚，兵团向东南转移。次晨，我派小部队到河北岸侦察，才发觉兵团主力——十八军的大部原在浍河北岸的业已开始撤退。我师就在浍河南岸阻挡解放军，掩护兵团主力转移。

在包围圈里挣扎

十一月二十二日兵团主力转移后，解放军将我派往北岸的小部驱逐回南岸，乘势步步逼近。我师部队与解放军隔河作战，相持至次日（二十三日）中午。据对孙疃方面侦察的部队报称：该方面解放军大部向南运动。同时，浍河沿线左翼搜索部队报称，在我左翼的解放军南进部队已超过我左侧，仍在不断南进中。根据上述情况判断，我师如果退却迟延，就有受到包围的危险。当

即作出处置：先将控制部队转移到公路以东、浍河以南的三角地带，将距南平集约五至七里的几个村庄占领，布成预备阵地，与军部所在地形成纵深，为第一线撤退时作好准备。这天黄昏前，布置完毕，即令南平集和沿河线的部队撤退。解放军乘势渡河，追到我新阵地，猛力冲击，战斗颇为激烈，一度冲入我占领的村庄内，发生肉搏战。经过反复冲突，才将阵地稳定。这晚，每个村庄都有战斗，时紧时松。军部在我师后面，也受到侧击，战斗一度激烈。二十四日天明时，来了几架飞机，在阵地上空绕了几个圈子，解放军才稍稍放松攻击，但仍在原地对抗。

在南平集撤退的时候，蒙宿公路西边的解放军仍不断向南推进，包围的形势已将告成，并步步逼近。我们在边掩护边撤退的途中，发现公路上有战车活动，并有步兵约百人掩护。起初，不明这战车是哪方面的，他们并未和我们联络；后来，见战车在公路西侧活动时，解放军用战防枪向战车射击，有一辆战车的驾驶员丢下战车跑了，才晓得这是兵团撤退中派出来游巡的。

不久，解放军连续猛攻，形势危急，我师很难支持。但因上面严令将已占领的村庄作为阵地，不能动摇，我们只好勉强固守。直到下午四时许，得到指示：二十三师部队向双堆集撤退。军直属部队和二十三师部队抵达双堆集附近时已近黄昏，兵团主力十八军已在该处布置好了阵地和驻地，地小人多，拥挤不堪，当我师赶到时，已无隙地可以插足了。我师官兵只好蹲在露天里，情绪很坏。后来兵团指示：二十三师通过双堆集宿营，并担任兵团外围警戒。我师占领了一个叫小王庄的小村庄，赶急进行了阵地布置。这时，部队在连日强行军和经过多次战斗之后，官兵已很疲累，加以地形和敌情都搞不清楚，情势相当困难；解放军则仍通宵达旦，进击不休。我师只好勉强抵抗，并趁战斗间歇中就现

地增筑工事。这样，二十三师就完全处于兵团主力的外围阵地的最前线，并夹在主力的中间。

内部矛盾日益尖锐

在一百一十师起义以后，十二兵团在解放军强大压力下，调整态势，对八十五军的歧视更为露骨。二十三师部队被分割使用，六十九团调去填充其他部队的空隙，另调新兵一团（代团长何企）归我指挥。原来三个团在一起的时间久，团结得比较好；现在被分割使用，调来的新兵战斗力不强，官兵都有意见。但在战斗中，我仍坚持服从命令，经向官兵开导，全照命令执行。以后的困难就越来越多，阵地形成重迭，上下失了联络：师和军部之间的电话不能直接通达，必须经过紧接在我师后面的十八军转接；递送文件也要经过十八军岗哨，得到准许才能通过；官兵进入十八军阵地，甚至要经过搜查；我师的对空联络电台被禁止使用，连无线电收音机也被封闭，不准使用；对空联络信号更换了，也不发给我师部，以致蒋军飞机向我阵地投下炸弹，并用机枪扫射，六十七团副团长陈乃光被炸，重伤而死；我们在当时情况下，只得将阵亡上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一辑杨伯涛所写《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记》曾有阵亡一团长的记载，当即指此事，但将日期、地点记错了）。紧接我师后面有一制高点，由十八军的一个加强连占领，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据说是作为炮兵观察所，并用以支援我师，实际是对我师实行监视。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被调驻十八军军部，表面上说是便于协同指挥，实际也是别有用心地加以监视。

在内部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我们的心情虽极端愤懑，但仍尽量忍受，勉力撑持。这时，就阵地情况说，在我阵地正面的解放军依据村庄外围部署，攻守自如；我部则处于平地，无地形

可以利用，完全被动。我们白天依赖飞机掩护才能活动，一到晚上，就害怕解放军夜袭，显得特别紧张，只得组成小部队到解放军阵地游巡和突袭，以阻碍解放军进攻。解放军窥破了我们的企图和弱点，起初，则设伏狙击，使我们不敢深入；以后，摸清了我们的规律，则把路敞开，不仅对我游巡部队不加阻拦，反而在必经道路的要点上，放置一堆一堆的面饼、白馍和一些信件。信的内容大意说：朋友们，你们肚饥吗？面饼、白馍尝一点吧；另一封信请带交你们的上级。这种情况在官兵中互相传告，战斗情绪更加低落，但每晚仍有小战斗。十四军方面，常在晚间失了阵地。第二天，兵团部就要我师抽调部队去替他们夺回阵地，朝出暮归，官兵没有休息的机会，弄得怨声载道。村庄阵地的争夺战是很激烈的，一墙一沟的争夺，都要付出很大的伤亡。白天偶然夺回一个阵地，往往到夜晚又失掉了。伤病官兵日见增多，医疗设备极端缺乏，尤其困难的是无地收容。起初，尚利用掩蔽部，到后来，就只好将伤病官兵放置在阵地附近的寒冬露天下，兵团全不过问。同时，从解放军方面释放回来的士兵却娓娓叙述解放军怎样优待俘虏，治伤医病。两相对比，官兵普遍地动摇，人人发出究竟为谁拚命的疑问。

在蒋军中，友军之间的协作是很差的，甚至是谈不到的。例如：在我阵地右前方有一个村庄，名叫马庄，解放军利用村舍墙壁和村沟作据点，正对着十八军阵地正面，威胁很大。为了解除这一威胁，兵团部决定集中步、炮、空各种火力来一次联合进攻，将该村庄摧毁。如果从全局着想，本可在攻克马庄之后，趁势转向我师阵地正面的解放军迂回，解除我师阵地的威胁；但友军只顾自己的一时利益，并不全面考虑问题。部署一次这样规模的进攻，是不容易的；进攻之后，不仅收不到应有的效果，反而使官

兵更加丧失信心，产生各人自找出路的想法。又如：与我师对阵的解放军利用夜间进行“对壕作业”，挖掘纵深壕沟，逐渐逼近我部，使我阵地侧翼受到极大的威胁。我们一再请兵团部派战车掩护我部出击，破坏解放军的对壕，起初总不允许，直到我说“这种威胁如不能解除，就逼得我只有缴械了”，兵团部才勉强出动了三辆战车，绕了几转就回去了；再请再也不来了。后来，我部奋勇冲击，将对壕夺取了一段，并俘获了解放军百余名。因为没有战车配合，也就不能继续推进，扩大战果。过了两晚，归我指挥的新兵团代团长何企在我左侧的一个村庄里，因与解放军的对壕逼近，被解放军一涌而上，将他捉去了。

这时，解放军对我们的包围越来越逼紧，而二十三师与十二兵团部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我们逐渐意识到不能再为腐朽透顶的蒋政权和业已陷于死亡边缘的蒋军送命，而必须另找出路了。

下定决心，弃暗投明

我自率部队加入十二兵团战斗序列，参加淮海战役，迄至决定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这中间曾经过一段复杂激烈的思想斗争。在接受作战任务时，我虽有反感，但基于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思想，还是认真执行命令，没有任何动摇；对行军计划和作战部署虽有怀疑，特别是对兵团部的会议始终没有机会参加，甚为不满，但仍极力容忍，除了想在打完仗之后，另谋出路外，并无其他打算。进入双堆集后，因战况日见恶劣，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加以一百一十师起义的影响，我的思想才开始动荡，自我斗争逐步激烈。当时，二十三师乃至八十五军在兵团中是受歧视和排挤的。事实很明显：如对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以协同指挥为借口，将

他调驻十八军军部，使之脱离部队；对二十三师部队的分割使用；一切通讯工具的使用受到无理限制和上下联系都要经过十八军的机构；把二十三师部队摆在外围，夹在十八军中间，加以监视等等情况，已如上述。特别使官兵灰心并且怨愤的是粮食补给问题。在兵团被解放军紧紧包围中，粮弹日见短缺，粮食问题尤其严重，完全依靠空投接济。起初，没有粮食，还可宰杀牲口，勉强充饥；以后，罗掘俱穷，逐渐陷于绝境。同时，燃料也大成问题。我们部队住在一个很小的庄子上，由于怕炮弹着火，曾将民房上的茅草拆下，连同家具，用以构筑工事；后来，就只好用作烧饭的柴火。这些都用尽时，就把坟墓内的棺材挖出来烧。这时，唯一的希望只有仰望天空，等候空投接济了。每天，蒋军飞机空投的面粉、大饼和各种罐头，数量也不算少，兵团部指定由十八军捡集，二十三师就得不到。由于空投不准确，偶然落在我阵地的物资，我师官兵为饥寒所迫，前往捡取，曾经引起互相争夺，以致与友军发生械斗，双方死伤达数十人。兵团部见事态扩大，派人来调解，不但没有合理解决，反说二十三师不遵守命令。当时，二十三师的官兵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许多士兵愤慨地说：“与其饿死，不如打死的痛快！”还有高一级的官长愤怒到这样的地步，不惜说出：“我们再来一次安顺事件”（指一九三五年红军北上抗日时，部队在追击红军途中，经过安顺时，与犹国材部发生冲突，双方死伤三四百人）。据周卓铭（二十三师副师长）说：在随兵团最后突围时，看见十八军阵地附近到处堆集着遗弃的大米和面粉；当别的部队处于极度饥饿时，十八军官兵甚至有罐头出卖。对这种情况，我和全体官兵一样，异常愤慨。当时，我的脑子里交织着种种复杂矛盾的想法：一方面认为部队正处于激烈的战斗中，应该不计较这些小事；一方面又想到现在正当用兵之

时，对我们尚且如此，就算侥幸击退了解放军，我们也是没有前途的；何况自己已经意识到，战事是注定要失败的，绝对没有侥幸获胜的希望，我们究竟为什么作战，为谁拚命？这样困守待毙，未免太蠢。特别使我深受感动的是：行军所经过的解放区，田地都耕种得很好，街道相当整洁，社会秩序安定，完全不是如蒋介石所宣传的那样。而蒋军经过时，情况就完全相反：搞得庐舍荡然，鸡犬不留，部队每到一所村庄，要想找一个农民探问情况或者带路都是不易找到的，留下来的只是少数老年妇女，她们绝不会把解放军的情况告诉我们，要想从她们得到一点有用的消息是绝不可能的。据了解，当解放军一到，群众就欢欢喜喜地回家，与解放军相处若亲人，自动供应粮食用物，真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而他们对蒋军则视同仇人，自动地“坚壁清野”。人民向背，如此昭然，“得道者昌，失道者亡”，胜败之数，早已决定了。我想到自己总是中国人，由当兵到当师长，几十年的军队生活，究竟替人民做了些什么？我为什么还在这些琐碎事上打圈子，来与人民为敌到底呢？思想斗争逐步激烈，也逐步深入，涉及到根本问题上，思想上才有所觉悟，开始考虑到今后的出路问题。

在我的思想斗争过程中，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对我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友军”对我们排挤倾轧，而解放军却向我们热情地招手。解放军的政治攻势越来越频繁有力。当部队缺粮时，解放军竟将煮得热腾腾的稀粥送到我前沿阵地上来。我士兵吃后，有人将碗钵摔破，解放军却只笑一笑走开了。这如何不使人感动！对阵的解放军用斗大的字贴在门板上做成标语，树立起来，上面写着：“优待俘虏，不杀不辱”，“欢迎起义投诚”等。这些标语都很能打动人心，对我也不无影响。

在一百一十师起义后，我思想上虽已动摇，但还有顾虑，主

要是怕解放军追究既往。每次接到劝降的信，我都不愿看而将信撕碎。有一次，接到廖运周（一百一十师师长）来信说：“起义是光荣的。解放军不咎既往。”我印证被俘去放回来的士兵的话，觉得廖信所说是有些可信之处。同时想到：共产党要革命胜利，决不会失信于人。但仔细阅看来信，发现不象廖的亲笔，又盖了私章（原来通信不盖私章），又引起了我的怀疑。另一次，接到被俘去的代团长何企的来信。何企是二十三师的老人，与中级以上的军官都是旧同事，感情很好。信是亲笔，内容多能打中我的心思，他着重提到不咎既往一点，很能解除我的顾虑。这信送到时，已被周卓铭他们先拆看了。当周将信交我时，和我耳语：“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一百一十师能起义，为什么我们不能？”我仍未置可否，只说：“不要多说，恐被人听见。”同时，考虑到部属的态度问题，我虽深知主要军官的思想倾向，并且他们大都早已有所表示，但仍不能不格外慎重。这时，我召集了团以上军官的紧急会议，将何企来信给大家看，并征询意见。周卓铭首先表示态度。全体一致决定，以我的意见为主，决不反对；并先派人去解放军找廖运周了解情况，再作研究。派去的副官杨耀华回来说：“解放军确实很好，热情诚恳。但解放军方面以我去找廖师，行动上不方便，已派人同来。”我与来人谈了话，随即释放一批俘来的解放军随同来人回去，并约定次日再谈。当晚，仍各自戒备，并有小的战斗。

次日，解放军送来一信，要我派负责代表去接洽。经研究，派了六十七团团长杨堂正随带另一批俘虏去解放军部洽谈，杨堂正午后回来，说解放军态度诚恳，无论在哪方面都看不出半点虚假，并派了几位负责人员同来。我与解放军的同志见面后，彼此都能推诚谈话。至是，我们一致肯定了投诚（当时是作为起义的）。我提出四点要求：一、我们有很多伤病官兵不能同走，要请解放

军设法安置；二、我们的后方在武汉，请暂勿将消息宣布；三、起义后，官兵的去留要根据各人的志愿；四、在行动前，我部人员、武器和解放军进入我阵地时的安全，由我负责。这些要求，得到了解放军方面的圆满答复，我部伤病官兵由解放军接收，其余三点也都同意，并确定了行动的时间。我婉谢了要我先到解放军去以策安全的邀请。我们迅即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密令后方将各留守人员和眷属立即给资遣散；二、即刻将与阵地后方联系的通讯设施破坏，并派可靠人员率部队进行警戒；三、对阵地重行配备；四、赶紧接通和解放军联系的电话；五、对少数不可靠的军官进行监视。

一切准备就绪，当晚（十二月九日或十日，日期记不确切了）九时半开始行动，在十一时前，我部完全脱离阵地。在行动前约一小时，我想起吴绍周尚留在十八军军部，在二十三师继一百一十师起义后，恐遭迫害，应设法使他出来，一同过去。经与周卓铭商量，周主张由我写一报告，由他亲自送去。报告大意说：解放军攻击紧急，难于支持，请增援（已知道无援兵可派），详情由周卓铭面陈。我同意这样办。当叮嘱周坚决请吴回来，并约定转来信号，打算待吴回后再向他说明一切；并与周约定，必须在部队行动前返回。但周去后，未能如时回来，而部队迫不及待，只好先行动了。一九五二年，我在长沙会见周卓铭谈及，始知周去见吴时，被十八军步哨阻止，经过一再交涉，仍不能通过。看表，时间已过，只好转回来。回到师部时，师里的人都走光了，已由解放军接防，只有再转去。经过一再交涉，才通过步哨见到吴绍周。因当时情况已有变化，接吴出来已无用了，便住在十八军，以后又移住八十五军，与尚留在阵地后方的人员住在一起，随兵团突围时被俘。

这次参加投诚的部队计有：二十三师直属部队和所属的六十七团、六十八团、六十九团的一部、二百一十六师六百一十八团残部，以及军直属部队辎重团、卫生大队各一部分，共约近一万人。大家从此脱离了黑暗，走上了光明大道。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李弥兵团被歼记

黄 健

李弥原是在何应钦卵翼下起家的，自始至终备受陈诚的歧视。李的基本部队是第八军，原系甲种军编制，整编时陈诚把他卡成乙种整编师，只给他两个旅的番号。淮海战役前，第八军驻守胶东半岛的潍县、昌邑、沙河、烟台一带，李利用军需做生意，用挣来的钱，自己养了六个独立团，比起甲种师还多三个团。蒋军吃缺成风，李弥却掏腰包养兵，以此受到蒋介石的赏识。据袁剑飞（第八军参谋长）说：李弥在临朐之战获得战果后，蒋介石召见他，李报告战斗经过，在兵力部署上，多了几个团，经蒋介石追问，李说明原委，蒋介石当面嘉许，并亲书手谕给他：“只要是对国家民族尽责，尽可专断行事。”蒋介石对他的这些牢笼手段，竟使李弥受宠若惊，从此甘为鹰犬，与人民为敌到底。一九四九年十月，李弥在宣威和我谈话，曾声泪俱下地对我说道：“今天我还想做什么官，要什么钱，只是不忍断此一线（指他和蒋介石的关系）。”其后，他在昆明本已接受了卢汉的提议，在和平方案上签了字，结果仍然背信逃去，与蒋介石共命运，同终始。

我和李弥原不相识，经陆大同期同学袁剑飞介绍，我认为李的作风还合得来，因而答应了到他的部队里去工作。李弥向国防部第三厅调我（当时我任第五科科长，主管战法研究），未得同意。一九四八年九月，李由烟台赴徐州，过南京时，我已调第四厅任

第四处副处长，协办海陆空军运业务，他征得厅长杨业孔的同意，调我到第八军任副参谋长，其后，递任师参谋长、团长；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调任第十三编练部高级参谋。兹就李弥兵团在淮海战役被歼及其续组的编练部（即预备兵团）窜到云南后被歼经过，写述出来，以供参考。

一、李弥兵团的组成和参加淮海战役

李弥第十三兵团是蒋介石在一九四八年下半年，由于败讯频传，各战略要区的重点防御体系，已陷于肢解状态，转而采取内线作战，深感兵力不足，爰在增强兵团编组的同时，令李弥以第八军为基干，扩编而成的；计辖第八军（李弥自兼军长，副军长周开成）、第九军（军长黄淑）、第三十九军（军长王伯勋）三个军。李弥兵团编成后，转用于徐州方面，使与邱清泉、黄伯韬、孙元良等几个主力兵团同在该方面作支撑南京门户的努力。

李弥所辖的这几个军，在仓促扩编时，由于自己养了六个独立团，又以久驻胶东，与当地封建势力联系密切（潍县县长张某后竟随军南来，在兵团司令部任秘书），易于征募新兵，因而很快就编组完成。但兵团直属的特种兵部队，仍只编成了一个通讯兵营，其它骑炮工辎等直属部队，概未编组；各军都只有一个原建制的师，另两个师概系新编的；而各级指挥官及主要幕僚人员，绝大部分均系新提升的，在完成编组任务后，都未经过作战的考验；所以李弥在兵力运用上，既怕输光老本，又怕在和邱、黄等嫡系部队并肩作战时丢脸。因此，遇有什么重要任务，只好经常派第八军或四十二师去担任。因为他自己就是由四十二师（原为荣誉第一师）师长、第八军军长递升现职的；同时四十二师也是原建制师中较好的一个师。李弥兵团的外强中干，于此可见一斑。

李弥兵团的主力（第八、九两个军），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日以前在徐州、蚌埠间集结完毕。兵团司令部与第八军司令部同驻蚌埠东郊。当时李弥仍自兼第八军军长，其他如副军长周开成、军参谋长袁剑飞，都在师长、团长原任上，要在一两月后才能来军司令部到职。因而这一时期，军部和兵团司令部是实行联合办公的。

兵团所属的第三十九军在昌黎、秦皇岛一带地区，因防务未交卸，李弥多次电催王伯勋率部南下，迄津浦南段被截断时，仍未运到战场。徐州“剿总”乃将由安阳空运徐州的一一五军拨归李弥兵团指挥，以配足三个军。该军系三十九师司元恺部扩编而成，员额装备均未足额，比第八、九军的作战能力更差。

淮海战役揭幕前，由于济南、郑州的相继被解放，张克侠、何基沣的战场起义，使得徐州“剿总”的重点防御体系分崩离析，岌岌可危。

十月中旬，黄伯韬兵团在运河以东新安镇附近地区，邱清泉兵团在归德附近，李弥和孙元良两兵团在徐州东西附近，四个兵团概沿陇海线东段一线摆开，尤其是黄、邱两兵团处在外翼的分离状态，其在海州的四十四军，更不能起到什么作用。就战略配置的态势说，是极为不利的。早在九月下旬，二野正在继续东进，三野亦开始南下。到十月中旬，综合各种侦察情况，证实二野三野正在采取向徐州合力进击的行动。这一基本情况对内线作战的徐州“剿总”来说，更要求迅速集中主力，乘解放军尚在调兵遣将之际，求得各个击破的机会。李弥兵团的军师长和主要幕僚人员，在十月份每次会议上都以各个击破作为讨论的主题。只是随着时间的过去，从这个共同希望的消失，逐渐过渡到相互的耽心而已。到十月底以后，对黄伯韬兵团的耽心就更大了，因为它虽

是拥有四个军的大兵团，可是隔着一道运河，跟邱兵团的处境，是截然不同的。

二、防守徐州

李弥兵团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下旬奉命由徐州以南开赴徐州西北的丰县、沛县地区，协同邱兵团抗拒二野东进，寻求对二野——即使仅是二野的一部的各个击破的机会。刚到达目的地，就有张克侠、何基沣的起义。徐州“剿总”为了稳定局面，又把李弥兵团龟缩回来，命在徐州东北沿不老河之线布防。十月九日，李弥以第九军主力在指定地区布防，兵团主力置于徐州东郊大营房附近地区。十月中旬，又奉命将防线沿不老河南岸延伸到八义集以东附近，支持黄伯韬兵团接应海州四十四军的西撤，兵团及第八军司令部同时由大营房移驻八义集。十一月二日，李弥到徐州“剿总”开会，到十一月五日，才回到八义集，黄伯韬同到兵团司令部小憩。

这时，李弥兵团已决定撤退到徐州。黄伯韬骄傲自满地说：“你们先走，我打个歼灭仗就来。”李弥也笑着说：“好！我在徐州为你祝捷。”黄伯韬的车子刚一开走，李弥就说：“莫要等出祸事来。”周开成副军长似乎有点气愤，接着说：“他这样骄傲，活该！”李弥解释似的边走边说：“倒不是他自己要等，他有掩护四十四军从海州向西撤的任务。这实在没有必要。四十四军从连云港海运撤退，比长途侧敌（指三野）西撤还要安全些。这样撤，就苦了黄伯韬。现在我们赶快开回徐州吧。”

十一月九日，李弥同我到徐州东南郊视察防守徐州的防御阵地，并召集第八军部分连营团长就地研究对既设工事的利用和各要点的兵力配置。当晚，他要我起草兵团的徐州防御计划。其要

点如次：

一、方针

兵团以决战的目的，即在大庙、贾家湾一带占领阵地，利用既设工事，构成据点群，充分发挥火力，在阵地前予解放军以重大杀伤后，用大部队反冲锋，在阵地内歼灭解放军。

二、部署及指导要领

①第八军（欠一个师）右与七十二军余锦沅部联系，在大庙南侧某高地亘大庙东北地区占领阵地，并以大庙为核心，构成据点群的纵深配备，用火力及反冲锋，消灭解放军。

②第九军（欠一个师）右与第八军联系，沿不老河迄贾家湾西北附近地区（左与一一五军司元恺部联系）占领阵地，利用既设工事，组织纵深火力，用火力及反冲锋，消灭解放军。

③炮兵队在大营房西南地区占领阵地，准备以主火力支援第八军，以一部火力支援第九军之战斗。

④战车队适时在大营房西侧占领待机位置，准备协同第八军及兵团预备队实施反冲锋。

⑤第八、九两军各以一个师为兵团预备队，分别控制于大庙西南各附近，适时准备以大部队——每次约一个团，向突入阵地纵深之解放军，实施强有力的反冲锋，彻底消灭解放军。

⑥步、战、炮各时期的协同动作，另行拟订之。

十一月十一日，军部参谋处第一课课长田兴翔将防御计划送交徐州“剿总”的同时，携回增援黄伯韬兵团的命令。关于徐州防御准备工作，就无形搁置了。

十一月十一日晚，李弥在师长以上会议中决定增援黄伯韬兵团的计划。其要点如次：

①第四十二师（配属军炮兵营）右与邱清泉兵团联系，在徐

庄北附近迄白门里之线展开，沿陇海路向火神庙方向攻击前进。战车队直接协同该师的攻击战斗。

②第九军（欠一个师）右与四十二师联系，在陇海路北侧迄不老河南岸胡庄之线展开，向马山东北方向攻击前进。

③第九军的一个师，沿不老河南岸布防，掩护进攻部队的左侧背。

④配属的炮兵团，在大庙东北地区占领阵地，以主火力支援四十二师的进攻，适时以一部火力支援第九军方面的战斗。

⑤第八军主力，置于大庙、大营房地区，准备以有力一部适时加入四十二师方面的进攻战斗。

进攻部队于十二日拂晓开始攻击，战斗很激烈，但进展很慢。十四日，我和代军长周开成到四十二师指挥所，就火神庙附近战斗进展的困难情况，研究增援黄伯韬兵团的战术问题，认为沿着铁路附近的狭正面平行推进，左翼为不老河所限制，火力、兵力都没有占显著的优势，确难求得较快的进展；应从邱兵团方面，采用大军迂回，向双沟方向进攻，才可能取得迅速的发展。当晚，回到兵团司令部，向李弥和参谋长吴家钰提出。李弥表示同意，却说：“邱清泉兵团方面，进展也很困难。”李弥究竟向徐州“剿总”提出与否，未明白表示。我以系友军方面的问题，也就不再谈了。

以后，白天我们继续攻击，晚上三野的堵击部队不断夜袭。激烈的战斗，连续达一个星期，前进不过十六公里。各级指挥官和幕僚人员都感到精疲力竭，束手无策，而徐州“剿总”参谋处不断催问战报，我们亦徒唤奈何。

十一月十五日，我正在为四十二师的攻击进展缓慢，不能及时解救碾庄圩的围困而沉闷时，军部汽车连长冯子仙来找我，说军里家眷搭的那列火车，开到符离集，被解放军截住了。我听了这

一消息，感到目前情况，不仅是黄伯韬兵团被围攻的问题，而是解放军已向徐州合围了。一幅大包围的阴影，马上出现在脑海之中。冯子仙却接着说：“我要请假去找妻子的下落。”我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由军里派人去一起找好了。”他说：“我早就不想干了，现在妻儿下落不明，心乱如麻，报告军长后，准不准假，我都要走了。”他以小同乡关系，向我说的这番心里话，在军心动摇上，是有代表性的。这个消息迅速传播全军，军心更加涣散，全军士兵潜逃的竟达百余人，整个兵团共潜逃了两百多人，多数是向北跑的。为了防止开小差，各级指挥官逐级进行监督。最苦恼的还是连排长，人跑多了固然要追究责任，带走了武器，更交不了差。一七〇师五〇九团的一个排长就为着去追携械潜逃的班长而没有再回来。兵团的各级司令部，在黄伯韬兵团被歼后，就在考虑着大撤退的问题，并为着能否安全撤过淮河，以及在方向和路线的选择上大伤脑筋，军参谋处第一课课长田兴翔诉苦似地说：“要避实击虚，还要选能通汽车的道路，这就困难了。”李弥兵团受到津浦南段被截断的震撼，比听到黄伯韬兵团被歼的消息，还更为惊慌恐惧。李弥自己对这一连串的坏消息，初虽保持着沉默，可是在看到黄伯韬兵团的伤员被当地老百姓从碾庄方面抬送过来的时候，却愀然说道：“这一手很恼火，比打过来的炮弹还厉害！”

十一月三十日傍晚，飞机场连续响起了震耳的爆炸声，徐州市区内也有几处接着响了起来。一七〇师按着规定的顺序，加入军的行进序列，向萧县方向前进。在夜行军中，我发现师里规定的夜间识别用的连络记号，竟没人使用；停下车来，往四围一看，队伍象一棚棚的鸭子似的被赶着向前乱窜。我默然上车，让司机和别的汽车一样，不断地紧按着喇叭，钻空寻隙，相互超车前进。

三、逃窜到萧、永附近地区

经过两昼夜的急行军，十二月二日十时许，我和杨绪钊师长到袁圩会见李弥。他对我们说：“四十二师在萧县附近受到二野强大兵力的压迫，发生激烈战斗。永城不能去了，行进方向要改变，部队暂就地停止休息，候命行动。”三日晨，续向永城东南前进。午间，一七〇师到达前后魏楼附近，军部又传令停止。当晚，一七〇师就在詹阁、王楼一带占领阵地。这时，我接到军参谋长袁剑飞电话通知：一、我们暂在占领的阵地线布置防御，掩护邱清泉兵团进攻部队的左侧背。一七〇师右与四十二师连系，左翼是第九军，应与保持密切联系。你师应以一团控制王白楼东北村庄，构成外围据点，而确保之。二、随着邱兵团向南攻击的进展，应准备采取梯次掩护，等他打开增援黄维兵团的通路，我们就全力去解围。接着他还谈到：“邱兵团的辎重车辆，丢了很多，汽油发生问题，汽车开动有困难。”我说：“行进方向一变再变，汽车路也成问题，汽车开到那里算那里吧。”

四日起，阵地前方常发生小接触，邱兵团向南攻击进展很慢，我们仍在原位置掩护。六日晚，兵团司令部通知：“一律轻装，准备突击行动，候命出发。”七日午间，还没有得到行动的命令，我到兵团司令部（驻李石林）去联系，李弥说，“要等空投粮弹。”我不禁骇异地说道：“我曾在第四厅主办军运业务，可以肯定全部空运载量也没有可能担负这几个兵团的粮弹补给。现在每人的炒米袋里还多少有点米，再延宕下去，都会吃光了，还是快走为上。”参谋长吴家钰说：“我们还要解黄维兵团的围。邱兵团正准备继续向南攻击，我们走不成了。”我说：“据第九军传说，孙元良兵团走了，是不是事实？”李弥闷声闷气地说道：“孙元良从陈官庄开会回

去，没等命令，就拉着跑了。据说也只跑出去一部分，还要我们准备接防呢。”我绕到军司令部所在地——陈庄，找袁剑飞谈起走的问题，他说：“杜老总（指杜聿明）要听邱清泉的。汽油没投下来，邱清泉怎么会肯走。”我说：“单投汽油，还可能解决，要夹着粮弹一起来，那就无能为力了。”他悄声说道：“这就是邱兵团的‘高明’，单提出汽油问题，就会失格，向‘老头子’（指蒋介石）要空投粮弹，另向联勤总部要汽油，就‘光荡’了。”（袁剑飞是徐州“剿总”参谋长舒适存的女婿，且因同学关系，常到邱兵团司令部参谋处去闲聊，所以了解邱兵团对空投的这一要求。）

四、兵团被困在包围圈中

到十二月十日，李弥兵团的整个防线前，都有解放军的大部队在逐渐迫近。邱清泉兵团连日攻击，打不开增援黄维兵团的通路。空投粮弹，还刚开始，数量很小。部队随带的粮食已经吃光。既然被围了，走不成，总要站稳脚，守下去。李弥兵团就在十日调整了防线上的兵力配备，加强工事，并把老百姓的门板都拆用了，着手掩蔽部和交通壕的构筑。一七〇师把辎重兵营增加于五〇九团，以加强该方面兵力配备。师指挥所移驻西詹阁。新的部署初步完成，解放军就在当晚发动了攻势，并在此起彼落地进行火线喊话。战斗到十一日午间，辎重兵营的正面已被突破，约一个排的解放军，蹑着辎重兵营的溃兵向阵地纵深继续突入；师指挥所核心工事的守兵，不敢超越射击，一时噪声大起。我喝令辎重兵营溃退下来的士兵就地卧倒后，核心工事才守住下来；经师警卫连和搜索连连长各率一个排，向突入之解放军两侧逆袭，才恢复了被突破的阵地。下午三时许，又据五一〇团伤员报告：该团守备王白楼东北的外围据点，昨晚激战彻夜，姚团长重伤后，

已送李石林兵团医院。拂晓时，发生混战，伤亡过半，被迫撤退后，魏副团长尚在继续收容整顿中。我和军参谋长袁剑飞电话联系，还得知五〇九团杨团长没有把部队掌握好，一响枪就发生溃乱，以作战不力，被解到兵团司令部，李弥很生气，要枪毙他。四十二师守备的青龙集外围据点，在十一日拂晓前被迫放弃，师长石建中在观察战况时，被迫击炮弹碎片击伤。解放军在进攻青龙集时，投掷的传单中有讽刺我们等空投粮弹的话，说是“画饼充饥”。这种宣传真是又快又准，可谓打中要害。

十二月十三日，发现阵地前沿，解放军构筑的防战车壕逐日增加了，靠近李弥兵团阵地前，一直增加到五道。一七〇师正面，虽没有再发生过重大的战斗，可是在解放军的政治攻势下，比之在战斗中，我们更感到自己的脆弱，连招架也招架不起了。十日前后那几天，在围攻开始时，解放军即广泛采用喊话、广播、送传单等方法来瓦解军心。十四日这天，在一七〇师阵地前沿，丢了很多大饼、馒头等食物，还喊着：“出来捡的不打枪。”十五日，不但整个兵团的阵地前沿都发生了解放军丢食物和我们士兵捡食物的现象；而且有的士兵，跑出去捡食物，就一气跑过去了。这使得李弥最恼火，连日打电话，问情况，下命令，发指示，忙个不停。从加强警戒，缩短换班时间，把警戒哨都改成复哨，最后把第一线警戒哨，从地面挪到树上，筑成鸟巢工事，虽是煞费苦心，但终归无济于事，捡食物的人还是照常捡食物，逃奔解放军的人亦有增无减，仅仅由白天活动改为晚上活动而已。

从十二月十日解放军进行压缩包围圈的攻击战以后，在这一星期时间中，恐惧情绪弥漫整个部队，突出表现在加强工事方面：师以下各级指挥所，都构筑了掩蔽部，交通壕掘深了，还挖了许多避弹坑。这样一来，大大增加了木材的需要。战地房屋的屋顶

都被拆掉了，不是鸟巢工事所用的树木都被砍光了。同时，老百姓的粮食、干菜，都被军队掳掠一空。军队所到的地方，很少看到老百姓的活动。

全兵团的人们，最初还束紧着裤腰带，似信将疑地期待着空投粮食。但自十二月六日开始空投以后，十多天中，每次分配到的粮食，是那么少，因而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偶语纷纷出现。有的说：“投的一天粮，吃不上一碗饭，再等下去，只有饿死！”有的说：“粮投在陈官庄，先尽他们饱，我们只分到剩余的，哪能管饱呢？”

十二月十七日以后，黄维兵团被歼的消息虽不曾通报过，却已不脛而驰，师里以至全兵团的官兵，都感到全军突围的希望已完全幻灭了。李弥处在这种绝境中，却还在痴心妄想，等待空投，企图在获得充足的粮弹之后，突出重围。从空投开始之日，直到大风雪以前，每次在会议上，他都兴奋地说：“等足空投，让大家吃餐饱饭，突出包围圈，就不愁没饭吃了。”

十二月二十日，大风雪一开始，大家冻得发抖，连坟墓中的棺材都被掘出，用来烧火取暖，而腹中饥饿尤其难耐。前此所得到的空投食物，原已无济于事，到了这时更濒于绝望了。经常注意“打气”的李弥，在吃饭问题上，至是也无话可说了。

在大风雪期间（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到同月二十九日），包围圈里，死气沉沉，连长吁短叹的声音也很少听到，好象都在静待着死神的降临似的。而在包围圈外，解放军的政治攻势，则愈益加强。士兵之中固已人心动摇，耳语繁兴。就是团营长级的军官在汇报这些情况时，也不免带着欣羡的心情。李弥煞费心机所寻求的那些对策，到头还是不能挽救全军的瘫痪、解体。

在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的影响下，蒋军的士气愈来愈低落，投

诚的活动愈来愈多。一七〇师五〇八团守卫第一线阵地的某排长，有率该排向解放军投诚的形迹，经庞团长向杨师长密报，当即趁着换防时，把该排调下来，由其它两个排秘密加以监视。四十二师师长石建中负伤后，一二四团伍团长升代师长，与解放军接通了电话，接受了解放军的招降，在作投诚准备中，经人密报李弥，因而被撤职监禁，到突围时才予释放。蒋军的投诚活动，虽然受到上级的严厉压制，可是绝大多数官兵，绝处求生的心情，是遏抑不住的。三三两两地跑出阵地线，投向解放军的事，经常都有发生。一七〇师的辐重兵营，就曾跑掉过半数的人，其它的团也是数以百计地跑掉了。

蒋军愈来愈陷入饥饿的绝境。在大风雪以前，早把当地老百姓的粮食和鸡、猪、蔬菜搜刮一空；大风雪一开始，就宰杀老百姓的牲口和部队的马匹；起初还把皮子剥下，连同砍下的蹄子一起丢了，轮到吃树皮、草根的时候，又把丢掉的皮子和蹄子找回来，烤的烤、煮的煮，大家分着充饥。一天下午，袁剑飞约我到军部吃饭，端来一盘仅有盐味的炒牛肉，据说已是最后留着的一份了。饭后，他对我说：“老头子（指蒋介石）有封电报到兵团部，末尾说‘祝上帝保佑你们’，这电报不会转下来了。现在从上到下，都意识到毫无办法了，大家各自珍重吧！”绝望之情，由此可见。

十二月二十九日，大风雪停止了，天色还是灰暗暗的。包围圈里的蒋军官兵，都在期待着杜聿明对毛主席的招降作最后的抉择。可是，杜、邱、李等为蒋介石效忠到底的冥顽不灵的头脑，这时还没有清醒过来，还企图施放毒气，打开缺口，突围出去。他们一心盼望着晴天的到来，以便继续得到空投粮弹的接济。

一月五日，天已放晴，空投又开始了。当日下午，我的卫士沙立从空投场回来说：“很多人在等空投。飞机临空时，有人躲在

汽车底下，臀部以下露在外边，被空投下来的粮袋，把下半截身子砸成了一块血肉团。军部炮兵营唐营长也带着弟兄们在空投场武装抢粮。”空投场又成了饿虎争食的场所。此时阵地上的守兵，已是奄奄一息，垂首待毙。而当天上午，李弥还从电话中打气说：“你们好好的准备一下，等足空投，让大家吃饱，就好冲出去啦。”晚上，李弥又打电话问我说：“我们想自设一个空投场。如果用全部飞机的三分之一给我们空投，一天可以投多少吨？如果数量仍很少，就专投粮食，不要投弹药了。你看怎么样？”我说：“就原有的空运载量来说，空投几个军的粮食，从来就没有设想过；空投粮食，是靠不住的。早走一天，总比迟走困难会少一些。”

五、兵团被歼经过

一月六日，解放军开始了全线总攻击。在解放军勇猛的冲杀下，一七〇师各团置于第二线的几个营，掩护着前线部队的撤退。这样交互的节节后退，到七日下午，已退到师的作战地域的末端。但在解放军继续攻击下，要想在原位置坚持抵抗是不可能的了，只有一面抵抗，一面后撤。激烈的战斗持续到九日午后，解放军已突破左翼友军一二四师的阵地，守兵纷纷溃退下来。一七〇师指挥所率五〇八团向后撤退，集结的队伍已不足一个营的兵力了。在转移中，左侧受到由四十二师方面突入阵地纵深的解放军的阻击，队伍陷于混乱状态，同时，友邻部队也掺杂着跑了过来。入夜后，师指挥所从混乱中只带着搜索连三十多人向西南方向逃走。晚十一时顷，遇到军部的传达军士，我问军长（指周开成）在那里，他说：“军长和参谋长在夜间行动中，不知道已有解放军同在一路走，卫士叫喊着：‘军长来了，让开！’因而被解放军发现了目标，把他们一起都俘去了。我跑到李石林，兵团部的人都已走了。我

正要走时，第九军的传达也跑到李石林来，据他说：他回军部去的路上，到处都有了解放军，所以又回到兵团部。”李弥兵团就在一月九日夜间溃逃中全部被歼了。

我和一七〇师师长杨绪钊、副师长夏一雷继续窜逃到深夜，碰见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我们打算跟七十四军一道突出去。到杨双楼附近，受到解放军密集火力的阻击，该军几次冲锋，都被打退回来。天明后，我们就一道被俘了。

我被俘后因病没和杨绪钊、夏一雷在一起，被送到夹沟后，我化名王葆元，伪称是军部上尉书记，休养月余，被释放遣归。

六、李弥重组第十三编练部及其被歼经过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八日，我从浦口渡江到下关，遇见兵团留守处处长邹澜清，他告诉我：“炳公（李弥号炳仁）已回来，现在京沪一带，成立第十三编练部（即预备兵团），第八军正在从新编组中。”十九日，邹澜清邀我同到上海去会李弥。李弥谈到自己逃脱的经过和编组部队的情况，说：“我在部队溃逃时，化装成老百姓，从黄口经徐州到济南，托别人代买火车票，自己就坐在月台上，装做哑吧不开腔。后在潍县，搞到一大车面粉，就装做赶大车的；到了青岛，打电报给‘老头子’，乘飞机南返；在奉化见了‘老头子’。可惜逃出来的人太少了，第九军的番号没拿到，三十九军已拨给何老总（何应钦的侄儿何绍周，李弥跟他关系很好），现在编练部只有第八军一个军。军部和四十二师在南京编组，柳副军长（元麟）在那里负责，你去协助他。他过去是侍从室副侍卫长，和我是同期同学。你回南京去找他，军直属部队由你负责编组好了。我打电话给他。”

我在上海住了两天，回到南京，会了柳元麟后，就再以第八

军副参谋长兼任第十三编练部军士教导总队第一团团长。第一团改在南京由我自己编组。我提出第一团作为训练特种兵的团，得到李弥同意。该团和军直属部队同驻下关一带，以便招收释放回来的被俘人员。四十二师驻孝陵卫，师长石建中因伤住院，由副师长邹一民负责编组。柳元麟总其成。

三月中旬，编练司令部和第八军各部的架子是搭起来了；但是士兵很少，每个班不过三、四人，因此，只领了一个师的装备。这时，京沪一带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传说江阴炮台跟解放军已有联系，解放军很快就会渡江了。李弥请准将部队开赴赣南、闽西一带整补，由吉安就近拨给兵员。

三月下旬，编练部分别乘火车离开京沪，二十四日，到达鹰潭。二十六日，军部派副官组长刘某到吉安接洽拨补新兵，四月五日回报：赣南新兵均已拨给沈发藻了。再电国防部请示，复电指示：改到云南拨补整训。四月十日，李弥在团长以上会议上指示：“各团应自行设法找兵，到云南还要经过长途行军，莫搞得武器都带不动。”

四月三十日，部队由浙赣路经株洲行抵衡阳。李弥于五月二十日由广州到达衡阳。二十二日，召开整编会议，决定：军士教导总队撤销；第一、二团合并，编为四十二师一二六团（原一二六团分别并入一二四团及一二五团）；第三团（该团兵较多）编为一三八师四一四团（原四一四团分别并入四一二团及四一三团）；我专任一二六团团长；教导总队长李桢干调代四十二师师长；其他单位和主要负责人员均无异动。开会前，李弥在闲谈中说：“我们到了云南，再看情况，如果情况不妙，我们就渡过怒江，到腾冲去开垦（李弥是腾冲县人，抗战时，任荣誉第一师师长及第八军副军长，在滇缅边境作战有年），做起土皇帝来，就不要靠上面

补给；万不得已时，还可到野人山去。”

部队从京沪出发以后，沿途到处拉兵；特别是从鹰潭到衡阳一段，拉兵现象更为严重，老百姓恨之刺骨。从衡阳徒步行军以后，逃亡现象很严重，部队中各级官长吃缺的胃口随之增大。八月二十日部队经过涪陵，九月四日到达重庆，补充装备以后，经毕节向威宁前进。此时，中共领导下的民主联军在滇东北一带，极为活跃，经常袭击蒋军。因此，部队行抵威宁和宣威以后，分别作了一些防守和掩护的部署，使行军安全。十一月五日，进抵霑益。二十二日，开驻昆明以东距城二十公里的大板桥。

李弥于十二月初，奉蒋介石电召和余程万（二十六军军长）、龙泽瀾、龙泽意（均卢汉所属军长）一同飞往成都开会。十二月八日下午三时左右，李弥由成都飞回昆明，同来的还有张群（据李弥后来回到大板桥的时候说：“‘老头子’召见我们是分为两起的，先召见我和余程万，后召见龙泽瀾和龙泽意。当时，我感到这样作不大好。‘老头子’要卢汉交出云南的军政大权，军权交给余程万，政权交给我。我和余程万都怕弄成僵局，向‘老头子’提出，接收上可能遇到困难，请他慎重考虑。所以派了张岳军（张群号）同来，要张对卢汉进行疏通。”）当日下午四时，李弥接到卢汉的开会通知。李和余程万都如期到会。等他们进入会场后，会场大门的铁链拉门就拉上了，并且落了锁。开会时，卢汉提出和平方案。李弥沉默了很久，没有发言；最后他要求卢汉让第八军开驻滇西大理保山一带整补，卢汉答应可以在以后研究解决。会议以后，李弥即被软禁。

八日深夜，李弥被软禁的消息传到了大板桥。翌晨，李弥、余程万等拥护起义的联名通电的铅印传单也由云南绥署送到了。编练部参谋长李桢干力主攻昆明，向副司令官曹天戈提出：调第

八军到大板桥附近集结。曹决定：留第三师在曲靖，第八军主力即准备开大板桥。九日晚上，第八军各师长一同来到大板桥，部队尚在集结中，当即由曹天戈主持会议。各师长和李桢干都主张打，我没有发言。会议决定：向绥署要求释放李弥，并向驻在曲靖的陆军总部请示，同时，向二十六军联系。各师长当晚即赶回防地，候命行动。

十日拂晓前，云南绥署的一个独立旅分向大板桥编练部及第八军各单位驻地，同时发动了袭击。军警卫营驻在昆明的东北，该处战斗最为激烈。激战到傍晚，独立旅撤退了。这时，编练部向绥署坚决要求立即释放李弥，否则就要攻城；同时，令第八军主力迅速开到大板桥附近集结。

李弥听到袭击大板桥的消息，也向卢汉要求将自己释放回部，以便处理善后问题；并质问这次袭击的原因。卢汉答复他说：“事前我不知道，现已命令该旅撤退，并将该旅长撤职查办。”

十一日晚，各师长先行赶到；部队于十二日上午十时在大板桥附近集结完毕（第三师仍在曲靖驻防）。十二日下午，李弥把妻子留作人质，自己回到大板桥。当晚，举行师长以上的会议。会上，还是和上次会议一样，大家都主张打；李弥则着重在走的问题上考虑；并摆开地图和我研究开往滇西的路线以及汽车和警戒部队的行动；至于打的问题，则指出要和二十六军商量，同时，要请示陆军总部。他要求大家进一步研究，并分头联系。我在会议上仍没发言，会后向李弥个人提出：“攻城无重火器，攻必不克；贵阳已解放，守必不固。对大城市的攻击，攻防双方以至老百姓的伤亡都很大。公为滇人，何必出此？部队开滇西的目的，不一定要攻城才能达到，反之，攻下昆明并不一定就能实现开滇西的目的。”李弥沉默了一下，慢慢地说道：“余程万没有出来，看二十

六军他们怎么样再说吧。”接着他又要把汽车大队（编练部驻在霭益时，曾将由贵阳方面溃退下来的汽车六十辆统予扣留，编为汽车大队。此时，我已调任编练部高级参谋，即派我兼任大队长）的编组、装载，赶快和各单位联系好，准备随时行动；行动时，由军警卫营乘车掩护。

进攻昆明的计划经过陆军总部批准。十二月十五日拂晓前，由陆军总部参谋长汤焱统一指挥的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对昆明城的攻击终于开始了（李弥于此时赴曲靖视察第三师防务情况，这是他避开攻城责任的计策）。当时第八军的攻击部署概略如次：

1. 兼第八军军长曹天戈指挥该军主力（欠第三师及一三八师四一四团）对昆明城的攻击战斗，重点指向东门；
2. 军炮兵营（无后座力炮）配属于四十二师；
3. 军工兵营主力配属于四十二师，其第二连配属于一三八师；
4. 汽车大队、军部汽车连归高级参谋黄健指挥，在停车场俟机向四十二师后跃进；
5. 军警卫营在四十二师后，逐次跃进，候命行动。

攻击初期，进展尚顺利，汽车大队和军部汽车连曾一度跃进。十六日，第八军主力迫近昆明城以后，攻击进展就逐渐困难了。十六日晚，四十二师由于不能摧毁城防工事的火力点，三次冲锋，都没有突入东门。余程万于这时登上城头，向二十六军进攻部队官兵讲话，劝令停止攻击。十七日，第八军继续攻击，激战竟日，五次冲锋都被击退；二十六军停留在原位置，无积极行动。十八日，李弥回到大板桥。十九日上午，四十二师及一三八师先后撤到大板桥附近集结，并电请蒋介石派飞机空运赴台。是日深夜，接到蒋介石复电：即开蒙自，待派飞机空运台湾。

十二月二十日午后二时，我率汽车大队开赴曲靖，与第三师

会合，拟循陆良公路，开往蒙自。当晚十一时到达曲靖，我到第三师师部会晤师长田仲达。这时，副司令傅志军也赶到了。他对我们说：“卢主任派我追炳公，要他还是不要走。我到大板桥时，炳公已带着队伍走了，听说汽车开向这里来了，我特地赶来。现在全国都解放了，你们何必再走，还是留下来吧。”我沉默着未发言，田仲达说：“我的家眷就留在昆明，难道不愿意留下；但是炳公走了，我跟他多年，不能不走。”大家还在沉默着，我简单表示：“我认为飞越台湾海峡的空运不是简单的问题。后方人员和眷属是否愿意留下来，还待和他们商量。现在汽油不够，车辆要减少，如第三师走，明早就要警卫营跟着先走。”（警卫营长是李弥的侄儿，不能不把他遣走。）二十一日晨，警卫营随同第三师出发后，我把后方人员和眷属中要走的与不要走的甄别一下，愿意走的约有半数；同时，把要走的和不要走的汽车分别编班。午后一时，由汽车大队大队附王青塘率领汽车三十二辆沿陆良公路开往蒙自。

二十一日，二野十七军入滇先遣支队进驻霑益。二十二日，我派军部副官组长叶士慕往霑益去取联系。二十三日上午，我率汽车三十六辆开往霑益，向解放军缴交了车辆、自卫手枪和物资。二十四日，我被编入霑益军官训练大队学习，从此走上了新生道路。

后来得知：第三师会同陆军总部、特务团、宪兵团和军警卫营于十二月二十一日、由曲靖出发以后，沿陆良公路，向蒙自逃窜时（王青塘率汽车三十二辆追上他们，也加入了行军序列），二野入滇先遣支队利用汽车输送，赶到他们的前面，先一步占据了天星关，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一举击溃了这部分逃窜的蒋军，消灭了第三师的一个团，将随同逃窜的全部汽车四十辆连同物资

一并缴获。

至于李弥本人在十二月二十日下午汽车大队东开曲靖后，即率编练部及第八军主力，轻装间道，从大板桥向蒙自逃窜，在第三师残部逃到蒙自以前，已与二十六军在蒙自附近合会，等候空运。据跟他一同逃窜的第八军司令部人事课长李光烈被俘释放后，经过霭益时告诉我，李弥所部最后在蒙自机场被歼的过程是这样的：李弥窜到蒙自这一天（十二月二十六日），就把蒙自机场控制了，立即打电报到台湾，要求蒋介石速派飞机空运。于是计日以待地一面盼望着曲靖部队的会合，一面盼望着台湾飞机的降临。这时，卢汉又把李弥的妻子送到蒙自，要她劝说李弥，只要他答应回来，攻打昆明的往事就不提了，大家共同建设新云南。结果仍被李弥拒绝了。一九五〇年元旦，第三师师长田仲达逃到蒙自，向李弥报告该师在天星关战斗经过。李弥没等他说完，就大骂一顿，把他关起来，说要撤职查办。随后，李弥接到蒋介石电令：二十六军归第十三编练部统一指挥。一月五日，第一批飞机（二十六架）降落时，就让二十六军军部和直属部队先走，李弥也同机飞往台湾。所有留在蒙自的部队，由副司令官兼第八军军长曹天戈统一指挥，候机空运。一月六日，四野由广西开来的部队进到蒙自，当即围攻飞机场，激战到一月九日，第十三编练部及第二十六军、第八军的主力，就在蒙自机场及其附近地区被歼了。

（民革湖南省委员会供稿）

回忆陈作新

阎幼甫^①

名号和籍贯

辛亥长沙光复后湖南副都督陈作新，是辛亥革命时所谓“三湘二杰，十日千秋”的历史人物（“三湘二杰，十日千秋”是辛亥年九月湖南省各界追悼焦陈两督殉难大会会场大门的联语。据说，这八字挽联，是革命党人成邦杰所作）。人们对于这位昙花一现的首义功勋人物，有种种不同的传说。笔者比陈的年龄小十七岁，从一八九六年起，便不断和他会见，向来是以父执辈的礼貌去尊敬他的。今就记忆所及，追述我所知的几件事：

陈作新原名辅廷，字敬臣。一八九五年由彭梅生先生介绍他到长沙东乡洋石潭郎家坊李芳生先生家教书（彭梅生名钧，为长沙名士，据说曾作过陈辅廷的廩保。彭家住长沙东乡洋石潭廖家屋场，和李芳生家以及我家都是望衡对宇。彭很赏识陈的文笔雄健，所以举荐他到李家教书）。我曾见李家写的“关书”：“敦聘陈敬臣夫子为小儿继芳业师，全年奉束脩叁拾串。此订。”陈到李家上学之后，有一次到我家拜客，大红名片上是陈辅廷三字。一八九七年陈准备投考时务学堂，事先和王先谦谈话时，争辩了几句，

① 作者原名阎鸿飞，辛亥长沙光复后任湖南军务部长，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被老气横秋的王先谦所呵斥，气愤离席，未去应考。随后报捐监生去观场（花几十两银子便可捐得监生。凡有监生执照的，就能和秀才一同应乡试。当日称应乡试去考举人的，名曰“观场”），并改名陈汝弼，字萃诚。

一八九九年，陈作新随唐才常在湖北搞自立军。据他自己后来谈及，那时没有用真姓名，化名为程秉钺，所以湖南人不知道湖北省所通缉的程秉钺就是他。壬寅年（一九〇二）改名陈竞存，字涤非，去投考湖南将弁学堂，不幸落选，后来才改名陈作新，字振民，谋入湖南兵目学堂。朋友们不习惯于叫振民，仍旧呼他为敬臣，所以改用敬臣的同音字“竟成”为号。在革命运动中，同志们因为“有志者事竟成”是一句成语，大家都戏呼他为“有志之士”。陈作新还有一个绰号叫作“陈梦天”（湖南有一句土话：浏阳梦天，一发三年。凡是性情直爽，一往无前，幻想甚多，随便发言的人，便呼之为“梦天”）。陈作新的一生事业，很受了这个绰号的影响。

陈作新的籍贯，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是浏阳人；也有人说他是萍乡人；他自称为长沙人，说话也完全是长沙口音。可惜笔者在少年时对于籍贯问题没有兴趣，不曾向他追问明白，所以至今也不敢断定。说他是浏阳人的，可能与“梦天”的绰号有关。说他是萍乡人的，据说曾看见他在萍乡县应小考（小考就是童子试考秀才）陈作新自说充当过几次“枪手”（枪手，就是入场代考的顶替人），可能在替人“杀枪”时，被人所见，便误认他为萍乡人。自称为长沙人可能是陈作新象“龙阳才子”易顺鼎一样，以府名为籍（易顺鼎本为龙阳县籍，而自称为常德人，常德是府名也是县名，犹如长沙是府名也是县名）。

教读中的琐闻

一八九六年，陈作新在李芳生家教书，李芳生的儿子李继芳，从陈受业。其时，李继芳年仅十二岁，从前士子必读的十三经除仪礼外，皆已读完，八股文章已经“完篇”。照习惯，文章已经完篇的学生，先生应把他当成年人看待，不再背诵诗书，即有过错，也不再与以体罚；而陈先生性情急躁，对学生期成心切，要求也甚高。一般年轻的孩子，都是爱玩的，陈先生以为对于学生的幼童时期，教读如果稍微放任，将会前功尽弃，所以对李继芳教读极严。背诵偶有遗忘，动辄施以体罚，打得头青眼肿；每天下学，还要给他一些额外负担，如要他默记《论语》上有几个“斯”字和“仁”字，《孟子》中有几个“此”字和“义”字，《国风》里有几个“麻”字和“河”字，《唐诗三百首》中有几个“烟”字和“桥”字，唐诗中你读过几个“阑干”等等，使学生在休息玩耍时，还要费脑筋去默书，有错就又要挨打。李继芳是一个天资聪颖的人，地方上一些教书先生常说，这个学生的颖悟和记忆，都超越寻常，不应挨打；而陈先生有他的成见，他说，我原来也是爱玩耍不肯念书的人，今天还能当教书先生，就是严师打出来的，因而认为“不打不成材”，“严师出高徒”，教书要严，严的好方法就是打。陈先生的馆中有两个附读学生罗某和汤某，他们挨打也不比李继芳为少。罗姓学生资质较笨，记忆力弱，更是乡下人所说“捶糯草一样”，打得青红遍体，竟至中途辍学。

陈作新为了琢磨李继芳快些成材，夜深还罚他跪着读书。李继芳忍无可忍，侦知先生已经睡熟，便摸黑夜逃走了。陈作新发现学生由学堂里失踪，感觉自己责任重大，亲自同着李家派出寻访的人，四出寻找，寻了一整天，毫无消息。大家认为黑夜出外，

可能失足落水，在附近塘坝中打捞，也无一点踪影。失踪的第三天傍晚，李继芳才被一个农民将他护送到他的外祖家中。原来李继芳逃往离他家八九里外一个农家的草礁（乡下在收割禾稻之后，将草堆积成山名曰“草礁”）中躲了两天，被农民发现了，要送他回家，李继芳说：“我是由学堂里逃出来的，回家必定会被先生打死，我宁肯在外面讨饭，决不回家。”农民再三劝他，他说：“我只能到外祖家去。”农民就把他护送到了他的外祖家中。陈作新经此次事故之后，对李继芳的管教大大放宽了；而且戒酒戒怒，因而平安地教完了这一年馆。

在考试中的波折和思想上的转变

陈作新在青少年时代，是专攻八股和词章的。他受了当时社会风尚的引诱，无例外地成了一个醉心于“日绕龙鳞识圣颜”的人。据他自己说：从十四岁起就去赶考，应过六次小考，仅仅“挑了”（被挑选作为备取）一次；但在外县替人作枪手五次，有三次获售，曾先后得到三百多两银子的报酬。后来，花了几十两银子捐得一个监生去观场，这一次的文章，自己觉得十分得意，朋友也为他预贺，满以为必定高中，榜发，不幸“名落孙山”。后来，知道他的文章曾经“出房”（阅卷的房师把他的卷子呈荐于主考），只得怨恨时运不济，命途多舛！被黜满见遗，遂决定“弃文就武”。

当陈作新投考湖南将弁学堂的时候，总办俞明颐升坐公案点名，唱名人高唱：“陈竞存！”陈作新身穿一件酱色宁绸镶有青缎五云的得胜马褂（清末新军军官一种制服），左右袖各有金边（表示官阶的）三道，足登快靴，自提笔墨袋，走到公案前应一声“到”（笔者当年还是一个毛孩子，因送业师马剑辉先生去赴考，在旁亲眼看见，心中很羡慕他的英俊）。而俞总办却将眼睛扫视着老陈的

全身，随将笔在陈的名上另加一点。等到出场，我将所见告诉马先生，马先生说：“你眼见总办看他时，是否带有笑容？”我说：“似乎很庄严。”马先生说：“这就吉凶莫测。”结果，陈又落选。据说后来陈进入兵目学堂，还是另凭八行书的效力。

陈作新青少年时代所读的书，大都是赶考用的诗文之类，如《各省魁元闾墨大全》、《多宝船》等，总想在“摩元得元，摩魁得魁”的揣摩中，收得“青云得路”的效果。据说，辛丑年他在贺家教书时，看到贺家藏书中有袁子才的《小仓山房全集》、《吴梅村全集》和《龚定盦全集》以后，诗文的意境才走入性灵奔放的大道。尤其是在李芳生家教书时，看到李家藏书中的王夫之的《船山遗书》、黄梨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魏源的《海国图志》等书，开始对于世界的寥阔、文章的经世有所领悟。彭梅生为了在长沙东长街创立“国民教育阅书处”，邀约陈作新做助手，陈又趁此机会，看到了许多翻译的新书。陈很聪明，后来的思想转变，都是由于他所积新知的逐步发展。自《猛回头》、《洞庭波》、《黄帝魂》一类鼓吹革命的小册子在长沙秘密流行后，陈更欣喜若狂，到处宣传，变成了禁书的义务推销员。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传到湖南，陈从头至尾，读得滚瓜烂熟，见人就一段一篇的背诵，所以许多人都以为他必是同盟会的重要人物。

陈作新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最浓的人，在治学方面，读书庞杂，知识日新月异。他之由醉心科举转变到搞时务、参加自立军和民主革命，都是有线索可寻的。

艺术方面的造诣

陈作新是一个有艺术天才的人，能诗能文，会写会画，也会镌图章。他的诗是从学陶学杜入手，有一个时期为应试之用，专

搞试帖诗；后来，读诗渐多，力学吴梅村和龚定盒，因而能不为试帖所束缚，转入清新奔放一途。

陈作新的八股文章，最为彭梅生所赏识，可惜文章憎命，应试无功。清末改试策论，陈对于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和桐城派的一些名作，又勤加揣摩。某科乡试，陈捐得监生去应试，出场向友人背诵闱中所作，都认为必有捷报；结果，徒叹一击不中！从此，他的文章出路，只能做些寿诗、寿序、墓志、挽联，浚人浚墓，去换取酒资，终不克冲破樊笼，为经世之用。

陈作新的正、草、篆、隶四体，都写得很好。小篆、大篆已擅小名，尤长于铁线文。他最爱写字，对于向他索书的人，总是有求必应。他在副都督办公室所忙的，多是写对联和屏条。民国初元，湖南有许多人家的客堂中还悬挂有陈副都督的墨宝。

陈作新学画，自言并无名师指导，初学画兰、画石；后来在罗家教书，罗家藏有画谱和印谱很多，由是又学画梅画竹。我曾看见他为任舜畴画的立石，突兀峥嵘，陈自言：“你细看一下，可以看到立石的三面。”经他指示再看，果然玲珑劈透。在画的右下角另盖有图章一个，篆文：“留与将军作虎看”。画竹则学郑板桥，颇自负。又说，他学郑板桥的行草，习之三年，仅得皮相，再练二十年，或能有成。由此可见他平生对于艺术的爱好，也深知攀登艺术高峰的艰苦。

陈作新爱镌图章。他镌章是用“墨脸”（用墨涂在石章上，不用稿本，信手刻划）。常见他握着镌刀向空刻划几下，便在石上奏刀，不一刻钟，四字章的阴篆或阳篆已轮廓分明，只待修饰。他说，镌章在奏刀之前，要胸有成章，如画竹必须胸有成竹。当日长沙有些金石家也曾誉陈的篆刻为：“刀锋自然，古朴可爱”。

光绪末期某年，陈作新因年近岁逼，债台高筑，乃在长沙犁

头街翠筠轩刻竹铺对面，借得某轿子铺临街一席地，摆一个“代书春联”的摊子，想搞一点笔墨费去还帐。他的临时招牌是用珊瑚冷金笺写的“鬼画桃符”四字隶书。翠筠轩刻竹铺，是长沙有名的手工业，柜台朝南角有“精刻竹器”四字隶书招牌，是用珊瑚冷金笺写的。陈作新的那块“鬼画桃符”的招牌，就竖在竹器铺的对面。当日长沙的街道很窄，由南往北去的行人触目就见到“精刻竹器”和“鬼画桃符”凑成的一副绝妙对联。因此，行人都要停下来欣赏片刻。其中一些有文才懂艺术的人，便在街上东张一张，西望一望，含笑谈论，个个都称赞：有趣有趣！行人问到这位卖字先生的姓名，陈就回答说：名叫“吴斗魁”，盖以“吴”字谐音作“无”，无斗之魁者鬼也。陈所取润笔费较高，八个字的春联收费一百文（普通代书春联的市价只二三十文），白宣纸对联加倍，四尺屏条和横披每条二百文。从腊月十六至二十四过小年，只十天功夫，就收入了十六七串，相当于普通教书先生全年的束脩。陈后来常常自夸他在艺术生活中的出奇制胜。

参加自立军

陈作新谋入时务学堂，被王先谦所扼以后，忿恨不平，只要喝下几杯酒，就大发牢骚。常说：要去做“山大王”，并放言：一朝得势，定要杀尽这些老朽。其时，唐才常正蓄谋搞自立军，到处留心人才，见陈作新少年气盛，便争取陈作为臂助，时常予以接济。当陈去到汉口和唐相见时，唐即派他到安陆一带组织自立军。唐深知陈疏狂不羁，爱使酒骂座，怕他坏事。其所以指派他到安陆，正因为安陆先有一个名叫许行健的在那里工作。许是老于江湖的人，并且是会党的头目，和群众联系得很好，使陈去安陆后，可以有所依靠。陈到达安陆后，许行健劝陈加入会党，保

证可由几位龙头大哥来抬举，使陈做一个穿靴子上山的大哥（会党中所谓穿靴子上山的大哥，就是不必由老么按步提升，而是一步登天的大哥）。许行健曾对陈说：“圈子外的人和圈子里的人总不免隔阂，圈子里的人对圈子外的人虽是尊敬，还是不够亲切；一旦上山，都是自家人，事情就好办多了。我听到佛公（唐才常字佛尘，同事都称他“佛公”）说：你想做山大王，今其时矣！”当被陈婉辞拒绝了。后来，陈作新谈到这段经历时，说：“那时我是书生之见，对于参加会党，思想上搞不通，我曾对许行健坦白地说：‘会党是江湖流派，生硬的做作太多，我不习惯；并且我们去运用他们起事，事成也应对他们有足够的酬庸，若我们自己卷入江湖，那将是终身卷入漩涡，不能自拔’。”从此，许行健再也不提“开山堂”（加入会党的一种仪式）的事了。陈作新感到在安陆和他们一起，虽礼貌上仍是一样，但许多事，自己象站在圈子外，越来越感到貌合神离，因此，索性借着去汉口接洽公务，离开了安陆。陈到汉口和唐才常会见，很率直地将许行健劝他加入会党，以及他不愿意卷入江湖的一番经过告知唐。唐说：“为事业而卷入江湖，不同于无目的耍江湖，谭壮飞（谭嗣同号）为了想考查会党的起源和作用，曾亲身投进过许多不同宗派的会党。关于参加会党的问题你再考虑考虑罢。”其时忽报崇（阳）通（通山、通城）主持人谢某病危，已离崇阳回家，唐才常认为正在紧急的时机，便又派陈作新去崇阳暂时接替。陈到崇阳后，便赶忙又到通山、通城一带与会党联系。原来崇通主持人谢大哥已经组织了好几千人。陈作新以一个新由汉口派去的人，大吹大擂，积极鼓动，使崇通自立军的进展加速。据陈言，设非武汉机关被破获，唐才常遇难，他将率领崇通八千子弟，会师三镇，痛饮黄鹤楼中；无如变起突然，群龙无首，自立军无形瓦解，他只好扮作游学先生沿途混饭

吃，逃回家乡。

参加辛亥革命

陈作新由一个搞八股文章的书生，随着时代潮流的进展，搞维新、搞自立军，东奔西荡，受尽挫折，搞得一事无成，栖栖遑遑地长叹着“一身四海无安顿”，忽然在武昌遇到湖北新军教习辜天保（养生）。陈辜两人性情相似，谈得十分投契。辜天保对陈作新说：“新军用的兵器，都是最新式的，战术也是崭新的一套。今后作战，若以新对旧，旧军决非新军之敌，必不能在新军之前获胜。”这一席话使陈作新受到了新的启示。

陈作新自从龙大先生（砚仙）介绍进入兵目学堂毕业后，先后任二十五混成协炮队营排长及四十九标排长，对当日的新文化日益接近，于中国的积弱和世界形势的发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有一次在龙砚仙家看到同盟会出刊的《民报》，受到种族仇恨的刺激，便组织了一个“积健学会”（后来改称积健社），结合一些新军中的下级军官，以研究军事学为名，暗中搞革命运动。陈作新的书法，在当时湖南新军中是有名的，一些官长对于应酬场中的寿对、挽联，往往托陈包办。陈便趁机和他们接近，逞其雄辩，想说服一些中级军官一起搞革命。当日的中级军官，多数是热衷利禄，很少有革命大志的，对陈总是“敬而远之”。某次军队中因庆祝会聚餐，陈作新酒醉忘形，大发革命言论，被其直接上司某某密报上级，借故将其排长职务撤除。陈被撤差以后，听说东三省的陆军正需要人，便打算去黑龙江投效。他的一些旧同学和旧同事集了一笔钱送给他作旅费，并有许多人设宴为他饯行。据说，陈作新另有纠缠，迟迟其行，不多时，就把远游的盘缠挥霍光了。这时，焦达峰在湖南搞革命运动，焦知道陈正在进退维谷，陆续

接济陈的生活用费，并劝他不必去黑龙江，且在湖南帮同运动新旧军队，作在长沙起事的准备。他要求陈作新除加紧对新军中的下级军官联络之外，进而和各兵种中的正副目时常接触，多方联系。陈作新有了这个任务，决心留在长沙。他的言论和行动，每每显出一种“神出鬼没”的样子。龙砚仙又给他一些交际费，举动更表现得活跃。从此，小吴门一带的茶楼饭馆中，常见到陈作新的踪迹。陈和日新社的一些同志搞得非常融洽。陈作新浑名陈梦天，在军队中知道陈梦天的很多。陈自称和革命党头子孙文、黄兴都是拜把的兄弟。他就是湖南革命十头领之一（所谓十头领是陈作新捏造的，即：宋教仁、焦达峰、谭人凤、陈作新、龙砚仙、阎鸿飞、杨任、成邦杰……）事成之日，他就是湖南革命军的镇统（那时湖南新军中以协统为最大，镇统比协统还高一级）。又说，革命党已托英国、法国和日本的兵舰运进炸弹四十箱、机关枪四十挺、马枪两千枝、手枪三千枝……说得天花乱坠，大家毫不怀疑，精神为之振奋。有一次在杨家山小学开会，他事前对人说：孙文派了他的总参谋杨任到湘联系，大家将会看到一个翘胡子，就是杨总参谋。届时，杨任、成邦杰和杨守箴三人同到，翘胡子杨任更受到军队代表们的欢迎。陈作新这种似真却假，说假还真的花招，当时曾经使到会的人受到很大的影响。

出任湖南副都督

辛亥年九月初一长沙光复，革命党人临时邀集一些原有默契的开明士绅到谘议局开会，推选焦达峰为都督（焦出任都督是秘密运动中早经决定的）。陈作新忽然当众对焦达峰说：“你当都督，我来当副都督。”焦说：“原议并无副都督一职，湖北也不设副都督，你当都督好了”。陈说：“我不是和你争都督，我只要当副的。”黄钊

和陈作新私交很厚，便对常治说：“你的声音洪亮，你就提名推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由大家去决定。”到会的革命党人，正因革命胜利，满怀高兴的时候，听到常治的提议，一阵掌声便算是决定了。

接着焦都督提出军务部长和民政部长人选，经大家赞成后，即提到都督府地点问题。文经纬主张照湖北一样，设在谘议局。陈作新说，都督府以设在抚台衙门为相宜，该处房屋宽大，居省城中心，办公最为合适。余抚台归顺革命后，可派队去接收布置。随即指派杨玉生率队前去。

各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出会场后，又向都督府集会。焦都督提出一系列当前亟待处理的紧急事项，并说，除电报局和湖南官钱局已于起义计划中派出联络组前往监视发报和提款以外，现在，第一，要派遣三个武装和便衣混合组去监视余诚格和藩臬两司，并从速护送其出境；第二，派人接收巡警道和各分局；第三，设立城防司令部。又提出都督府内设秘书监、主计处、顾问厅和督勤处的规划和建立陆军四镇以及镇统人选问题，经逐项议定后，问副都督有什么补充？陈只说要设立一个招贤馆，网罗文武人才，以扩大革命队伍。焦都督说，“重要，重要！”即交秘书监去计划拟办。其时，谭延闿提出设置临时参议院的计划。焦说：“这件事，明天再讨论何如？”谭说：“许多士绅和谘议局议员都认为新邦成立，民主极关重要，应即决定，以安人心。”当时，会议厅的出席人都已疲劳极了，对于这个突然提议，没有深加考虑，仅文经纬说了几句暂时不必设立议会，以免牵掣革命行动的话，也未为大家所注意。临时参议院就这样设立起来了。

九月初二，陈作新要兼议长，而参议院以军人不能当议员，议长要从议员中推举为词，拒绝了他的要求。陈也不以为侮。宪

政派中老谋深算的人多，想出种种方法在两督之间进行挑拨离间。焦的胸怀淡泊，无所不容；陈则被人捧拍利用，和焦直闹分家。他将都督府刚成立的卫队分去一半，另行驻扎，并说副都督形同赘疣，竟闹出向参议院辞职的笑话（都督、副都督不是由参议院产生的）。当时，长沙遍传两督磨擦，直到九月初五我由湖北回湘就军务部长职时，陈才到都督府向我道贺。我劝他率兵去援江西，陈也觉得出省建功，是最好的方法。一场副都督辞职的风波，从此烟销云散。

援赣声中被戕

湖南光复后，除北与湖北已联成一气之外，东、南、西三面如江西、两广、川、黔都还在酝酿举义中，亟待湖南予以支援。江西为湘鄂的近邻，若不得手，为患非浅。我就军务部长职后，首先督促第一协王隆中统领立即出发援鄂。同时催第三镇统制易堂龄整军援赣。易堂龄和陈作新同学，且素相契，因而劝易与陈合作，由陈兼任援赣军总司令，并拟以第四镇阎鸿鑫所部的一协为援赣军总预备队。陈作新也认为满意。这时湖南军队中传说有所谓四派，即：士官派（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新军派（湖南武备学堂、将弁学堂、兵目学堂和陆军中学的）、旧军派（巡防营出身的）、外江派（日本东斌学堂和外省的武备、陆师、将备、将弁等学堂毕业回湘的）。这四派中以新军派的人数为最多，士官派的旧势力为最大。士官派中野心勃勃的梅馨、蒋国经等和革命党人素无联系，没有能象余钦翼、王隆中当到镇统、协统（余、王都是士官出身，因和革命早有默契，所以能得到统制、统领），心怀仇怨，因而兴风作浪，挑拨是非，离间焦陈，并且骂外江派为“江湖派”。他们阴谋暗杀陈作新，嫁祸于焦达峰头上，再煽惑新军派

向外江派进攻，借口为陈作新报仇，最后将焦达峰打倒。另一方面，宪政派中的阴谋家廖某陈某和梅、蒋商量杀焦的计划。传说，宪政派认为陈作新不过是“梦天”作风，嗜酒好色，容易对付，原想去焦不去陈，以免得罪于新军派。蒋国经认为除陈易必倒（就是易堂龄随之而倒），不如将陈一起“切了”。

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多半是淡于权利的，警惕性不高。焦达峰原接到一些报告：有人正在阴谋陷害。焦说：“只要是革命排满，谁来领导都可以。有人接替，我就上前线去。”他还不曾想到敌人不仅要夺他的位而且要他的命。陈作新也接了许多报告，他总疑心焦达峰不容他，决没有想到老上司们将会拔刀行刺。

九月初十日那天在谘议局开大会讨论援赣和援鄂。会后，都督府接到有许多人在和丰洋火局挤兑的报告（和丰发行一种钱票流通市面，信用素著。那天挤兑，后来才知道就是梅馨等有计划制造出来的）。焦都督说：“要城防司令快派人去弹压，并派人开导一下，说有都督府负责，挤兑的人自然就会散去。”此时忽有人对陈副都督说：“事关省城治安，挤兑之风，平息越快越好，副都督如果亲去弹压，群众看到副座的威风，一定可以放心，不会扩大风潮。”陈副都督忙调卫队两棚，亲自乘马向和丰进发，路经文昌阁附近某成衣铺门前，就有预伏的武装队伍拥出围住卫队缴械；另一大汉手持马刀向陈副都督头上一刀劈去，左额劈下一块，陈拔枪不及，忍痛下马，突入成衣店取得板凳一条，回向杀他的凶手当胸砸去，将凶手砸翻，又在凶手头上一凳砸死，他自己忽又连中几弹，倒地气绝。

我所知道的陈作新的生平事迹，已如上述。现在就我所能忆及他的作品和琐事约略叙出，以当附录：

陈作新有一首狂诗：“平生何事最关情？只此区区色与名。若

就两端分缓急，肯将铜象易倾城。”可怜他梦寐萦想的“倾城”，毕生未能如愿，而不急需的铜象却很快就实现了！

陈作新所刻的图章，我曾看见一些。名贵的石质不多，多数是寿山石和青田石。他有一本印谱，名曰“陈大奏刀”，其中有：“英雄无奈是多情”、“戎马书生”、“自称臣是酒中仙”、“温柔不住住何乡”、“但愿长醉不愿醒”、“亦狂亦侠亦温文”、“留与将军作虎看”、“游戏人间”、“觉今是而昨非”、“推陈出新”……据说，他作副都督后，还刻了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上”的图章，我却没有看见。那方“游戏人间”的图章是和“吴斗魁字曰忘愁”一方成对的。因为他用“鬼画桃符”作市招卖字的时候，人家要他书写宣纸屏对，署款仅“星恒忘愁”四字，盖的图章就是他星夜赶刻的阴篆“吴斗魁字曰忘愁”和阳篆“游戏人间”。这位曾经哄动长沙的怪人——吴斗魁，只有熟人才知道是陈敬臣的玩艺儿。

最有意义的作品，是陈作新临难前二日写的两副对联。九月初八他写了两副对联送把成邦杰和我。联语是：“练兵先练将，擒贼必擒王。”联旁的跋语是：“日前与诸友谈北伐，成邦杰将军谓：擒贼必擒王，宜速进中原，直捣燕蓟，系组孱王颈上，饮马兴凯湖边，方可成犁庭扫穴之功。顷因筹备援赣，同军务部商谈整军，阎幼甫将军谓：练兵先练将，务使全体将校都能学识充足，技术娴熟，然后能收强将手下无弱兵之效。因思“练兵先练将”与“擒贼必擒王”二语，确系革命建军与北伐作战最重要之指导原则，巧合成对。爰制线篆联，分贻两将军，以当息壤。辛亥九月初八日陈作新识。”加盖了名章和“推陈出新”闲章。他赠我一联，因九月初十事变仓皇，不知流落何处。成邦杰同志在民国初元即身殉革命。如果赠成邦杰一联，尚能人亡物在，亦可算是辛亥革命时期一件有意义的纪念品。

我之所以惜陈死得太早，纯是对他的艺术而言。陈作新书画篆刻都想学郑板桥。学郑要先具备能写四体书，又会画兰画竹。陈的基本功夫已经初步打好，如果真能以他所说，加工练习二十年，则推陈出新，可能驾郑板桥之上。

又陈临难前刚要出都督府，遇到我骑一匹英国种枣骝马回部，陈即换借我的坐骑乘去。陈死后，这匹马为谭延闿所得。谭素精马术，而马竟不驯，无法乘用。后来沈秉堃北伐过湘，谭将马赠沈，沈亦不能骑。及北京宣布共和之日，马忽倒毙。沈曾有信谢谭，叹为异事。一九一七年我回到长沙，有一次和谭聊天。谈到“功成身退”，谭因此又谈及陈作新临死时所骑的那匹马。谭是迷信最深的人，他说，那匹“灵畜”，不事二主，可谓功成身退，暗中也是骂我始终不愿和他沆瀣一气。谭原不知道那匹马在革命过程中最初是属于我的。

又传说陈作新和焦达峰闹意见后要辞职。在辞职信中有：“自作弓藏之谋，免遭狗烹之祸”等语。他原以为焦不容他，哪里知道“鬼瞰高明”，焦亦同罹兔死鸟尽之祸！仇敌固在彼而不在此也。

记汤芑铭屠杀杨德邻等

萧 仲 祁

一九一三年宋教仁被刺案件发生后，孙中山号召各省讨袁。湖南于七月二十五日宣布独立，旋即于八月十三日取消独立。袁世凯派汤芑铭为湖南查办使。汤于十月初入湘，即于十月十日逮捕财政司长杨德邻、内务司长萧仲祁、教育司长唐联璧、银行总理章克恭、协理陈光晋、会计检查院长易宗羲、筹饷处会办伍任钧、富训商业学校校长文经纬、省议会议员李长材及吴作霖、黄瑛、黄翼球、曹耀材与军界赵恒惕、江隼、陈复初等，目为乱党（杨、萧、陈、唐均羁于内务司署，即今市人委所在地），以电告袁。袁初电令一律枪决。十三日，汤即将杨德邻、易宗羲、伍任钧、文经纬等毙于贡院坪。时熊希龄任内阁总理，会袁时，见汤电所列名单，因谓袁云：“多系湘中正绅。”袁乃电令汤芑铭依法审办。续电到时，杨德邻等已处决矣。杨的罪状有云：“乡里有长者之名，居官任财赋之重。”城内士吏见之哗然。事前，熊内阁本电调萧仲祁、杨德邻入京为助，谭延闿迳复电云：“均有要职，不能离开。”以示两人，德邻云：“我更不愿离走，因财政繁重，若不亲身交代而去，必以贪污见罪。”其廉正可想而知。谁知接他的手的为胡瑞霖，竟疑财政可以贪掠，将他杀掉，可以灭口；易宗羲检查会计，伍任钧会办筹饷，均以与财政有关，致同时被害。

杨、易、伍、文等被害时，文经纬的棺材上写明“萧仲祁”

三字，大约处办时，系移萧棺为文用；又萧与文，身体眉目亦颇相似，以致士友启棺，皆云萧已处决，有烧香致悼者；家人惶骇，到内务司署，见我尚生存，乃始释然。

杨等被害后两日，法官华世羲来内务司署问供，对案平坐，云：“都督囑我问口供。外间控诉多系诬谤；惟内务司有布告文，首云：‘袁贼无道，叛国殃民’等语，载在政报，分贴各处墙壁，系司长签字盖章，应取口供，可即说明，写出一纸，以便回复。”我即说明当时情况，另纸写交华带走。月余后，将我与唐联璧、陈光晋、曹耀材、李长材五人移置司禁湾（系前清臬台衙门拘禁要犯之所），经过年余，得释。黄瑛等拘于陆军监狱，赵恒惕、江隼、陈复初三人押解北京，拘留多日，次第释放。

我们在司禁湾时，内外隔绝，惟听见各处受残害的人很多：如衡山县知事向洪范，是忠实党徒，以独立文告，逮往衡阳梟首；安仁县知事罗正声亦循吏被杀；邵阳中学校长李洞天以学生课卷文字嫌疑枪毙，刘策臣亦被牵连，受累甚久；各县解散议会，因案致害者很多。军法官承汤意旨，人言啧啧，其中操纵主持者多为胡瑞霖。

胡瑞霖，湖北人，谲诈多谋。当武昌首义，汉阳失败时，胡与汤化龙等多人相率避往上海，同行入谓宜致电鄂中首义诸人道歉；胡谓不然，拟电稿反责首义诸人歧视异党，致此溃败；鄂人深嫉之。后反对汤化龙任南京陆军部秘书长（怂恿汤脱离孙、黄），遂与汤化龙另组民主党，勾结袁世凯，与国民党为仇。胡之险恶如此。故汤芾铭倚重入湘，作恶多端。后刘心源来湘主民政，亦无法转圜。湘人皆知汤屠祸湘罪状；至于胡瑞霖之阴恶，助桀为虐，则知者殊少。后数年，胡假托信佛，居京西甘露寺，持斋念佛，病终寺内。

萧仲祁得释后，入山侍亲，以省县办筹安会，到处哗然，遂客游上海、普陀各处。痛杨德邻之冤死，曾以诗悼之，附录于后：

论年兄长我，游学我先兄；下问谦殊众，深谈气特清。
乃弟守仁君（原名毓麟），当年同校经；留英愤国难，沈海追屈平（辛亥夏，投利物浦死）。君初为皖吏，发愤扶桑行；昕夕研法政，铅槩竭精诚。毕业俱内渡，先后游盛京；我助提法职，君则佐民厅。地方筹自治，县别培材英；训练及三载，文物惊东瀛。朋曹文宴促，冰天倾连觥；塞月照闾议，剑光驰沧溟。悍帅（张作霖）仇楚材，武昌扬义声；南旋敬桑梓，新治敷湘衡；赖君筦财政，经画疲神形。一夫叛党国，国本将颓倾；金陵首讨袁，江湖胥同盟。南军嗟不武，长沙如沸羹。凤皇（熊希龄）柄内阁，吁俊集明庭；君我俱见徵，茶陵（谭延闿）未同情。官守皆重要，残局熟支撑？君云财务烦，交代宜分明；舍去滋疑谤，无心赋北征。十月初十日，禁网遂同婴；两日君就义，霜陨夜残更。居官财赋重，乡里长者名；狱成无他辞，士吏俱愤盈。老母已衰笃，有弟（号达生）病重听；少妇辞帷去，门户悲零丁。不恤为国死，慈恩报未成；寸草化碧血，乌养徒悲鸣。杀身斯成仁，壮烈世所荣；后死愧吾徒，老钝虚残生。国家日艰难，桑海空忧惊；蒿目殖民地，呼号仰苍旻。茶陵在位日，曾商为褒旌；斯人亦宿草，此意付飘萍。秋坟啸山鬼，思之涕泗横；生死泰山重，世誉鸿毛轻；泫然抒积臆，庶以诉丹青。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供稿）

辛亥组织海军陆战队会攻南京和北伐经过

王 时 泽

由日本回国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至日本时，我正在横须贺海军炮术学校毕业试验完毕，等候举行毕业礼后分派上军舰实习。在此期间，我与同学均留校补习，除星期日外不能外出。我在报上看到此项消息，热血沸腾，恨不能即时飞回祖国，加入前线作战。见报载有法国商船定于某日由神户开往上海，乃决定于星期日潜往神户，乘该商船回国。因清政府对于海军学生参加革命防范甚严，我们各人的思想在同学中彼此从不暴露，及星期日出校搭乘火车往东京，同学不约而集者计有李静（湖南桂阳人，原名毓麟）、叶匡（广东惠州人，原名启芬）、余际唐、张冲、朱华经、吴景英、陈云（以上五人均四川人）及时泽共八人。我们共同商议，一面往同盟会联系，一面致电炮术学校，伪称在隅田川划船落水，衣履尽湿，当日不能返校，以免学校方面通电寻找。随即同往神户，乘法国商船离日本，于十一月二日抵上海。

上海光复 我们到上海的第二天，清晨起床，欣闻上海县城及高昌庙江南制造局已于昨晚由革命军占领，旧军警均响应革命，上海已全部光复，人人奔走相告，喜形于色。我们即赶往制造局，至则见同志聚集者甚多，已公推李燮和（湖南安化人）为司令。见我们至，极表欢迎，公推我办理海军事务。我乃驰赴海军办公

处，至则空无一人。其时，停泊在上海的军舰计有建威、楚有两炮舰，湖鹏、宿字两鱼雷艇，其他三舰忘其名，各舰均尚悬挂龙旗，无所表示。我往建威军舰两次（当时在上海各舰以该舰为首）劝其撤换龙旗，赞助革命。因舰长姚怀文不在，由副长某代为接洽，他在口头上极赞成革命，但对换旗事则表示须俟上级决定。我又往见海军办事处负责人吴应科（广东人）。吴谓：“我仅管军饷，俟新政府成立即遵令移交，无权指挥各舰”等语。盖因当时的海军主力如海容、海琛、海筹等大舰，由清水师提督萨镇冰率领在长江中游，尚未反正，在上海的海军旧人不免心存观望。我因口头接洽无效，主张派军队同往各舰，迫其即时作最后答复。当由李司令拨派巡防营一队交我临时指挥。我与张冲商定，在制造局库房取出待修旧炮数门，移置江边，虚张声势，由张冲指挥。我率巡防队乘舢板先至离岸最近的湖鹏鱼雷艇，该艇即扬白手巾表示欢迎。我吩咐同去的员兵留在舢板上，独自登艇接洽。询知该艇艇长等均不在船，现在负责欢迎我们的为总炮弁（即军士长）周某（湖南湘乡人，忘其名）。周君谓“全体员兵均极赞成革命，请派艇长上船指导。”我当即答以“君既首先赞助革命，我当回报李司令提升君为艇长，其余员兵依次递升。请即以旗语通知各舰速作最后答复，凡不愿参加革命的均可自由离舰，遗缺仍由本舰员兵依次升补，我们决不另派人。”并请准备发射鱼雷，以防万一。周君及全体员兵均欣然允诺。靠近湖鹏的宿字号鱼雷艇首先表示与湖鹏取一致行动。其余各舰于旗语发出后，经过一番接洽，均派代表携名册前来，表示赞助革命，即时卸下龙旗。海军军舰归顺民军，自上海始。

上海光复，最初数日，海军事务仅我一人独力支持，除接洽关于海军的问题外，并收容各舰来沪销假及个人志愿投效的炮弁

林学珊等三人士兵约五十人。由日本回国的同学七人中：李静、叶匡决计往武汉，不愿留沪；吴景英由江苏都督府派为海军处处长，四川各同学均加入该处。

组织海军陆战队 沪军都督府成立后，李燮和移驻吴淞，陈其美接任都督，派毛仲芳（福建闽侯人）为海军课课长，我为副课长。我以愿赴前方作战，不欲久留后方辞之。适有广东国民军百余人（队长杜某）、潮州敢死队五十余人（队长林某），均系在上海光复前由热心革命的学生、工人、小商贩等自行组织，曾经参加进攻上海县和制造局，此时极愿得一有军事知识能与沪军都督府接洽之人为其领导。经留日旧友潮州杜天一介绍，由他们推代表前来接洽。我以正合心愿，允之。于是加上以前收容之海军炮弁等编为海军陆战队。并得沪军都督府同意，派我为指挥官，发给枪械。其后又加入华侨五十余人，合计二百余人，移驻吴淞，勤加训练。

会攻南京 是时徐绍桢被推为江浙联军总司令，统率各路民军会攻南京。旧友史久光（江苏溧阳人，毕业日本陆军士官及炮兵学校）、刘国祥（湖南湘阴人，毕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改名刘毅）均在其幕中，史任参谋长，刘任参谋，促我率海军陆战队开往前线助战，并由徐绍桢派刘国祥来沪催促。乃于十一月某日由上海乘沪宁铁路火车出发，至镇江下车，改为徒步前进，抵马群时，徐总司令亲出欢迎。

是时南京城外各据点已被联军占领，张勋闭城坚守不出，我军无攻城炮，相持不下。众议募敢死队援城进攻，我首告奋勇，陆战队全体员兵无不欣然乐从，争当先锋。正在准备之时，适遇日前至前线视察被敌俘去的联军参谋长史久光偕张勋所派的代表胡令宣前来议和。其所提条件：一、张勋退出南京，率所部军队

渡江北上；二、对于南京城内的驻防旗人应妥为保护。正在商谈中，张勋即于是晚乘我方不备，率兵经下关退往江北。次日拂晓，联军陆续入城，人民焚香夹道欢迎。南京即于十二月二日光复。

南京光复见闻 南京光复后，江浙联军总司令部从新发表编制，加委人员。现在所能记忆的：参谋长史久光，副参谋长翁之麟（江苏人）、参议沈同午（江苏人）、副官长谭道南（湖南长沙人）、参谋刘国祥、钟骏德（湖南人）、龚维疆（江苏人）、陈复（广州人）、王统（浙江温州人）、王时泽，大队长杨言昌（广州人）等。海军陆战队指挥官王时泽兼，秘书杨端六，军需长廖燮勋，督战员李克明（以上均湖南长沙人），大队长尹祚乾（湖南芷江人），副官李北海（广州人），教练官林学珊，队长杜某、林某等。

参加进攻南京的军队，计有苏军（司令朱熙，湖南人）、浙军（司令朱瑞，浙江人）、镇军（镇江都督林述庆）、光复军（司令李燮和）、黎天才军、沪军（司令洪承点）、海军陆战队及第九镇余部等。

镇江都督林述庆率队最先入城，满张江宁都督林的安民告示，不受联军总司令部指挥。经徐总司令迭派钟骏德等疏通及各方面调停均无效。直至临时政府成立后，徐林纠纷始告解决。

关于徐林冲突的问题，兹就当时各方面的评论，略记于次：一、据钟骏德云：“我与林同是徐任福建武备学堂监督时的学生。徐任第九镇统制时，派林为管带，现在林反以怨报德，确是负义。”二、据徐的旧部某某等云：“当武汉起义的消息传至南京时，总督张人骏曾问徐云：第八镇已叛变、第九镇是否靠得住？徐答以靠得住。当时徐尚无参加革命之意，对于林颇为怀疑，曾派员接替林的职务。林拒不移交，即在镇江宣布独立，与徐脱离关系。其后徐在南京反正失败，退至镇江，林拒不见面。徐被推为江浙

联军总司令后，林始终不与合作。”三、黄克强先生曾问我徐林孰优？我答以林未见过，不知其详，只觉得他的举动有碍联军的团结，与徐共处多日，见其每餐饮酒时，必举杯呼“大总统、大元帅万岁！”其尊敬领袖之忱，胜于我辈。克强先生当时对我说：“徐的这种举动是官僚作风。他参加革命是被迫的。林虽性躁欠含蓄，但是忠实的同志。”其后林于一九一二年在北京被袁世凯毒死，可见袁忌林之甚及克强先生知人之明。

某日，徐绍桢至陆军部，副官长某君与之谈及办公室不敷，如能将邻右史参谋长的亲戚毛姓房屋租入，甚为合用。徐当时表示将归告史久光转知其戚迁移。徐返部后以此事告史，并谓毛姓另租房屋的租金及迁移费等均由他负责，在总司令部经费项下支付。史当面拒绝，答以毛姓房屋能迁让与否，当由毛姓自行决定，别人不能为之代谋；替陆军部办差，非总司令职责，本部经费只能限于拨发所属各军军费，不应移作别用等语，并因此决然辞职。徐嘱我挽留，不果。黄克强先生闻之，甚赞许史之刚直，特擢为参谋本部第一局局长兼大本营作战局局长（克强先生以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并饬副官处取消租用民房之议。

临时政府成立不久，改派徐绍桢为南京卫戍总督，海军陆战队仍留归徐节制。我以赴前敌之愿不能实现，心颇悒悒。适海军部次长汤芑铭被派兼北伐舰队司令，拟邀我同行，当即表示同意。乃由汤向徐商调，徐允暂时借调，仍保留原职，陆战队指挥官职务派大队长尹祚乾代理。

参加北伐 一九一二年一月某日，我与汤芑铭等乘海容等舰由南京出发，经上海向烟台航行。参加北伐的军舰为巡洋舰海容（舰长杜锡珪）、海琛（舰长林建章）、海筹（舰长林颂庄）、练习舰通济（舰长葛宝炎），以海容为旗舰。司令之下，设参谋四人，为

李静、凌霄、姚葵常、王时泽。

北伐舰队到烟台时，烟台业已宣布光复，临时推海军舞凤军舰舰长王传炯为都督。舞凤系海军交通舰，无战斗力。当时在烟台较有实力的为海军禁卫队一营，管带原为满人，于光复时离职，由队长虞克昌继任。王传炯任都督不久，即辞职让位于虞克昌。此外刘艺舟称登黄司令，连成基称民政长，彼此均不相联系。蓝天蔚任关东都督，也设办事处于烟台，其本人则住在海容军舰，均无前进的实力。我因见此情形，并探知胶东一带空虚，乃向南京方面请调海军陆战队来烟台，拟会同友军进攻济南。经徐绍桢同意，转请克强先生批准，除留一中队在南京作卫戍司令部卫队外，全队约四百人均随新任烟台都督胡瑛一同北上。并由南京增派沪军刘基炎（河南人）部，进驻龙口。

陆战队开到烟台后，适值南北议和停战，二月十二日清帝宣布退位，袁世凯通电声明赞成共和，已失去我请调该队北来的本意。而胡瑛正苦无兵，乃将该队交胡瑛节制，决计辞去本兼各职，回长沙葬母。

到南京时，黄克强先生已改任留守，南京卫戍总司令部正在结束，徐绍桢留我负责解散留在南京的海军陆战队。本队员兵对于南北统一后裁减军队的办法极为拥护，惟对于发给遣散费三个月坚辞不受，谓“我们是为革命而来，非为金钱而来，现在清室已退位，革命之目的已达，只要有薪饷一月，即可以敷回家旅费之用”。经再三劝说，始勉强接受。以后我遇见他们有在上海马路捶石头的，生活甚苦。回想其辞不受遣散费之高风，以与借这次革命争权夺利之徒相比，实有天壤之别。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供稿）

短 稿 三 篇

郭人漳欺诈取财

余 煥 东

郭人漳以办理矿警为名，在其家内收买枪枝，招集警士，而先将其藩后街住宅内之什物等件向日商山本洋行保险五万元。某日，予前往访问，适有督军署参谋两人在座，其走廊下有便衣矿警往来，郭指谓予曰：“这些军队就是我将来的革命队伍。”两参谋遂向汤芑铭报称郭人漳将图谋不轨。于是汤遂于某夜派兵将郭之住宅包围搜索，宅内什物皆被捣毁，郭人漳则由日本人保护出宅。后郭人漳向山本洋行索取五万元之保险金，山本洋行遂向汤交涉，汤只得由湖南矿务局以收买郭人漳之绥宁铜矿为名，拨款五万元了事。予时任湖南矿务局协理，故知其底蕴。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供稿）

辛亥湖南光复时的《大汉民报》

刘 蕊

《大汉民报》出刊于辛亥（一九一一年）九月初一（十月二十二日），即长沙反正之日。其时，武昌首义不久，虽然声势浩大，但清廷已遣冯国璋率领北洋军驰赴武汉，企图一举扑灭革命政权，

大局仍颇危急。湖南方面，革命酝酿虽达成熟阶段，但反动统治势力仍然强大，人民痛清政不纲，外患日急，对于武昌首义，固然欢欣鼓舞，然当时景况如斯，亦不免动摇观望。于是宣传动员，乃刻不容缓，同盟会会员杨宗实遂邀集李任民、刘苾、游大瀛、饶某、陈某等组织《大汉民报》，即于焦、陈发难的同日，即九月初一出刊，社址设在曾子庙，日出一大张，成为湖南反正后首创之宣传革命报纸。对于唤起群众，团结革命力量，从而壮大革命声势，安定社会秩序，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报纸出刊后，杨宗实忙于联络军政各界，而李、刘、游、饶等则为编撰诸事所羁，无暇致力于筹措经费，因而出刊不久，即有经费困乏之虞，加之焦、陈被刺，以谭延闿为首的宪政派旧势力，窃据政府，杨宗实身为同盟会会员，又系书生本色，不肯交纳权要，以致报纸陷于孤立，经费益紧，困难更大。厥后，王隆中率军由鄂回湘，改标为师。王出任师长，兵权在握，遂恣意横行，尝酗酒杀人，道路为之侧目。《大汉民报》据以秉笔直书，大触王怒，王竟率部捣毁报社，并围捕报人；最后，将报社封闭。至是，杨宗实鉴于处境日艰，无可奈何，遂逃赴上海；其他编辑诸人亦均星散。《大汉民报》自九月初一创刊，既困于经费，又迫于强暴，仅四阅月即告夭折。嗣后，屡谋恢复，迄未实现。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供稿）

思贤讲舍、长沙府学宫之设局刻书

彭 禺

船山学社前身为思贤讲舍（地址在今省中山图书馆），系由郭

嵩焘建议、于清光绪年间创设的。后遂主讲其中，聚徒课学，月有膏火，比立王船山先生木主祀之，是为湘省祀船山之始。迨光绪十六年(1890年)王先谦归省，郭氏乃固以主讲职位相让。王氏继任后，因商定于麓务公所岁醴六百元，就讲舍设局刻书，是为思贤书局之始。计自光绪辛卯年(1891年)始、截至宣统元年(1909年)止，历刻书目，就所能记忆者约略开具如次：

经 部 《十三经注疏》、《正续方言》、《驳五经异议疏证》、《音学五书》、《五经通论》(皮锡瑞著)、《经学通论》(同上)、《礼记质疑》(郭嵩焘著)

史 部 《通鉴辑览》、《合校水经注》(王先谦撰)、《湖南通志》、《湘阴县图志》

子 部 《荀子集解》、《墨子笺》(曹耀湘著)、《韩子集解》、《庄子集解》、《庄子集释》(郭庆藩著)、《盐铁论》、《潜夫论》、《文心雕龙》、《温病条辨》、《丹溪心法》、《白喉》、《医方合编》

集 部 《正续古文辞类纂》、《唐宋诗醇》、《唐诗六百篇》、《六朝唐赋》、《十家评文》、《七家词选》、《词选五种》、《弘正四杰集》、《顾亭林诗集》、《问字堂集》、《梓湖文集》(巴陵吴敏树著)、《绿绮草堂集》、《六家词钞》(孙鼎臣、周寿昌、李诒、王闿运、张祖同、杜贵墀)、《养知书屋遗集》(郭嵩焘著)、《晚兰斋文集》(李桢著)、《霞仙文集》、《思益堂集》(周寿昌著)、《平养堂集》(王龙文著)、《浮邱子》(汤海鹏著)

凡思贤书局所印诸书，卷首第一页下版均印有“思贤讲舍”或“思贤书局”字样。

按思贤讲舍入民国改为船山学社，有社员若干人，初届社长为浏阳刘人熙，历届印有《船山学报》，中间曾设船山中学，后又设船山自修大学，仇鳌为董事长。

民国十三年(1924年)甲子秋，旧长沙郡人士（民国废郡，但昔所办文化教育团体尚存者有二：一、长沙府学宫，二、长郡中学）创刊湖南丛书，设校刊处于长沙府学宫。主其事者为彭兆璜、刘宗向、刘善泽、何衢等。比时搜辑书目已达数百种，别以四部。思贤刊刻专书，大抵近人之作，又非限于湘土。学宫所刻则专属湘人遗著，时阅三年，计已刻成者如次：

经 部 《周易总义》（宁乡易拔著）、《周官总义》（同上）

史 部 《隋唐石刻拾遗》（宁乡黄本骥著）、《东洲草堂金石跋》（道州何绍基著）、《北海三考》（湘潭胡元玉著）

子 部 《学林》（宋王观国著）

集 部 《文泉子集》（长沙刘蛻著）、《李群玉集》（唐澧州李群玉著）、《天隐居士集》（邓深著）

上本省两处刻书，篇幅大方，校对精善，均可称为善本书。

抗日军兴，经费拮据，刻书事业遂废。后长沙经一火四战，府学宫遂成灰烬，遗址今属长沙市第二中学。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供稿）

补充和订正

禹之谟事迹补遗

文 斌

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所编的《文史资料》第一辑载湘乡邓介松先生所写的《启蒙时期青年运动的急先锋——禹之谟》一文，稍有遗漏之处。特为补充如下：

我于清末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在前湖南高等实业学堂读书时，由醴陵人宁调元、文斐二人（都是同盟会会员）的介绍，得以认识禹之谟。禹对当时青年学生极力鼓吹革命排满，常于星期六下午、星期日或其他假日，在长沙城南天心阁一带寻找机会，向游城学生演说，言语激昂慷慨，影响极大。当时湖南巡抚庞鸿书微有所闻，有意将禹拿办。禹得知此消息，方稍隐秘。这事系文斐生前亲自告知我的。光绪三十二年夏，长沙市全体学生万人左右，不顾庞抚的禁令，集合湘江河岸，护送陈天华、姚洪业二烈士灵柩公葬岳麓山时，我也是参加公葬大会的一人，亲眼看见禹之谟所写的两首挽联。第一首邓介松记载不全。据我现在记忆：出边是“杀同胞是湖南，救同胞也是湖南，盼中原起义，还是湖南；志士竟捐躯，两棺得赎湖南罪”；对边是“攘夷狄成汉族，尊夷狄不成汉族，痛满酋入关，已亡汉族，国民不畏死，一举能张汉族威”。又，文内所载劣绅俞诒庆事件，也值得补充一下。

俞是长沙县大劣绅之一，经常出入王先谦、叶德辉等之门，平日与他们臭味相投，把持全县教育经费，学界人士恨之刺骨。而他个人平日行为不检，出入娼寮，不以为羞。某日，有教员学生若干人探悉俞适在某私娼家里，将俞捉到游街。大家把他和妓女绑在一张竹床上，妓女坐在上面，俞被剥去衣服，以草席遮住下体，蹲在妓女两腿下面，丑态毕露。当时风传系禹之谟的主张。我们同学中目睹者颇不乏人。

关于萧昌炽和廖家栋

姚大慈

《文史资料》第二辑周震麟先生所写《谭延闿统治湖南始末》一文提到：“张振武杀了不服调遣的萧昌炽；廖家栋率第三旅会合各军，逼近省城。我认为倒谭时机已经成熟”。

按这两点都与事实不合，恐年深月久，道腴先生记忆不免偶误。

我是发动倒谭分子之一，亦是倒谭后赵恒惕屠杀党人凶焰下临险脱逃者之一，对道腴先生所说的以上两点，提出一点意见：

（一）萧昌炽与我们倒谭没有关系。关于他被害的事，我不大记得。他似乎是到醴陵去接替某人的甚么职务，被原任部下于应祥所杀。但决不是不服从张振武的调遣，而为张所杀。张振武是当时一个团长，驻在岳阳，以后调来长沙城外，他无调遣萧昌炽的关系。这一点是绝不含糊的。

（二）我们倒谭时，廖家栋并未参加。我们曾经发动过他，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只管得我啊！”后来赵恒惕屠杀党人时，廖亦被

赵骇跑，逃到上海。我们见着他，甯督凡(宁坤字)对他说：“‘我只管得我’，你为甚么连个‘我’都没有管到。”廖面如泼血。我拖着督凡走了。